



“自耕地”的大小也未有限制。最奇怪的是，凡有任何建筑或农事设备的土地，尽管没有什么种植，也算是一个农场，而地主可以拥有几个农场。又限额以外的剩余土地将由地主直接分给农民或佃户去耕种<sup>①</sup>。

印度政府的计划委员会于1960年8月召开了两天的联组讨论会，根据“耕地调整”、“土地限额”、“无地佣工”及“租佃法”四组的提案初步商讨了土地占有最高限额、地价补偿和安插无地农民三个问题。四组联席会议决定提出关于土地限额的几个要点，即要规定土地最高限额为一家能耕种的三倍面积，要规定一家的意义是五口之家，以一家而不以一人为主；要规定自土地限额法公布之日起不准有任何地权的转移<sup>②</sup>。呜呼，这是闭着眼睛说空话。各邦地主们拥有若大势力，如何肯听从计委会的决议？他们早就隐匿了、出让了或分散了他们的土地以便回避限额，决议岂非等于放马后炮吗？

#### 四 推广农业生产合作社

回忆1936年年底，离印度独立还有10年半光景，国大党在法兹浦尔大会上所通过的有关农村问题纲领就包括提倡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项。后来再过22年，那格浦尔大会的决议又要求三年之内尽可能在全国70万村庄中建立这样的合作社。目前印度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是怎样呢？

据印度储备银行的调查统计，全国各种合作社总数，截至

---

① 巴得那以克：《奥里萨的土地改革》，见《新世纪》月刊，新德里，1960年7月。

② 《印度斯坦时报》周刊，新德里，1960年8月7日。



1958年6月底，约达258000个，社员总数约为2100万户即1亿左右的人口<sup>①</sup>。但半数以上都是有名无实的组织，大部分是信贷合作社，实际还是资金贫乏而管理很差的借贷协会<sup>②</sup>。印度储备银行的全印农村信贷调查报告提到合作社时，就有这样一个结论。农村中较大的地主往往兼做商人或高利贷者，村长也多半出于这个阶级。地方上低级官吏、收税员和合作社管理者来到村里，在生活和行动上都须依靠他们。政府人员和农村间权威分子如此密切关系，对忠实地执行合作社政策就有很大妨碍。一切应办的事，尤其是同村中权威势力的利益相抵触的，往往由合作社向上虚报而实际始终未曾执行<sup>③</sup>。从这个调查报告，我们不难推想，只要地主阶级不铲除，任何合作社都很难办得成功。合作社即便存在，也会被地主和他们的朋友所控制。合作社因此就不能不变质。

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是印度10多万个合作社的一小部分。政府计划委员会合作耕种小组1960年2月16日所发表的报告中提供了下列统计数字：1958年全国共有144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1098个即76%是在进行工作的，其余的可推想是名存实亡了。社员总数虽达39075人，但确实下田工作的不过是24637人，即63%罢了。合作社共拥有30万英亩的土地，但在1957—1958年度中只有7/10的土地播种了。农业生产合作社6/10以上是分布于旁遮普、孟买和北方邦三邦；旁遮普有541社，占37%；孟买有223社，占15%；北方邦有161社，占11%，其

① 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合作运动1957—58年统计》，孟买，1959年。

② 大林：《有关印度合作运动某些方面的报告》，孟买，1957年，第21页；南纳伐蒂：《研究中笔记》，见《印度农业经济季刊》，孟买，1958年第2期，第57页。

③ 印度储备银行：《全印农村信贷调查报告》，孟买，1954年，第2卷，第277—278页。



他各邦则社数更少，例如德里 13 社，曼尼普尔 8 社，马德拉斯 4 社，喜马偕尔仅 1 社<sup>①</sup>。最近两年来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没有增加。

印度实际上有三种性质不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一种是各自经营的佃农耕种社。社员曾以社的名义向政府租进土地。所租进的土地按地段分配给佃农去各自耕种，甚至各自销售其农产。耕种社只经管和调整土地并分配借款，而耕种者又是耕种社的佃户。马德拉斯和安德拉在 1942 年就有这种组织。中央邦在 1949 年和孟买邦在 1950 年也有这样的佃农耕种社出现。这并非真正的合作社。第二种是统一经营的联合耕种社。社员将自有土地加入社中，如耕种社不解散则无权收回。也有将自有土地在一定期限内租给耕种社的。有许多社员是地主，他们虽然入了社仍以雇农代耕。因此这也不是真正的合作社。中央邦在 1958 年就有这样的联合耕种社。喀拉拉、西孟加拉和孟买等邦 1950 年也同样有了。第三种是统一经营的集体耕种社。社员曾向政府领到土地，或曾向政府买进土地。农场是统一经营，社员对土地无私有权。这种合作社，它最初是在孟买邦于 1948 年出现的。后来，买索尔和奥里萨也有了这样的合作社<sup>②</sup>。

孟买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阿姆·皮·德赛在印度农业经济学会第 18 次年会上作报告时，列举佃农占优势的合作社和农村劳动者所组织的合作社种种失败情形。并说自耕农占多数的合作社，因耕地过于分散和细碎，不易从事集体耕种而徒拥合作社的虚名。他竟断言，“最近十年来以坚决要建立自耕农制为土改政策，

① 印度新闻处新德里 1960 年 2 月 17 日电。

② 《土地改革各组联席讨论会报告》，第 210—226 页。



势将阻碍农业合作社的发展”<sup>①</sup>。可是，我们知道，印度土改并未打开“耕者有其田”的局面。在地主占优势的村庄里，合作社是很难发展的。这位教授看错了问题，以为合作社的障碍是自耕农而不是地主。实际上今天反对土改的，主要是为大资产阶级所支持的地主。反对合作社制度但利用合作社名义回避土地限额的也是他们。

政府计划委员会土改各组 1955 年举行联席讨论会时，一位委员曾这样说过：“现在有些人家拥有较多耕地，有些人家拥有较少土地，还有些人家一寸土地也没有。农村中地权如此分歧，以致合作社的收入不易分配而合作事业遭遇不少困难，因而无法扩大农业生产。”<sup>②</sup>除这种经济的困难以外，合作社当然也有无可避免的社会困难，即农民在各种种姓组织之下不易毫无顾忌地互相往来而发展合作制度。这就难怪 1957 年比哈尔邦农业经济专家西·皮·沙斯特利在他的北方邦调查报告中说：“总之，如果要问合作组织是否导致农业生产率的增进，答案是否定的。但为要正确地了解这个论断的意义，必须声明我们好像是对不存在的事实加以一个判断。更明确地说，我们所调查的农场名义虽属合作社，却缺乏合作社农场应有的东西，就是合作的精神。”<sup>③</sup>事实已普遍地证明，封建生产关系没有改变以前，印度农民是不可能合作社里同地主和富农合作的。

## 五 国大党政策的本质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印度已经办了 10 年以上，总数也不过

① 《印度农业经济季刊》，孟买，1958 年第 1 期，第 67、72 页。

② 《土地改革各组联席讨论会报告》，第 43、47 页。

③ 《印度农业经济季刊》，1958 年第 1 期，第 160 页。



1000 余，而且基本上是伪装而非真正的合作社。印度农民依然处于无地或少地的状态。据估计，无地和少地农民在印度还占农村人口总数的 3/4，看下列一表便不难明白。

1955 年印度耕地的分配情况<sup>①</sup> (%)

等 级	所占村户	所占耕地
无地者	22	—
占 3 英亩以下的	18	6
3—5 英亩的	35	11
5—10 英亩的	12.5	16.5
10—25 英亩的	8.5	32.5
25—40 英亩的	3	14
40 英亩以上的	1	20

上表最后一项包括拥有 100 英亩以上的大地主 10 万户左右，其中几千户更是各有 250 英亩以上的大地主。在这种地主占绝对优势的局面下，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合作化运动了。要想很快地促进农业生产和增加国民收入也是没有希望的。

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铲除是土地改革的中心问题。印度国大党秉政十多年来并未使农民获得多少耕地。现在柴明达尔仍然保留他们的一部分土地，分了一部分土地给新的地主，只是将其余一部分交给政府。印度土改无非是统治阶级内部重新分配土地，对于农民来讲则是一个未兑现的、也可以说是欺骗性的谎言。

旁遮普大学伐希学院经济系主任古普塔对国大党的改良主义政策曾表示过这样的意见：“我们土地改革的许多措施，表面看来好像很凶猛，实际并不如此。这些措施也证实了农民的地位并

<sup>①</sup> 根据印度联邦政府财政部 1954 年下半年所作 704 村的全国抽样调查和其他地区的局部调查，可参阅印度财政部，全国抽样调查第 8 次，1958 年德里出版，有马哈拉诺比斯所作序言。



未因此而有任何改进。……土地改革并没有做到它所应当做的事，因而就让农村原有情况拖延下去。……国大党政府也许以为更有效的土地改革会引起共产主义的嫌疑，它丝毫未曾认识到农村广大群众的福利全靠这一个改革。”<sup>①</sup> 这种意见不是没有根据的，而且还应该说，这是代表印度一般民众的看法。

(原载《新建设》，1962年7月号)

---

<sup>①</sup> 爱处·西·古普塔：《不发达国家经济计划的问题和程序》，阿拉哈巴特，1958年，第192页。



# 历史学



## 好心的对外政策<sup>\*</sup>

伟大的美国人率先无私地尽力帮助地球上最不被理解、受歪曲最多的民族，为近百年来的历史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一般说来，美国愿意公平地对待中国，给我们的人民留下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印象。在因其现状而引人注目的中国人身上有一种值得称赞的品质，那就是，中国人不会忘记别人对自己的好处，美国的帮助现在及未来许多年中都会受到我们的感激。

我们怀疑日本人，尊重英国人，而喜欢美国人。但是，或许正是由于我们的喜欢，我们已经对美国人感到很多的失望。美国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显示出不容误解的善意，但是，它也表现出某些看来不够明智、缺乏远见的方面。推迟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在为重建中国提供财政援助方面犹豫不决、《蓝辛—石井协定》和威尔逊总统对山东问题的态度都只能使我们失望——令人不解的强烈的失望。由于美国的东方政策肯定会成为这个国家基本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应该弄清真相，并适时进行补救行为。

---

• 本文是陈翰笙 1919 年在美国波莫纳大学毕业时的学士论文。





1913年初，C.C.王博士，一位当年中国出席国际商会会议的代表，说道：“在过去7个月中，中国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和冒险，抢先演出了她伟大的（革命）戏剧。她跑完了历史上已知最艰难的马拉松。在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终点后，她紧张而自信地期待世界给她以每个这样的运动员都应该获得的承认。她首先向美国伸出了她的手，因为她愿意让她最好的朋友首先给予她这一应得的奖励。”鉴于使中华民国得以成立的革命的特点，她一开始就应该得到迅速的承认。这一革命以最小的流血换取了最大的自由。与其说它是一次革命，不如说是一次进化。它最有力的因素是和平的而不是战争的。这些因素是对外贸易、现代发明的引进、在外国大学中受过教育的中国学者和致力于在中国建立共和政府的中国学者的影响等造成的结果。比较一下西方世界争取自由的那些划时代的战争——法国大革命、英国捍卫议会权力的战争或美国七年独立战争——中国的革命几乎是不流血的。

此外，满族统治者并不是被非法推下御座的，他们自己放弃了皇位，用他们最后的行动使民国合法化。既然中国下台的政府本身已承认了新政府，其他国家有什么理由推迟这一承认呢？

在承认与否上不仅有原则问题，也有一些策略和利益方面的问题。美国的迅速承认本来会加强中国政府的力量；本来会增加中国政府的威望，从而加速秩序的完全恢复；本来会为商业企业的安全提供保证；最重要的是，本来会阻止那些心存覬覦的国家的干涉，后者一直在等待时机分割中国的领土。北京大学前校长W.A.P.马丁博士就是为此而想到了适时承认太平天国政府的重要性。1912年，中美两国很多国际法专家和学者迫切要求美国立刻承认这一新的共和国，美国的中国社团最初就是为了促进承认的目标而成立的。

为答复美国公众的意见，国务卿布赖恩于1913年4月3日



宣布，美国政府打算在4月8日承认中国。然而由于这位国务卿基本上是在国内从事政治活动，对于在对外政策方面采取独立行动显得过于胆怯。为了清除由美国脱离六强银行团造成的任何痛苦，他建议在承认新的共和国方面采取一个共同行动。尔后来自一些强国的反对，使美国将承认中国推迟到了5月2日。巴西，南美洲最大的共和国，在此前3个星期承认了中国。

可曾有美国对外政策专家怀疑过，如果海约翰1912年在国务院里，中华民国会在4月8日以前长时间得不到承认吗？如果这样一项政策在满清王朝退位之后立即实行，中国本来可以避免1913年春天威胁着她的大部分危险。大部分美国人从一开始就一直对中国争取自由的斗争满怀真挚的同情，但由于伦巴第人街或华尔街的意见或者说是命令，承认确实被推迟了。在美国正式承认8天以后，我们在《展望》上看到了如下的批评性的社论：“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我们的帮助，但她特别需要这一帮助是由于其他强国看来无意于承认她的新政府。……如果我们能够与其他强国一致行动来为中国的将来作计划——我们愿意认为这是无私的——那么也很好。但是，如果英国、俄国或日本自私自利地退缩了这不能成为我们改变态度的理由。无论一个人多么希望中国能有更好的环境，政府能够更为稳定持久，都必须承认，中国已经充分显示出她具有建立一个立宪政府的能力，在君主制统治下，这是应该受到称赞的，而在共和制统治下就更值得称赞。”

建立如《展望》的编辑所说的这样一个“值得称赞”的政府，意味着开创一场新的改革运动，这一运动要深入到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不可能重建一个国家的全部社会、政治和工业生活。美国向密西西比河的发展是由欧洲资本提供资金的，日本过渡为一个现代工业国家得到



了英国银行家的帮助。为了自己的重建和发展，中华民国也必须要求外国金融家的帮助。美国本来能够在一开始就对中国的需求做出坚定的回应，因为美国已经发动了一场以“金元外交”而著称的运动。

尽管“金元外交”并不限于中国，但这一政策最重要的还在于中国。它是美国国家发展的一个合理的表现形式，美国出口贸易持续增长，国外市场对制造业者来说正在一年比一年更为必要。这一新政策致力于确保美国资本分享中国资源开发的机会。因而，在中国革命尚在进行时，国务卿诺克斯 1913 年发出一个照会，建议对中国采取不干涉政策。他的“金元外交”在 1910 年使他实现了南满铁路中立化的意图。这一有远见的政策来源于对中国日益增加的经济兴趣。“为在新中国的发展中成为经济领袖而进行的斗争很可能是本世纪历史的一个推动力。美国企业和美国商人的组织能力，加上美国工程师和工人的技术能力，应该赢得这场斗争。”

1909 年春天，国务院迫切要求采取行动使美国资本参与湖广铁路贷款协议，美国为此组成了一个财团，其成员有 J.P. 摩尔根公司、库恩·洛比公司、第一国家银行和国家城市银行。这一财团对中国贷款事宜极感兴趣，正是在执行塔夫脱和诺克斯政策时，就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美国财团与英国、法国和德国银行团出于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的目的，签订了一个协议。

出于政治原因，日本和俄国银行团尽管以前没有贷出过款项，在 1912 年 2 月被接受加入债务重组的会谈。与其他人相比，尊敬的威拉德·斯特雷特一直保持着乐观的态度，认为六强贷款是“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在财政上的体现”，是保存中国完整性的一个担保，而不是毁灭它的工具。但哈佛历史学家阿尔伯特·B. 哈特在他的论文《为中国成立的新神圣同盟》中说：



“当前这一神圣同盟是个商业组织，本质上是个欧洲人和美国人从中国挣钱的运动。作为一个赢利企业，六强的财政计划超出了我们国家利益的合理范围。”

把原则上的争论暂时搁置不论，事实真相是，中国当时极为需要外国贷款，需要一笔由六强共同提供的贷款。由于极端不合理的条款，中国于1912年6月22日拒绝了这笔贷款，希望列强会重新考虑它们。这一犹豫“可能造成拒绝承认中华民国，以便能够对其施加压力”。当然，如果美国是无私和聪明的，她本可以利用她的斡旋来影响其他强国；即使做不到，她难道不能立即退出六强吗？威尔逊总统和他的国务卿的所作所为比让中国失望更甚。这位总统不但没有单独承认中华民国，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由美国单独提供一笔贷款，而且莫名其妙地忽略了远东的危急局势；甚至当他已经明白美国银行家应该从六强银行团中撤出时，他也没有在其他强国得到满意之前先行正式承认中国。中国人会记住，在五强银行团贷款条约签字，或者说是中国被迫签字之后6天，E. T. 威廉宣布了美国对袁世凯政府的承认。

美国从六强贷款中撤出，引起了各种不同的评论。很多欧洲报纸认为美国的逃跑就像奥立佛从贼窝中跑出来一样。H. 罗森塔尔先生说：“尽管很明显美国在中国的商业中没有占有对他们合适的应有的份额，对于其他强国用既不人道又不文明的手段建立‘势力范围’的行为，美国还是不可能加入也不可能对抗。”H. 罗森塔尔先生在这里所表述的看法，我以为，可能是美国公众普遍的意见。但是，如果美国不能与其他强国一起在中国建立金融统治，她也决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大国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1916年试图使美国相信她可以用美国资本来建设中国，但美国资本家对日本人的思维过程没有太大的信心。涩泽男爵对美国的访问没能实现其目标。



随着世界大战的结束，国际银行团的重建看来势在必行。美国人现在要自己行事了。他们知道中国迫切需要协同一致的财政援助，而他们现在正处于给中国以财政帮助最好的位置上。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的银行家们一直在为这种局势而努力；据说在 J.P. 摩尔根公司的托马斯·W. 拉蒙特参与之下，已经达成了一项与和平会议有关的理解。芝加哥对于安排美国几年以前的贷款的兴趣并没有丧失其活力。约翰·J. 阿博特，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的副董事长，目前正在北京为美国银行家组团参与这笔 1 亿美元贷款的情况进行调查。

这里，“国家”看来是在批评美国政府的前后矛盾。“1913 年它（政府）从规划好的中国贷款团中退出，是由于，用总统自己的话说，贷款条款‘极为接近于触犯中国的行政独立’。而现在的贷款显然是在用来保证让不情愿的中国人在一个包含了不公正的山东条款的和平条约上签字，还有国际联盟，其联合军事力量可以作为协约国在中国和其他任何地方的财经安排的后盾。在这种安排之下的‘中国的行政独立’可能还不如一个影子。”

我不打算评论这种批评是否公正。但中国必须前进；为加速发展步伐，外国资本是极为需要的。中国政府宁愿从一个列强的联合体手中获得贷款，而不愿从像日本这样的单个强国手中获得，如果能够保证贷款来自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名副其实的国际联盟，那就更好。如果未来的贷款存在任何与 1913 年的行动不一致的地方，那么它与 1913 年后的“金元外交”却可能完全一致。

中国人不得不同意托马斯·F. 米勒德先生 4 月 5 日所说：“在中国问题上，一个不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财团，或没有得到美国赞同与合作的计划，是不能让中国人接受的。”米勒德说，他知道“大部分中国人现在正充满希望地期待着美国在和会上为中国的利益进行友好斡旋；如果我们（美国）的政府没有负起这



一责任，它将失去中国人的信任和尊敬，并在未来的很多年中降低它对于远东事务的影响。”令人吃惊的是，他的预言很快就显示出了其正确性，因为在著名的山东问题上，威尔逊总统的诚意不仅受到中国也受到全世界严重的怀疑。即使总统确是真诚的，而且一直坚持实行一种善意的外交政策，也无法说他对远东局势有透彻的了解。他可能以为日本会尊重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著名的《蓝辛—石井协定》肯定也落入了同一范畴。

1914年11月16日，德国人放弃了青岛市，德国在远东的陆军和海军部队被清除。日本此时有了一个机会审视受到战争影响的世界局势，以及东方与它的关系。到那年年底，显然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国家的结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看来日本面前出现了一个满足其形形色色的领土野心和经济野心的不均等的机会。如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这些野心和目标是：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地位和利益；巩固日俄战争中赢得的满洲领土并把蒙古的一部分加在一起；取得对中国钢铁生产的部分控制；不允许对中国任何海港或沿海岛屿订立租约，以保证日本的军事安全；如果可能的话，与中国建立紧密的经济、军事和政治联系，直到使中国，带着她所有丰富的资源，成为日本的属国！这五个目标都在1915年1月18日提交中国的“二十一条”中表述出来。

除去极少的目光短浅的记者外，大部分作者都强烈主张美国外交已经到了该对美国的姿态做出公平合理的说明的时候了。但是，由于美国除了发出一个照会外什么都没做，中国被迫把某些具体的特权和利益转让给日本。日本在山东和满洲的地位完全推翻了原有的势力平衡，强烈地预示出，在日俄战争之后的年代里出现的投机、恐惧、竞争和随之而来的发展等等，完全可能在欧洲战争结束之后卷土重来。这种状况引起了关于日本对中国的最终意图的各种各样的猜疑，看来有必要作出某种正式的评论以澄



清真相。

在第二十一条提出时，如前所述，美国是惟一反对对中国的权益有任何侵犯的国家。在试图推翻民国恢复满清王朝的骚乱时期，还是美国对中国提出了明确的劝告。在1917年8月14日之后的一个月，中华民国追随美国采取的步骤。正式对德奥帝国宣战。美中两国间形成的最紧密的联系，看来对日本的远大前程生死攸关，在这样一个计划中，任何障碍都会受到忧虑的眼光关注。一位资深的日本记者足立金之助说过：“在日美关系中，中国——而不是加利福尼亚——一度是个火药桶。”因此，日本极为需要美国做出保证，使它目前与中国的关系得以继续下去。此外，俄国退出协约国造成的损失，加强了美日之间实现目的和手段的明确统一的需求。看来有理由相信，美国受到了一定的压力，要求它承认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在石井子爵和蓝辛国务卿在华盛顿进行了一系列会谈之后，于11月2日签订的协议，使美国明显的以牺牲中国和它自己的利益为代价而屈从于日本。该协议中有两项重要条款：美国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美日双方重申他们自己遵守“门户开放”原则和中国的领土完整。

这两个条款自相矛盾。“特殊利益”意味着商业特权或政治特权，这些特权直接与“门户开放”相抵触。英日之间1905年关于朝鲜问题的条约中存在着同样的矛盾。该条约签订三个月后，日本就对朝鲜行使了保护国的权力；五年以后朝鲜正式被吞并。《蓝辛—石井协定》引起了历史是否会重演的巨大忧虑，特别是中国方面更是如此。“特殊利益”这一术语相当含混，对日本来说它可以代表一切。在这种含糊其词中存在着今后对其歪曲解释的可能性。

协议中提出了“领土的邻近产生国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因而日本有资格提出“特殊利益”的名目。我们知道美国和加拿



大之间也存在领土的邻近；前者要求建立互惠的特别关系；但当加拿大不愿意建立这样的关系时，并不存在用武力强迫建立的问题。看来领土的邻近并不是违背相关民族的意愿获得特权的充足理由。进一步说，如果领土的邻近被其他强国普遍承认为建立特殊关系的理由，那么“菲律宾与中国领土的邻近和日本及其附属岛屿与中国领土的邻近只在程度上略有差异，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后者的领土邻近是特殊利益的基础，前者的领土邻近又会成为什么呢”？

或许这里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没有参加这些会谈。美国，尽管对中国满怀善意，却严重地忽视了中国的主权。中国一知道这一有争议的协定，就向美日两国政府发出了一个正式的声明以避免误解，该声明明确了一个观念，即，中国对特殊利益的承认，只限于在中国是签约一方的那些有生效能力的条约和协议中所规定的。

关于日本保证不允许对中国领土完整或独立有任何侵犯，“中国通讯社”，如1917年10月6日的《密勒氏评论报》所引述的，说：“石井男爵声称，日本‘准备抵御任何入侵以保卫中国的独立。’”这真是好事。世界上仅有一个国家对中国有威胁，如果日本愿意保卫中国抵抗那个国家的入侵，中国就得救了。如果日本，坦率地说，会保卫中国抵抗日本的入侵，那就再好不过了。

《蓝辛—石井协定》在阻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方面没有一点实效。正如卡尔·克朗在其发表于《日出》上的文章中所说，“我们完成了中国墙”，“这样一来可以看到，当我们在欧洲为小国的权利而战斗，为使世界民主体系安全而战斗时，我们却为了太平洋现时的安全，抛弃了捍卫中国的权利的政策，撤除了使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共和国不受侵略的最后一道防线”。





对于美国对中国的善意来说，《蓝辛—石井协定》的精神几乎无法说是正当的。这一协定已经并继续令中国人极为失望和沮丧。很多美国人也感到了这同样的失望。但人们很容易会被引导产生一种并不真实的乐观情绪。中国尽力忘掉这种失望，怀着对协约国用作正义和世界持久和平的基础的崇高原则的无上信念参加了和会。啊！在山东问题上她再度感受了惨痛的失望。如同米勒德先生3个月以前所指出的，中国对一个新时代的曙光的信念被粗暴地打碎了。

无论是用公认的国际法的原则来检验——这次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这些原则的神圣性——还是用和会上公开宣布的14条指导原则来检验，胶州和德国在山东的利益都应该无条件归还中国，然而，在日本退出“国联”的威胁下，三巨头会议，包括怀有一切善意的总统本人，提出了一个解决山东问题的建议，把以前由德国拥有的一切权利转移给日本；日本则承诺把山东半岛的主权完整归还中国，同时保持在青岛建立租界的权力，并保有以前德国所享有的经济特权。这些特权指288英里长的胶济铁路，铁路两侧的矿山和两条待建的铁路，这两条铁路将把山东和从北京到长江流域的两条大干线连接起来。

因而，最后的结果是，在山东的一个外国势力被另一个取代。这有什么不同？确实，日本以其名誉担保，承诺把山东半岛归还给中国。在最近几年中，日本许下了许多诺言，以名誉担保答应做许多事情，全世界都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机敏，他们用“承诺归还”这样一个简单的句子，至于在什么时候，怎样归还，则留给世界去猜测——是无条件还是有另一个二十一条。

确实，中国没有派出士兵到欧洲国土上参战，但她至少派出了1750名劳工上战场，他们冒着战争的危险，为减轻协约国的



军事负担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而日本士兵在哪儿呢？难道让全世界寄予如此大的希望的和平会议，就只是一个瓜分战利品的会议吗？即使假定事实如此，当较强的盟国获取利益时，并非牺牲共同的敌人，而是以牺牲较弱的盟国的利益为代价，这样的分配能说是公正的吗？全世界一直被要求相信，这次战争是一次伟大的为道义的斗争，同盟国奸诈残忍，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公正；但是，当一群朋友中的一个成员得到许可割断另一个成员的咽喉时，我无法想象还会有比这更坏的东西。

用中国出席和会的代表之一顾维钧的话说，“由于三巨头会议对山东问题采取的行动，中国人民不仅大吃一惊，而且受到了很深的伤害”。2月份在伯尔尼任命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于今年5月16日谴责山东问题的“解决”是对征服者权力的公开承认。威尔逊总统的14条很奇妙，但这14条却是如此奇妙地被迅速忘掉。这位像他本人一再宣称的那样，代表真正伟大的美国人民的伟大的总统，在山东问题上没有尽力保持坚定的立场。这件事和其他一些事使民主党和共和党，他的朋友和敌人，都对他的真诚产生了怀疑。

威尔逊总统对日本的态度可能仍然像他在《蓝辛—石井协定》中所相信的一样，认为日本将真正维护“门户开放”政策。他在山东问题上的误解看来是出于他对日本在远东贪得无厌的野心的忽视。他的行为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住在卢特利亚酒店的中国代表团的王正廷先生。他与英法一起搞了一个解决山东问题的草案，就好像他有意识地忽略众多美国资深记者的看法。1916年，乔治·B·李先生写了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标题是“结束门户开放”。同年7月，乔治·哈维先生写了一篇社论，“关闭中国的门户”。B.W. 弗莱舍先生在他1919年4月17日论“日本广告商”的社论中说：“上议院在不止一个方面成为日本国



家机器中最重要的因素，那些在《时事》（一家日本报纸）上发表看法的贵族议员们对种族歧视引起的不安不屑一顾，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远东事务上。‘种族问题’他们说，‘与中国问题相比是不重要的’……这些议员们显然把日本的特殊地位看作独一无二的……事实上，这些议员们在他们的需求表中似乎忘了一件事——门户开放。”王正廷博士4月4日在巴黎对《纽约先驱报》的一位记者说，“过去，在一个军事国家的剥削和控制下，世界无法充分看清中国和她的巨大的自然财富和力量。这个国家过去25年的历史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证明他们关闭了打开的门户，抓住了所有的机会和特权，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国民的利益……在他们势力范围内的每一扇开放的门户上，他们都对所有其他国家贴了一个通告：‘退出’”。

现在，如果山东被割让给日本，东方大普鲁士主义将受到鼓励，世界和平将被破坏还会有什么疑问吗？怀疑论者可能还会要求西方必须与东方合作。看来很难相信文明会使所有国家成为一个大家庭。但是，5年以前难道不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到美国本来可以在欧洲战争中放手行事吗？战争用了3年时间显示出这场战争是两种原则之间的战争——独裁和民主。在看到一个大普鲁士主义的行为和另一个大普鲁士主义的扩展之后，我希望我们用不着重复同一个过程。由于缺乏道德勇气阻止在欧洲的非正义的作法，美国被迫以数百万的生命为代价参加战争以纠正错误。美国会从美国付出了如此高昂代价的这场战争中吸取教训吗？我们是否要信奉那句格言“一盎司的预防胜于一磅的治疗”，亦或我们已经准备好再打一场战争？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许许多多母亲眼中的泪水，许许多多情人手臂上的金星（美军阵亡后，军方颁发金星徽章——译注）。还有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数以百万计的人民饥寒交迫。



创造未来是世界强国的责任，如果要保证民主世界的安全，未来的幸福将主要取决于一个民主的中国。如果全世界所有人口排成一列，每4个人里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大部分美国人在听说这一点时，都可能会大吃一惊。中国领土面积超过了整个欧洲大陆。仅仅是煤这一种产品，中国的产量就占了亚洲的5/6。中国丰富的资源的开发和建设将给全人类带来好处。它们能够帮助那些饱受蹂躏的地方，那些受战争破坏的地方复苏。这就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的强有力的理由；这就是阻止东方大普鲁士主义，即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日本的威胁的强有力的理由。

重新考虑山东问题的解决还有一个充分的可能性；美国必须毫不犹豫地拒绝日本的征服权。犹豫不决总会引起麻烦。我们希望诸如推迟承认中华民国这样的迟缓软弱的政策将不再重现。软弱和摇摆会损害国家的声誉。如果美国政府不打算让《蓝辛—石井协定》引起任何危险的误解，它应该设法废除这一协定，或者至少对其做出一个限制性的补充。代替退出银行团的消极政策，美国现在看来对中国采取了一种强硬的、积极的、有活力的、有进取心的对外政策。美国不再口头谈论“门户开放”，而是要实行它。她开始尽力使对外政策变得真正明智，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善意的政策。

美国人可以宣布，历史使他们有权自认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这并非过分的骄傲。在过去威尔逊执政的几年中，很可能这一友好“勋章”挂“颠倒”了，我们肯定不能把它再正过来吗？

（原载《陈翰笙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

史建云 徐秀丽译）



# 1912—1913 年的伦敦大使会议， 暨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外交研究<sup>\*</sup>

## 导 言

巴尔干问题，这个“历史的实验室”，在最近的 15 年中，一直是长在欧洲背上的一个毒疮。阿尔巴尼亚问题就是那可怕的痂疽的最明显的炎症；巴尔干同盟是它在化脓；而 1912 年的巴尔干战争则使它溃瘍穿孔。欧洲有个江湖医生，即伦敦大使会议，他随身只有膏药和碘酒，根本不能治毒疮；只能加速致命的腐烂过程。从历史的观点看，1914 到 1918 年的世界大战间接的起因于阿尔巴尼亚炎症的变化。

庸医就是庸医，外交界的江湖医生有他们的共性。后来，1919 年在巴黎召开的四国会议并不比伦敦大使会议更好，两者都是遮遮掩掩的达成妥协，两者实现和平都是违背正义和自由原则的权宜之计。至少，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有一点应该是很清楚

---

\* 陈翰笙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论文，1921 年。本文的部分注解，因年代久远，已无法查找出完整的名称，故保持原貌。——编者注



的：膏药和碘酒决不可能消炎。除非杀灭所有细菌，炎症不可能消失。外交看起来好像只不过是自大狂的阴谋诡计；但它们有它们的根源，它们代表着人类最广泛的永恒的组成部分。如果政治争端曾经得到过正确的解决，它们的起因、详情细节和结果都应该认真研究。只有江湖医生才会让自己受形式和现象的欺骗。

## 起 因

即使是现在（1921年），阿尔巴尼亚问题也还远未解决；火种在孕育，在爆发成熊熊烈火，但已不再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诞生了一个新的因素，带来了更复杂的局面。问题的复杂性是由众多综合力量引起的。实际上，1912到1913年伦敦大使会议的原因和结果就有很多不同的方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有外在的也有隐藏的。

当然，如果我们知道阿尔巴尼亚是土耳其欧洲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土耳其欧洲领土又是破坏欧洲外交均衡的政治病的一个软弱的易攻破的环节，我们应该很容易的估测到这一问题的深度。大使会议导致阿尔巴尼亚的建立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不能说是个偶然事件。就在20世纪初，还曾有一封地址直接写着“阿尔巴尼亚”的信被从纽约的阿尔巴内退回来，信封上盖着“试投欧洲”的戳记。<sup>①</sup>但在1912年，阿尔巴尼亚炎症开始显现出来；当时流行的观点是，“要想满意的解决阿尔巴尼亚问题，就必须解决土耳其欧洲领土的未来；而为土耳其问题规划的任何解决方案，如果忽视了阿尔巴尼亚就必然会失败”。<sup>②</sup>由于

① 皮科克：《阿尔巴尼亚》，第5页。

② 《当代》第275卷，第810页。



其国际关系，阿尔巴尼亚忽然之间变得名声显著，而它的国际关系之所以重要是由于阿尔巴尼亚的地理位置。由于距意大利仅有39英里，占据着亚得里亚海的战略要地，阿尔巴尼亚成为塞尔维亚、希腊、奥地利和意大利争夺的筹码。发罗那、都拉斯、卡瓦尼等良港与意大利一侧沙质的、污泥缓慢蠕动的沼泽海岸形成鲜明的对比。发罗那就是亚得里亚海的直布罗陀，如果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就能够控制沿岸所有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奥地利不愿意看到塞尔维亚控制阿尔巴尼亚；意大利决不能容忍希腊得到科孚的北部。这也是为什么俄国支持塞尔维亚在阿尔巴尼亚的要求，而法国则支持希腊。<sup>①</sup>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圣斯特法诺和约》，就能够很容易地看出保加利亚的扩张计划。这一和约把阿尔巴尼亚的重要城市如斯特鲁加、奥赫里德、科尔察和迪布拉置于保加利亚的控制之下；它非常可能为保加利亚打开通往亚得里亚海的道路。塞尔维亚在阿尔巴尼亚的宣传与在马其顿的宣传没有什么不同。通过普克和贾科瓦这样的宗教中心，塞尔维亚的牧师们指导了一场正式的系统的战役，以使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化。塞尔维亚的学者们毫不迟疑地支持了某种远比感情激动的号召要敏锐得多的理智的宣传。新帕扎尔的桑贾克和严格意义上的旧塞尔维亚从历史范畴上讲完全应该属于1912年的阿尔巴尼亚，然而贝利茨、康德切夫和茨维克等先生却坚持塞尔维亚应该拥有它们。<sup>②</sup>

正如塞尔维亚进入北部一样，希腊渗透进了南部。希腊的利剑带着宗教和商业这两面锋刃，不仅刺入了伊庇鲁斯，而且刺入

① 利希诺斯基，第6页。

② 国际委员会报告，第158页。



了科孚以北的地方。<sup>①</sup> 泛希腊主义是对泛德意志主义或泛斯拉夫主义的更激烈的竞争。但它太过于自负了，完全无视阿尔巴尼亚民族的自决权。希腊精神欺骗了自己，认为那些讲着普通希腊语的伊庇鲁斯人就是希腊人，而他们中占压倒多数的一直是弗拉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sup>②</sup>

如果说希腊对阿尔巴尼亚的兴趣至少还是从爱奥尼亚的商业立场出发的话，意大利与阿尔巴尼亚的紧密的商业联系则是越过了亚得里亚海。按照 P. 龙兹先生在巴黎《时代》上所说，<sup>③</sup> 阿尔巴尼亚在土耳其人统治下时，从这个皮鞋王国进口了 600 万美元的商品，其中大部分是谷物、酒、香料、干果和印花布。每年 40 万美元的毛皮、50 万美元的橄榄油和 50 万美元的木材，大部分输往意大利。意大利想要从可怜的阿尔巴尼亚身上咬下一口肉的渴望，绝不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之下。为了她的商业和商人，她对阿尔巴尼亚事务必然有着急切的兴趣。

但国际竞争和国际纠纷并不限于阿尔巴尼亚周围与其直接交界的国家。所有强国对巴尔干半岛——这一通往近东和远东的通道——或多或少都有着经济或战略利益。奥匈帝国不满足于在亚得里亚海顶端的几个二流港口，她希望，强烈地希望，在蓝色的爱琴海边有一座不比萨洛尼卡小的城市。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桑贾克和旧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人的居住区，必须成为她的脚踏石。多年以来，奥地利不断在北阿尔巴尼亚的一些重要中心城市建立领事馆，目的在于安排并保持对于奥匈帝国的宣传。<sup>④</sup> 奥匈帝国政府特别对泛斯拉夫或泛塞尔维亚运动感到愤

① 国际委员会报告，第 38 页地图。

② 霍格思：《地理杂志》第 41 卷，第 330 页，1913 年 4 月。

③ 引自《文摘》第 47 卷，第 5—18 页，1913 年。

④ 《当代》第 275 卷，第 809 页，1912 年；西顿—沃森，第 21 及以后诸页。





慨，按照他们最好的看法，塞尔维亚永远不应该被允许占据阿尔巴尼亚海岸。

德国，由于加入抢夺殖民地较晚，不得不通过巩固中欧、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地区来寻找一条新的通往东方的道路。在与布加勒斯特和君士坦丁堡保持友好的同时，她与奥匈二元帝国为进行一场泛德意志运动，更重要的是为向土耳其的和平“渗透”，结成了实体和精神的同盟。如果没有法俄同盟或英法俄三国协约，德国本来会修筑巴格达铁路；德国的学者和科学家们本来会遵循这一方针，开发小亚细亚和美索布达米亚的丰富资源；德国在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影响，会基本上把英国和法国的金融家们排除在由各种各样的特许权带来的巨大利益之外；而我们必须记住，德国的金融家们在世界的其他部分一直受到排挤，如果英俄之间的猜疑继续下去，俄国关于君士坦丁堡的政策就会像以前一样被终止；罗曼诺夫的掠夺欲望可能会采取一种新的形式；俄国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立宪政体，这一政体将能够比哥萨克和军队更为有效的把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芬兰人和波兰人统一起来。然而，所有一切中最有可能的结果，应该是更好的调整经济和清除政治危机。如果三国协约没有形成，同盟本来会消亡；1912年也根本不会有全面的欧洲大战的危险。

吉尔伯特·默里爵士<sup>①</sup>似乎认为，只要有一方就能挑起战争，而和平则必须双方努力。但其实这场欧洲大战本来是有可能不发生的，确实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如果德国向东方挺进的道路上没有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的话。正如1914年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全面的欧洲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斯拉夫人的政治抱负

<sup>①</sup> 默里：《E. 格雷爵士的对外政策，1906—1915》。



和德国人的经济野心之间的致命的冲突引起的。<sup>①</sup> 即使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和《圣斯特法诺和约》中，俄国都没有实现她的君士坦丁堡政策。但自 1870 年保加利亚的东正教区独立以来，俄国再也不能把“东正教信仰”用作她的面具了；从戈特恰可夫亲王时代起，泛斯拉夫主义就被用作了俄国的征服计划。1912 年，在亚得里亚海出口问题的争端中受到了俄国的袒护，她尽力以泛斯拉夫主义的名义支持塞尔维亚。尽管这一争端是个民族、政治和地理争议的混合物。

或许与俄国对塞尔维亚的抱负的支持有同样的强烈和确信，法国对希腊的感情也是异乎寻常的强烈。“法国总是觉得她对希腊欠下了一笔永远无法还清的智力债务，把希腊，这一文学和艺术的母亲，所要求的一切都给予她，远非出于对希腊的温情；这就是法国反对一个强盛的阿尔巴尼亚的最重要的原因。所有其他原因——对于奥地利在近东占优势的恐惧、与俄国目标一致行动的愿望——对法国来说都只是第二位的。”<sup>②</sup> 尽管如此，法国态度的一个更为历史性的理由可以与她在地中海的影响及其海军力量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她在海上的对手是意大利，与意大利进行迂回斗争是法国的国策。自从 1878 年的柏林会议以来，法国就一直支持希腊对阿尔巴尼亚南部的要求。<sup>③</sup>

根据当时的国际局势，在法国和俄国的影响之下，阿尔巴尼亚本来有可能被希腊和塞尔维亚瓜分；她也有可能被意大利和德国支持下的奥匈帝国瓜分。为什么当时在伦敦的大使们，看来正在联合和妥协，却没有忽视阿尔巴尼亚的独立？肯定是由于阿尔

① 布雷克福德，第 7 页。

② 奥布里：《亚洲评论》第 6 卷，第 247 页。

③ 达科：第 153 页。



巴尼亚的民族主义。没有民族主义，阿尔巴尼亚的自治在当时的环境下就不会得到支持，也不可能最终得到实现。与马其顿不一样，阿尔巴尼亚的领土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sup>①</sup>

大使会议必须承认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国地位，这一直是她无可争辩的权利。只有那些对她被瓜分抱有自私自利兴趣的国家才会对此提出疑问。<sup>②</sup> 有些人无法区分民族自决的意义和一个民族此时此地有无自我治理的能力之间的不同，他们可能会对阿尔巴尼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抱有怀疑。但无论其能力如何，都不能影响阿尔巴尼亚民族统一和建立独立的国家机构的不可取消的权力。作为一个历史名词，什奇普塔，如同阿尔巴尼亚人喜爱自我称呼的那样，是巴尔干地区最早的居民的后裔。因为直到公元550年之后，塞尔维亚人才越过了多瑙河；又过了129年以后，保加利亚人才来到半岛。此时阿尔巴尼亚人已经拥有这块土地约10个世纪。<sup>③</sup>

这是一个保持了纯粹性的民族。在十几个世纪中，尽管其居民移民到了希腊、马其顿、意大利和塞尔维亚；尽管曾多次被罗马人、拜占庭人、诺曼底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意大利人和土耳其人相继征服，阿尔巴尼亚的人口，与马其顿的人口不同，在整体上是同质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长颈窄脸的盖格人住在什库姆毕河以北；爱尔巴桑就坐落在河上。他们讲一种与生活在南方的托斯克人所讲的不同方言。总的来说，托斯克人是基督教正教徒，而盖格人是天主教徒；因而盖格人通常使用拉丁文为书面语言，托斯克人则使用希腊文。

① 格雷，下议院辩论，第55册，第1404页。

② 伍兹：《战争的摇篮》，第154及以后诸页。

③ 皮科克：《阿尔巴尼亚》，第178—179页。



但从 1908 年的莫纳斯提尔会议时起，阿尔巴尼亚的表音法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据霍尔格·彼德森说，这两种方言之间的差异要比大部分其他语言内部的方言差异小得多。<sup>①</sup> 大部分伊庇鲁斯人和下阿尔巴尼亚人，甚至包括维奥萨河以南地方的人，用希腊语经商；用希腊语作祈祷；阅读希腊文的珍本书。但他们用阿尔巴尼亚语谈情说爱、吵架和歌唱；他们用阿尔巴尼亚语向妻子求爱、教育他们的子女、与他们的长辈进行商谈。在土耳其人的偏执的重压下，可怜而又高尚的什奇普塔人尽力成功地使他们的民族特征和民族意识保持完整。一个阿尔巴尼亚人永远是一个阿尔巴尼亚人。无论他是东正教徒还是穆斯林，或者仍然是一个天主教徒，他永远被他的同族人当作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在半岛上没有一个地方有像阿尔巴尼亚人中存在的这样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性；<sup>②</sup> 如果说他们在很多方面还不够文明的话，那是因为他们作为腐朽的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生活在那个帝国遥远的角落里一个一直不稳定不安全的地区，因而经历了双重的损害；奥斯曼帝国从来没有强大到足以征服他们。

当时机到来时，这个诞生了皮洛士和亚历山大的民族，诞生了斯坎德培和列克·杜卡吉因的民族；这个在现代历史中为土耳其以至希腊和意大利提供了杰出政治家、航海家和战士的民族；这个以其勇敢、诚实和勤奋而著称的民族，不能容忍《圣斯特法诺和约》的条款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该和约显示出了俄国对于斯拉夫族人的同情的最高音。但它剥夺了阿尔巴尼亚领土的一半，给了其他的巴尔干国家。另一方面，它无可抗拒地引起了阿尔巴尼亚人的爱国主义。从全国各地召集了 300 名代表来到普里

① 达科，第 230 页。

② 见《评论季刊》第 228 卷，第 147 页。



兹伦；在沃斯·帕夏和普雷姆克·比布·多德、奥多·贝和阿布杜尔·贝·弗拉舍里的领导下，阿尔巴尼亚民族同盟于1878年6月17日成立。当时正在这个国家旅行的E.F.奈特，描写了阿尔巴尼亚的同盟运动，他说：“同盟正在发展得十分强大，政府已无法镇压它，即使政府十分渴望这样做。同盟成员们感觉到了他们的力量，发展了他们的纲领。保卫他们家乡的土地不受外国的侵犯现在不是他们惟一的要求，人们就在驻有军队的城镇的市场上大胆的讨论民族自决和摆脱土耳其的束缚。抵抗奥地利在北部和希腊在南部的推进，是同盟公开宣布的两个方针计划。”<sup>①</sup>

由沃斯·帕夏撰写的同盟的纲领宣布，阿尔巴尼亚国土一寸一分都不能被其他任何外国吞并；斯库台、科索沃、亚尼纳和莫纳斯提尔等省应该组成为一个自治省。英国知道这些要求是正当的，在柏林会议上对此表示了支持。如果戈申勋爵和E.菲茨莫里斯勋爵的想法获得成功，后来的许多混乱、流血和苦难都应该可以避免；巴尔干痼疾会在适当的发展阶段受到扼止。但遗憾的是列强无法达成一个协议；于是他们仅仅满足于对土耳其人的各省提出建议，进行某种行政上的改革，这些改革从来没有实行过。柏林会议为保加利亚人建立了一个公国，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移交给了奥地利，使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得到更大的领土，并加强了它们的独立，让罗马尼亚自治；但阿尔巴尼亚一无所得。

阿尔巴尼亚人必须为他们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就是他们当时决心要做的事。以1908年的“再保证计划”著称的英俄方案，目的是在土耳其实行有效的欧洲人的监督，因而使青年土耳其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惊慌。土耳其革命党人许下丰厚的

<sup>①</sup> 达科引用，第57页（注）。



诺言，邀请阿尔巴尼亚人一起推翻苏丹哈密德。起义在阿尔巴尼亚开始，当 10 万阿尔巴尼亚人<sup>①</sup>起来要求一部宪法时，苏丹不得不屈服。青年土耳其党没有帮助阿尔巴尼亚人；是他们自己帮助了自己。阿尔巴尼亚人自己举行了 4 次全国性的会议，建立了 66 个全国性的俱乐部、34 所全日制学校和 24 所夜校；组织了 15 个文学团体和 3 家音乐俱乐部；建立了 4 个印刷厂。发行了 11 份报纸。“经过 5 个世纪的斗争之后，人民开始自由的呼吸，并给予他们自己受教育的幸福。”<sup>②</sup>

不幸的是，青年土耳其党背叛了阿尔巴尼亚人，结果也欺骗了他们自己。冷酷无情而又强大的土耳其化的“团结和进步委员会”，所作的惟一的事情就是竭尽全力抑制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主义。一次起义不可避免的爆发了，起义由爱国领袖伊萨·布列提尼领导，外国的钱不能收买他，外国的枪炮也永远不能吓倒他。1911 年春天，青年土耳其党不得不妥协；但当他们逃避问题时，阿尔巴尼亚人的起义在下一年，巴尔干各民族关键性的一年，再度爆发。那确实是半岛生死攸关的一年；在年底以前，土耳其人被赶到了米迪亚—埃布诺斯一线以东，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濒临无政府状态。阿尔巴尼亚革命的胜利和青年土耳其党的垮台，肯定间接促进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另一方面，正是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使阿尔巴尼亚问题产生了国际纠纷；正是那场战争向欧洲发出了警报，直接导致了大使会议。

巴尔干同盟的形成将对战争的根源和可能性作出结论性的解释。还应该叙述一下阿尔巴尼亚纠纷的潜在的可能性和巴尔干国家在阿尔巴尼亚的彼此冲突的野心的背景。早期建立一个同盟的

① 达科，第 76 页。

② 达科，第 78 页。



无效尝试，显示出列强几乎没能提供什么帮助，除非同时巴尔干各民族能够帮助自己。1901年以后，奥匈帝国曾暂时几乎使拟议的同盟成为一个极为模糊的现实。为抵消《圣斯特法诺和约》，她已经在1881和1889年与塞尔维亚缔结了秘密条约，以保护她自己的亚得里亚海岸线；并驱使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在瓦尔达尔平原和马其顿西部发生冲突。<sup>①</sup>她与罗马尼亚举行了一次会谈，因而促成了希腊—罗马尼亚恢复友好关系，最终对保加利亚在阿尔巴尼亚的地位造成了威胁。但是，对于巴尔干同盟的未来幸运的是，1903年，罗马尼亚和希腊在马其顿的宣传发生冲突，引起了外交关系的破裂，结束了友好关系。在同一年，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一世遇刺。随着卡拉乔尔杰维奇王朝的复位，奥地利在塞尔维亚的影响开始衰落。1908年奥地利大胆地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她同时激怒了俄国。俄国所作的使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结成同盟的努力，使巴尔干人相信她支持一个面向多瑙河而不是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同盟。但尽管有俄国人的帮助，1910年圣彼得堡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会谈没有产生任何结果。<sup>②</sup>

单凭感情不可能建成同盟；严格的必然性必须从事实出发。由于阿尔巴尼亚人的起义，并利用土耳其军队衰弱的机会，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冷酷无情的“土耳其化”的基督教徒，才有适当的能力把一个巴尔干同盟从理想变为现实，从可贵的信念变为可以预见的曙光。在1911年9月底，保加利亚首相格绍夫与国王斐迪南在维希度假。在回索非亚的路上，格绍夫在贝尔格莱德车站会见了塞尔维亚首相米洛瓦诺维奇。在两个小时的会谈中奠定

① 《报告》，第39页。

② 《报告》，第42页。



了同盟的基础；在那个冬天漫长的谈判之后，1912年2月29日到3月13日缔结了条约。<sup>①</sup>没有任何理由能说明为什么保加利亚会与塞尔维亚而不是与希腊结成同盟。希腊早在塞尔维亚之前很久就提出了结盟的建议，希—保同盟则于1912年5月16日至29日缔结。<sup>②</sup>4月份门的内哥罗与保加利亚签订了一个协议，后来又与希腊签订了协议。但仅仅是通过保加利亚的中介，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同盟才于1912年9月缔结。这之前一些年中，门的内哥罗和塞尔维亚一直由于他们渴望扮演“皮蒙特”的角色，由于王朝的阴谋，由于尼古拉国王的反动政府而彼此怀疑。<sup>③</sup>

这时，巴尔干同盟已建成，并即将敲响土耳其在欧洲的统治的丧钟，但它也危及了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的生存。由于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秘密条约将分配战利品；有争议的地区甚至涉及到了俄国人的仲裁，包括阿尔巴尼亚的迪布拉和斯特鲁加市。<sup>④</sup>后来，当“团结和进步委员会”，如我们所知，允许阿尔巴尼亚人在马其顿和旧塞尔维亚的4个省实行自治时，引起了塞尔维亚的警觉，并提出建议，要把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在巴尔干国家间分割，成为4个势力范围。<sup>⑤</sup>作为对结盟的补充，巴尔干同盟之间缔结了一系列经过绝密筹备的军事协定。

欧洲对这些脓液一无所知，它是由巴尔干的脓肿引起的；欧洲也不了解阿尔巴尼亚的炎症；欧洲过于无知，没有帮助和促进以人种和种族原则为基础的自治省的形成。如果“及时”对发炎

① 《报告》，第43页。

② 《报告》，第46页。

③ 《报告》，第47页。

④ 《报告》，第45页地图。

⑤ 《报告》，第47页；切克雷兹，第60—69页。





部位动一点儿手术，本来是会有足够的机会治愈炎症的。如果伦敦大使会议在1912年举行，在5月，当土耳其给予阿尔巴尼亚自主权时举行，边界确定的问题本来会更容易解决；两次巴尔干战争肯定能够受到阻止。但欧洲那时在睡觉，欧洲没有“自我感觉”。奥匈帝国没有认真行事，俄国甚至打算使保加利亚离开塞尔维亚，使塞尔维亚离开保加利亚。俄国是斯拉夫大哥；他总是劝说同盟者应该避免任何种类的侵略行为。<sup>①</sup>

但突然之间，巴尔干同盟，包括俄国的小兄弟们，宣布了对土耳其苏丹的战争。一个月之内，令所有的旁观者大吃一惊，巴尔干同盟的军队越过了土耳其边界，击败了他们的军队，夺取了厄斯库和萨洛尼卡，占领了爱琴海上的许多岛屿，严密封锁了阿德里安堡，只是在要占领君士坦丁堡时才被查塔尔加防线所阻止。进展相当迅速，阿尔巴尼亚永远不可能有希望抵抗她的和平邻居们的征服激情。当1912年12月2日宣布停战时，塞尔维亚占领了桑贾克、旧塞尔维亚、库普鲁、佩尔列佩、莫纳斯提尔、爱尔巴桑、都拉斯和圣胡安。<sup>②</sup>在停战期间，希腊的炮艇没有停止炮击发罗那的未设防地区。<sup>③</sup>事实上，在全部阿尔巴尼亚领土中，发罗那和培拉德及这两个城市的郊区，是1913年4月底仅有的未被希腊或塞尔维亚或门的内哥罗士兵占领的地方——当时伦敦会议已经进行了4个月。<sup>④</sup>

阿尔巴尼亚人知道，塞尔维亚一直在反对一个“大阿尔巴尼亚”<sup>⑤</sup>，一直在为其通往亚得里亚海岸的出路而斗争，为其与希

① 《报告》，第47页。

② 扬，第229页。

③ 《泰晤士报》，1912年12月13日，第987页。

④ 《报告》，第55页地图。

⑤ 《报告》，第47页。



腊相邻的一片领土而斗争。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容忍土耳其人的胜利，因为那可能意味着他们与自主权“永别”。他们“进退维谷”。在战争刚开始时，他们为发表一个正式的隆重的独立和中立宣言作了必要的准备。民族英雄伊斯梅尔·凯末尔·贝·弗洛雷本人对所有这些详情细节作了很好的描述。<sup>①</sup> 完全可以说，在 1912 年 11 月 28 日，在发罗那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伊斯梅尔·凯末尔·贝，一位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前土耳其议会中代表该省的议员，被选为总统兼外交部长。一个有 18 名成员的参议院由普克的泽内尔·贝主持。<sup>②</sup> 伊萨·普里提那兹，一位反抗土耳其的起义的阿尔巴尼亚领袖，被任命为国民军的司令。马利索拉部族是信仰天主教的阿尔巴尼亚人，他们曾与门的内哥罗人一起与土耳其人作战，现在与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一起加入了国家独立运动。<sup>③</sup> 拜伦勋爵和加里波第是会愿意在这样一场运动中站在阿尔巴尼亚人一边的。

在 1878 年的柏林会议上，俾斯麦告诉阿尔巴尼亚的代表，“阿尔巴尼亚没有独立国地位”。1912 年的问题是，阿尔巴尼亚是否应该像塞尔维亚的解放那样，建立一个没有列强势力的国家；她是否能像希腊那样幸运，得到列强慷慨的帮助；还有，这个新的国家，是否会像罗马尼亚统一的过程那样，在列强的轻蔑之中取得独立地位。事实是，现在，这个巴尔干所有民族中最古老的民族明确地宣布了独立，因而，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和希腊的瓜分梦想破灭了。分别支持塞尔维亚和希腊对阿尔巴尼亚领土要求的俄国和法国，也都吃了一惊。奥匈帝国担心塞尔维亚将

① 《评论季刊》，第 228 卷，1917 年，第 140 及以后诸页。

② 《泰晤士报》，1912 年 12 月 13 日，第 987 页。

③ 《年鉴》，1912 年，第 356 页。



不去进攻阿尔巴尼亚，而是去占领亚得里亚海岸。H. W. 斯蒂德先生当时担任《泰晤士报》驻维也纳记者，一位奥地利高级官员交给他一份来自总参谋长巴龙·康拉德·冯·赫岑多尔夫的邀请，告诉他说，“解决棘手的南部斯拉夫问题最有把握的方法”是联合进攻塞尔维亚和俄国。当英国人指出奥匈帝国的泛斯拉夫主义态度很可疑，这样一种政策会产生巨大的风险时，这位奥地利贵族简单地评论说，这种冒险在最坏的情况下会导致“光荣的死亡”。<sup>①</sup> 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对抗立即尖锐化，两个国家都动员起来。<sup>②</sup>

一旦俄国加入战争，在巴尔干战胜国的帮助下，她本来有可能轻而易举地击败奥匈帝国。但由于德国从来不会容忍对其盟国的公开攻击，俄国不得不与中欧同盟作战。德国的军事优势一般说来是可怕的；而英法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不能容忍“权力平衡”遭到破坏。欧洲大战本来有可能不是在1914年，而是在两年以前的冬天偶然爆发。它没有在1912年爆发这一事实，迫使历史学家们考虑阻止了欧洲大战的独特的外交方式的可能性。看来战争得以避免是由于阿尔巴尼亚的国家独立；因为她不可能伤害任何人，仅仅由于她的实际存在，她就能够站在那些想要彼此伤害的人之间。但是列强出席大使会议的原因远比我们大多数人所想象的要微妙隐蔽得多。当然，这些“国际社会主义者”并不希望战争，至少当时不希望。这位《泰晤士报》记者从柏林写道，M. 若雷斯和麦克唐纳先生，与一位奥地利代表一起，将于1912年12月16日发表声明，反对对欧洲各国政府的事务进行

① 西顿—沃森，第24—25页。

② 《泰晤士报》，1912年12月29日，第941页。



和平威胁，反对一切干扰巴尔干事务的自私企图。<sup>①</sup> 无论如何他们的影响没有达到能够改变政府政策的程度。伦敦大使会议的真正原因是出于列强把战争限制于局部并推迟解决亚得里亚海问题的普遍的共同的愿望。他们一致同意用江湖医生的办法治疗阿尔巴尼亚炎症，就像如今外交界的庸医仍在走红一样。

列强参加大使会议的动机常常被曲解，并且总的说来更经常的被模糊的描述而对人产生误导。甚至一位阿尔巴尼亚爱国者也不加限制和保留地宣称：“英国支持阿尔巴尼亚的要求的动机是真诚的，意大利的动机是自私的，奥地利和德国的动机则是可耻的。”<sup>②</sup> 如果客观地研究历史，人们将会看清，在伦敦大使会议开幕时，所有列强已经达成了对于暂时和平的真正的期望。对于这一期望，他们或多或少都是真诚的，没有什么可耻之处。列强只在达成这一临时调解政策的方法和论据方面存在微妙的分歧。研究列强政策的发展和变化将能够解释使这次会议得以召开的那些遥远而又真实的问题。

我们首先从奥匈帝国开始。像任何其他君主国一样，二元君主政体的对外政策完全受王朝的利益和野心控制。那里存在着一种可怕的民族混合，这个坚忍的山地王国是包容了所有欧洲各民族在内的一个沸腾的蓄水池。德意志人占据了西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从西北逼近，波兰人和屈特尼安人来自北部和东北。罗马尼亚人住在东南边界。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一直向着北方推进。意大利人正在从西南方向前进。在中部是人数众多的匈牙利人与这些民族斗争以求发展。如果现存的二元体系，从而王朝的影响想要为了它自己的原因保存下来，为此而实行的有效的

① 《泰晤士报》，1912年12月15日，第906页。

② 达科，第120页（注）。



政策会要求德意志人支配奥地利的斯拉夫人，马扎尔人支配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和其他非马扎尔人。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对外政策必然是反斯拉夫和反俄的，即使不是在欧洲，也是在巴尔干半岛。尽管如此，对于奥匈帝国的政治家们来说，明显的是，为了统治帝国内的大部分斯拉夫臣民，必须把帝国置于德意志人的照料之下。当巴尔干大部分民族一个接着一个独立时，局势变得对哈布斯堡王朝不利。对外政策和国内政治是否应该更密切的与各民族的实力在数量上的平衡协调一致？亦或仍然遵循传统方针继续反对斯拉夫人？

任何传统的东西总是在求助于一种王朝精神。哈布斯堡精神很少表现出灵活性。有先例暗示出这一王朝会固守传统。俾斯麦和加富尔知道，哈布斯堡愚蠢的想要支配意大利和德国，而她国内的臣民却在专制主义的支配下，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1859年法国和山地人结盟的结果是把伦巴第输给了哈布斯堡。如果弗朗西斯·约瑟夫通过那次结盟变聪明了，他就会用适时割让威尼斯的方法，收买意大利人与之结盟。没有意大利人的帮助，奥地利不可能抵抗俄国人在德国的优势。哈布斯堡人在对外事务中一直是侵略性的，但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优先安排好自己家里的秩序。正相反，他们的国内问题时不时地按照王朝对外政策的利益所需来处理。

即使是在1859年粗暴的教训之后，皇帝也没有把君主政体放在国内联邦一体化的基础上，以便消除由二元王朝体系所引起的反复动摇的均衡而促进国家的发展。在制度上进行这样一种新的国内改革，使帝国有一个更好更独立的外交基础，超出了老皇帝的守旧思想。在失去威尼斯之后，他变得更害怕战争。当巴尔干的斯拉夫人在1912年取得对土耳其的胜利时，他肯定对他自己的斯拉夫臣民的蒸蒸日上感到十分恐惧。由于受到国内不安定



局势的威胁，他自然而然倾向于尽可能地避免与外国发生冲突。这就是为什么乔治·扬似乎认为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有和平主义倾向。<sup>①</sup> 此外，与 1908 年的情况不同，当时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吞并是与德国对圣彼得堡的最后通牒同时发生的，而在 1912 年，激进派的强权政治家已不再掌权。

奥地利的“教士—军人党”与犹太人自由党和财阀利益的结合不再控制政府，他们也不能成功地进行战争煽动。当总参谋长巴龙·康拉德·冯·赫岑多尔夫将军在埃伦塔尔及其追随者的压力下辞职时，战争阴谋使他们受到了打击。正如埃伦塔尔 1911 年渴望与意大利的友情那样，他的继任者，1912 年任职的贝希托尔德伯爵，迫切希望与俄国人友好交往，同时仍然坚持三国同盟。<sup>②</sup> 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致沙皇的亲笔信反映了这两个宫廷之间的友好情绪，并由戈特弗里德·冯·霍恩洛厄·希林斯弗斯特亲王送往俄国首都。<sup>③</sup> 看来当时作出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以使这位斯拉夫兄长忘掉由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而引起的不快。

奥匈帝国自己国土上南部斯拉夫民族的显而易见的危险，或许无可避免的加深了对来自俄国人的威胁的恐惧。考虑到塞尔维亚人 1912 年的胜利，和此前几年中奥地利政治家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帝国要按照自己的利益解决南部斯拉夫问题几乎是太晚了。1912 年年底，奥地利的很多地方和匈牙利的一些地方给人们的普遍印象是，哈布斯堡的盲目的政策使它达到了毁灭的边缘。十分明显的是，如果帝国的生存受到威胁，危险应该来自于内部而不是外部。为了挽救二元体制使其霸权永恒不朽，奥地利

① 扬，第 227 页。

② 《泰晤士报》，1913 年 1 月 3 日，第 22 页。

③ 《泰晤士报》，1913 年 2 月 7 日，第 111 页。



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的马扎尔人必须摒除他们之间的分歧。匈牙利迫切希望控制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她通往亚得里亚海的唯一通路，和阜姆，她仅有的港口。匈牙利无论如何都要尽力阻止南部斯拉夫民族妨碍她的海上交通。她没有与他们联合起来去控制帝国内的德意志人，而是粗暴的对待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达尔马提亚。

现在，皇帝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案来满足这样一种植根于种族疑忌的各州政治独立的要求和地方主义。他的态度是消极的，他希望避免战争，拯救王朝。但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并非如此。这位大公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态度而不是代表哈布斯堡家族。与皇帝的观点相比，他的观点是积极的、新的甚至是激进的。他被怀疑有亲斯拉夫情绪；他的妻子、大公夫人霍泰克不是德裔。据说匈牙利政府不喜欢他，因为他与著名的“实验主义”政策有关系。<sup>①</sup> 实验主义者们建议在哈布斯堡帝国境内建立第三个政权，南部斯拉夫国，以征服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爆发的可怕的亲塞尔维亚运动。自然，这样一个第三国，如果建立的话，会把匈牙利与亚得里亚海隔离开来。

斐迪南大公在军队中最受爱戴，众所周知他支持对塞尔维亚的镇压，因为后者可能会发展得过于强大，不能被局限在哈布斯堡帝国之内。塞尔维亚人正确地把他视为他们的头号敌人。与其他任何一种原因相比，二元王朝的战争鼓动更可能是由于大公。这位奥匈帝国的首相于11月12日向尼古拉国王提交了外交抗议，并宣称要把卡瓦尼和阿莱西奥保留给一个自治的阿尔巴尼亚。门的内哥罗国王对此给予了明确的否定回答。4天以后，门的内哥罗人占领了卡瓦尼。又过了两天，他们与一些塞尔维亚军

<sup>①</sup> 拉芬，第169页。



队一起，占领了阿莱西奥。<sup>①</sup> 那前后正在贝尔格莱德的奥匈帝国首相访问了布达佩斯，在回程时，他要求会见了塞尔维亚总理。在维也纳，大公主持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然后斐迪南去了柏林，显然是为了与德国皇帝磋商。<sup>②</sup> 有奇怪的消息说，奥匈帝国驻普里兹伦领事普罗哈茨先生受到了该市塞尔维亚占领区的塞尔维亚人的严重侮辱，后来，普罗哈茨先生本人承认，那纯粹是官方指示下伪造的消息。<sup>③</sup> 但这一传奇激起了公众舆论，据说动员起了 7 个武装军团。<sup>④</sup> 有谣言流传说，“持过激政策的奥地利支持者正在得到柏林的赞助”。<sup>⑤</sup>

如果当时要避免欧洲的全面冲突，列强就必须锻炼他们的敏锐和精明。而最重要的是，结局无疑要受到德国的影响。无论德国支持奥匈帝国的入侵与否，都能够很容易的从德—奥—匈的一般关系和皇帝与大公的特殊关系中看出来。一旦我们理解了德国当时为什么不像后来她在 1914 年那样强有力的支持二元王朝，我们也就会明白，为什么普里兹伦领事普罗哈茨在 1912 年 11 月底被发现平安无事；为什么奥匈帝国和德国不再坚持在解决由战争引起的其他巴尔干争端之前，先解决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分歧。<sup>⑥</sup>

塞尔伯恩伯爵直到 1904 年一直是英国海军大臣，他说过奥匈帝国正在发展成一个真正重要的海上强国。<sup>⑦</sup> 然而，二元王朝没能在对外政策方面独立行动。大公对此确实作了努力。在

① 《泰晤士报》，1912 年 11 月 15 日，第 907、923 页。

② 《泰晤士报》，1912 年 11 月 15 日，第 906 页。

③ 西顿—沃森，第 25 页。

④ 达科，第 107 页。

⑤ 《泰晤士报》，1912 年 11 月 29 日，第 942 页。

⑥ 《泰晤士报》，1912 年 11 月 29 日，第 943 页。

⑦ 上议院辩论，第 12 册，第 303 页。





1911年摩洛哥危机的几个阶段，他坦率的把他本人的立场与德国的立场分别开来，因为，如同人们所相信的，他一直希望能够自由进入法国货币市场。尽管如此，法国政府没有批准奥匈帝国在巴黎市场上的信贷。众所周知，二元王朝在政治上是从属于德国的。<sup>①</sup> 尽管根据二元同盟的条款，德国不会帮助奥匈帝国公开地攻击第三者，二元同盟还是达成了一个中欧体系的政治基础，经济上对东部的渴望和极为感情用事的泛德意志主义。此外，二元王朝在外交界所相信的范围内从属于德国。国际关系通常都是我们想要相信的样子。

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巴尔干的政策，长期以来从属于德国的外交政策。在1914年，“仅仅是来自柏林的一个暗示，就会使贝希托尔德伯爵决定满足于一次外交上的成功，并接受塞尔维亚的答复。这一暗示没有发出，相反，他们（德国的军国主义者们）有强烈的战争倾向”，<sup>②</sup> 战争也确实爆发了。1912年，在科诺皮什杰，斐迪南大公与威廉二世举行了一次会谈；没有制定积极反对塞尔维亚的政策计划，也没有针对塞尔维亚的实际的战争。<sup>③</sup> 很难说清为什么大公死后立刻发生了这样一种政策上的变化，除非由于大公不仅仅受匈牙利人仇恨，也令德国人畏惧。他在情绪上亲斯拉夫，或许在政策上也如此。就像斯拉夫人不喜欢德国人那样，他们也不希望回到德国人的统治下，即使是由一位哈布斯堡—洛林皇帝作其元首。南部斯拉夫人一直在争取以国家的形式成为奥匈帝国的一个联邦。这明显是一种挑衅，但亲斯拉夫的弗朗西斯·斐迪南没有满足德国人的愿望。利希诺斯

① 斯蒂德，第66页。

② 利希诺斯基，第35页。

③ 亚戈，第139页。



基说，他是在流星号上知道他的死讯的，他评论说，“陛下（威廉二世）感到遗憾的是他为了战胜他的思想方法所作的努力由此而变得徒劳无功”。<sup>①</sup>

奥匈帝国必须在 11 个小时内放弃它的入侵计划。没有得到德国支持的这样一种方针的明显危险，巴尔干的胜利在南部斯拉夫激起的反匈牙利人的狂热，伴随奥芬贝格退出战时内阁而来的流言蜚语，这一切都起了阻止与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发生公开冲突的作用。但是，开战还是不开战，一个目的是要制止塞尔维亚的扩张。一条塞尔维亚通往亚得里亚海的通路被认为对奥匈帝国十分危险。现在，波斯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由斯拉夫居住的长长的海岸线，已经在奥匈帝国掌握中。留给塞尔维亚的到亚得里亚海的惟一出口要穿过阿尔巴尼亚北部。这就是让阿尔巴尼亚自治的陷阱政策的原因。在 1912 年 10 月 24 日的库巴诺沃战役以前，塞尔维亚可能会被认为无足轻重，那以后马其顿的土耳其人被消灭，解决亚得里亚海问题不是依靠塞尔维亚就是反对塞尔维亚。奥匈帝国可能了解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原则，但她坚持对阿尔巴尼亚自治却是受到了她对意大利和俄国的“外交”疑忌的强烈唆使。<sup>②</sup> 奥匈帝国的阿尔巴尼亚政策从她的立场看实际上是非常成功的。伊斯梅尔·凯末尔·贝在他回发罗那主持国民议会之前 10 天，在布达佩斯与贝希托尔德伯爵进行了会谈，他回阿尔巴尼亚时经过了的里雅斯特。<sup>③</sup>

当奥匈帝国使阿尔巴尼亚成为一个缓冲国时，她当时满足了意大利的政策。她也不得不给俄国沙皇一个有礼貌的答复。就在

① 利希诺斯基，第 31 页。

② 扬，第 228 页。

③ 《泰晤士报》，1912 年 11 月 22 日，第 923 页。



阿尔巴尼亚宣布独立和中立的前一天，沙皇用了整整一个小时时间召见奥匈帝国大使。据报道，双方对这次召见都感到满意。<sup>①</sup>后来，在下一年的2月，霍恩洛厄亲王的使命在圣彼得堡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部分解释了加利西亚前线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军队复员，以及3月份从波兰召回奥匈帝国的舰队。<sup>②</sup>

塞尔维亚自身在二元王朝与阿尔巴尼亚人的谈判中也无法被忽视。1912年11月中旬，奥匈帝国的部长们已经分别在里耶卡与尼古拉国王，在贝尔格莱德与尼古拉·帕希奇首相举行了会谈。1912年11月12日，奥地利首相提出“塞尔维亚应该给予奥匈帝国的商品和工业以特惠权，放弃她对一个亚得里亚海港口的要求，承认阿尔巴尼亚的独立。作为回报，奥匈帝国将乐于承认塞尔维亚扩张领土的权力，并运用她的影响保证塞尔维亚在爱琴海的一个港口的安全。”<sup>③</sup>但是，塞尔维亚加入对土耳其人的共同作战只有两个目的：解放她在“旧塞尔维亚”的斯拉夫兄弟和获得一条到亚得里亚海的通路。看来，亚得里亚海的一个港口是塞尔维亚国家发展和经济独立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奥匈帝国的提议对塞尔维亚来说是太难答应了。10天以后，帕希奇首相宣布：“塞尔维亚拥有从阿莱西奥到都拉斯约50公里的海岸线是必须的，这段海岸线将与以前的旧塞尔维亚连接起来，旧塞尔维亚的版图大致位于从都拉斯到南部的奥赫里德湖的一条线和从阿莱西奥到北方的贾科瓦的一条线之间……实际上，阿尔巴尼亚在被土耳其征服之前是属于塞尔维亚的。”<sup>④</sup>

塞尔维亚这一毫不妥协的绝对性的态度使奥匈帝国处于一种

① 《泰晤士报》，1912年11月29日，第924页。

② 《泰晤士报》，1913年3月7、21日，第192和230页。

③ 《泰晤士报》，1912年11月15日，第901、906页。

④ 《泰晤士报》，1912年11月29日，第943页。



困难局面，后者希望克制目中无人的塞尔维亚人，却受到了多种同样难以对付的因素的阻止。奥匈帝国骑虎难下。伦敦大使会议及时拯救了她，不仅使她避开了与塞尔维亚的战争，而且还在阿尔巴尼亚自治问题上避免了一次外交失败。当时德国的外交政策肯定要比奥匈帝国的更高明。二元王朝偏好军事征服，而德国的政策却是经济渗透。即使在必须进行战争时，对德国人来说，首要的目标也是经济扩张。既然和平对于经济繁荣是必须的，战争就只能是第二位的考虑，或许是最后的手段。德国皇帝自己所说的话极好地表明了 1898 年以来德国外交政策的这一基本特征。对于 1898 年 3 月 6 日的《胶澳条约》，他说，德国一直致力于“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从经济观点看，这种关系将一年比一年重要，德国也一直致力于保证德国的臣民们在导致远东对欧洲开放的活动中享有充分的份额”。<sup>①</sup> 关于远东所说的话用在德国的近东和中东政策上更为真实。20 世纪德国外交政策连贯和永久的目标，是在经济上支配奥斯曼帝国和德国与奥匈帝国边界之间的地区。

向东方挺进是理解德国外交政策的关键。在这个大目标前面，所有其他目标或多或少都成为次要的。这一关键可以解释很多在其他情况下很难识破的东西，特别是德国在支持二元王朝方面表现出的强烈兴趣。对于浪漫主义的威廉来说，东方有一种巨大的不断增长的魅力。像弗里德里希·豪曼那样的热衷者把近东指为德国希望的终点，德国最有前途的努力对象。当然，由于德国人的自大狂，把哈布斯堡与奥斯曼帝国分离开来是不能容许的。他们必须在德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保持完整。海洋殖民化已经不再存在，至少没有严重的战斗。这使陆地殖民得到了良机。在

<sup>①</sup> 亚当，第 191 页。



腐朽的奥斯曼政权徒有虚名的统治之下的陆地人口稀疏。德国的过剩人口可以移民到这里来；德国资本可以在这里的铁路和灌溉工程中获利，在采矿和农业中获利。棉花、牲畜、矿产品能够大量的供应国内制造业；日益繁荣的美索不达米亚会为德国工业提供不断发展的市场。

确实，在德国企业支配下的土耳其帝国中的可能性事实上是无限的。但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仙境，必要的条件是，二元王朝不仅要生存下来，而且要支配巴尔干半岛——通往近东的踏脚石。二元王朝政治局势如此之不稳定是由于众多民族之间总是争执不休，与这样一个王朝紧密结盟，对德国是相当不利的。有些政治家包括利希诺斯基认为，和平扩张政策应该在得到英国和法国的充分理解下实行；“三国同盟政策”支持奥匈帝国可能会挑起争端，坚持这样一种政策是令人讨厌的<sup>①</sup>。但是，大部分德国作家似乎认为与奥匈帝国结盟是必要的。他们把维也纳看作德国的巴格达铁路上必须的一站。

在利希诺斯基看来，由于土耳其的欧洲领土在巴尔干同盟成功的运转之后已无可挽救，德国应该停止把她的对外政策与奥斯曼帝国纠缠在一起。他支持这样一种理论，即，德国应该宣布她对于划定边界完全不感兴趣，所以这一问题应留待巴尔干同盟自己解决。<sup>②</sup>但德国外交部看来对此不同意。亚戈精确地从逻辑和心理两方面解释了德国为奥匈帝国作调解人的必要性。“我想要说的是”，亚戈说，“如利希诺斯基亲王所鼓吹的这样一种对巴尔干问题的广泛的不感兴趣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完全忽视了我们的盟友的真正生死攸关的利益，那是与结盟的根本原则

① 利希诺斯基，第12、6页。

② 利希诺斯基，第5页。



相冲突的……对我来说更加不可能的是，在同盟国的利益彼此影响的事务中不实行‘三国同盟’。如果不实行这种政策，意大利就会被迫在东方问题上完全站到协约国一边去，奥地利就会任凭俄国人摆布，三国同盟因而就会真正分裂，我们由于缺乏任何支持，也就会无法保卫我们在东方的利益。甚至利希诺斯基亲王也并没有否定我们在那里曾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在今天，经济利益已不再能与政治利益分割开了。”<sup>①</sup>

正是亚戈的这种态度使得有权势的海尔·冯·荷尔斯泰因在冯·比洛总理之前申辩说，不应在1908年的吞并运动中把奥匈帝国丢弃不顾。<sup>②</sup> 还是根据这同一种态度，1912年12月2日贝特曼—霍尔韦在国民议会作了发言。<sup>③</sup> 那一发言中提出了三个要点：（1）德国不受巴尔干事件的直接影响，在很多方面她的兴趣远不如其他国家大；（2）但是她的一个盟国受到了攻击，德国受条约义务的约束要支持她；（3）此外，为了土耳其债务的安全，德国参加重新安排和平是正当的。

与任何其他单独的现象相比，正是德国对三国协约的怀疑帮助巩固了德国和二元王朝之间的友谊。在南非战争之后，英国放弃了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光荣的孤立”政策。1904年4月8日英法关于埃及和摩洛哥的协议令德国人大吃一惊。日俄战争后的英俄关系得到了极大改善；德国人怀疑正在尽力与其在大陆上的对手加强理解的英国人很快就会使德国遭包围并受到孤立，1907年8月31日发表的英俄协定证明了德国人的这一怀疑。三国协约与其说是削弱不如说是加强了三国同盟。一般说来，施加于同

① 亚戈，第131页。

② 斯蒂德，第261页。

③ 《泰晤士报》，1912年11月6日，第962页。



盟者的外力压迫会比任何内部的凝聚力更能使他们牢固地团结在一起。这种怀疑的力量极为深远，它肯定不利于英德之间达成真正的理解。对协约国的这种怀疑情绪有助于雷文特洛形成这样一种态度：德国应该把英国的友谊看作一个陷阱；裁军和仲裁条约是肥皂泡；因而德国应该既有海军又有陆军。<sup>①</sup>

不幸的是，雷文特洛公爵的理论在德国逐渐获得了说服力。在1911年摩洛哥危机激起的狂热情绪的压力下，下一年5月通过了新的《陆海军法案》。为了对应法国的3年兵役制，德国把她和平时期的兵员增加了两个新的军，共29000人。海军中成立了一个第三分遣舰队；建造了军舰、巡洋舰和很多潜水艇。<sup>②</sup>只要德国看不到英国的信任，德国就会认为培养与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友谊是必要的。“一个不再适应所有条件的正在松散瓦解的旧同盟只有在新的星座能够形成时才会维持良好状态……只要这种政策（与英国恢复友好关系的政策）没有可靠的保证，我们就不能牺牲原有的保证——甚至包括对他们的义务。”<sup>③</sup>

然而，德国仍然希望与英国达成充分的理解。因为除了德国不愿意讨论的军队问题外，英国人的友谊，即使只是口头上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伤害德国及其盟友。甚至早在德意志帝国刚建立时，就在寻求英国的友谊。俾斯麦曾几次直接主动向英国提出结盟的建议，较明显的是在1878和1887年。如果这些建议中有一次被接受，就有可能改变欧洲和世界的命运，在20世纪，使这两个国家能够更好的理解的努力还在继续，至少消除了某些小的误解。1906和1908年，爱德华国王和哈丁勋爵访问了德

① 雷文特洛，第78、219、280—285、296页。

② 《泰晤士报》，1913年1月3日，第22页。

③ 亚戈，第144页。



皇。作为霍尔丹勋爵访问柏林的特殊使命的一个成果，也作为地方性团体，如工人协会之类，有组织的互访的一个成果，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在 1912 年有了稳定的改善。甚至德国国务大臣亚戈，后来自己承认，他也执行过旨在与英国互相理解的政策。他的敏锐足以使他看清巴尔干的胜利和由此引起的土耳其的失败在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造成了失衡。他认为与英国互相理解是使德国避免第一次巴尔干战争造成的不利地位的惟一方法。<sup>①</sup> 因而，当大使会议在伦敦外交部召开时，如果柏林的皇宫中举行皇家盛宴也是毫不奇怪的。1913 年 5 月，维多利亚·露易丝公主和坎伯兰的欧内斯特·奥古斯塔斯亲王结婚，乔治国王和玛丽王后十分喜悦的出席了这一俄国皇室婚礼。<sup>②</sup>

确实，自从 1906 年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和法国向俄国贷款以来，德国比以前越来越怀疑协约国的行动。到那时为止，历史上还没有订立过数量更大的贷款合同。最重要的是，那笔贷款使俄国避免了在革命期间和战后行政管理的厄运。<sup>③</sup> 法国在俄国的军事和金融利益对亚戈“法国和俄国推动了战争”的观点来说本应该是合情合理的。<sup>④</sup> 尽管如此，威廉二世仍然是一位反对德国某些党派的好战趋向的和平斗士。至少我们从 M. 朱尔斯·康邦给他本国政府的信中知道，德皇在 1913 年 11 月不再是和平之友，<sup>⑤</sup>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年以前他是赞成和平的，并因此一直对俄国友好。1912 年的情况似乎证明了这一点。这次没有重复 1908 年送往圣彼得堡的最后通牒。在下一年的春天，尼基政

① 亚戈，第 143 页。

② 《泰晤士报》，1913 年 5 月 23 日，第 409 页。

③ 《维特公爵回忆录》，第 304—305、307—308 页。

④ 亚戈，第 143 页。

⑤ 《法国黄皮书》，第 6 册。





府在伦敦大使会议中表现出了和解和友好的精神。威利描写并赞扬了这一出色的外交政策。<sup>①</sup> 1913年5月22日早晨，沙皇到达柏林参加皇室婚礼，据报道威利—尼基的会见是异乎寻常的兴奋和热诚。<sup>②</sup>

1912年，德国并不希望与俄国开战，尽管她对协约国有怀疑，为了保护她在奥斯曼帝国的经济特许权，她一直在寻求与英国的理解。她与奥匈帝国的关系十分棘手，因为帝国正处于局部的或种族的内战边缘。三天以前阿尔巴尼亚宣布了独立和中立，因而，海尔·冯·基德伦-韦希特尔公报非常严厉的宣布，列强不同意他们自己对任何一个巴尔干问题作出事先的承诺；认为阿尔巴尼亚和亚得里亚海问题只应该与其他问题合并讨论与解决。<sup>③</sup> 确实，德国宁愿看到一个自治的阿尔巴尼亚，而不愿阿尔巴尼亚被希腊和塞尔维亚或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瓜分。阿尔巴尼亚自治在奥斯曼政治家的眼睛里可能只意味着德国对土耳其的外交胜利。此外，即使像亚戈这样的人也还对大使会议的发起人爱德华·格雷爵士保持着信任。“我相信，”亚戈说，“爱德华·格雷爵士对和平的热爱和他想要理解我们的真挚的希望。”<sup>④</sup> “我们像爱德华·格雷爵士一样不希望用战争来改变阿尔巴尼亚，因而，尽管我们不喜欢在阿尔赫西拉斯的经历，我们同意举行一次会议。”<sup>⑤</sup>

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和平愿望确实是真诚的，但真诚仅仅是为了英国，尽管英国的帝国主义者可能会争辩说，英国和平就是世界和平。或许胜利者的心理与失败者的不同只不过是极为自

① 莱文，第255页。

② 《泰晤士报》，1913年5月23日，第413页。

③ 《泰晤士报》，1913年2月7日，第111页。

④ 亚戈，第144页。

⑤ 亚戈，第133页。



然的事。在任何竞争中，胜利者总是害怕自己会失败，而失败者则是嫉恨并继续斗争争取再胜利。英国是 1912 年的胜利者，德国则是殖民扩张和海上防卫竞赛的失败者。如果说德国想要和平，英国就越发如此。但在友谊的外衣下面，英国必须促使德国缩减军队。因为对世界和平造成威胁的不是英国的海上霸权而是德国的海上霸权。摩洛哥危机之后德国通过了海军法案，法国则实行了 3 年兵役制。几乎同时克鲁侯爵建议霍尔丹勋爵访问德国并“驱散任何有可能存在的国内的误解”。<sup>①</sup>

按照这一建议，霍尔丹勋爵 1912 年初被派往柏林，以弄清德国建立第三分遣舰队的计划是否不能更改。当他对此失望时，他提出了一个“海上休战”的建议。德国用一个反要求来回答，要求与英国订立一个正式条约，万一发生战争时英国要绝对中立。当然，绝对中立可能使英国海军多少变为一种摆设。英国永远不会停止坚持她的海上霸权。同年 7 月，爱德华·格雷爵士本人说，如果没有一支海军，即使是巧妙的外交和对外政策也不可能保证英国在地中海的地位安全。<sup>②</sup> 吉尔伯特·默里争辩说，由于缺乏一支强大的陆军，英国海军不可能成为一种威胁。<sup>③</sup> 但是，就在英德两国名流显贵在伦敦举行会议以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之前，罗伯特伯爵在民族同盟会议上关于义务兵役制的演说引起了德国的巨大怀疑。<sup>④</sup>

对于这一阶段的英德关系极为幸运的是，德国驻伦敦大使是一位亲英的外交官。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相信，尽管存在“所有问题中最棘手的”海军问题，还是有可能达成一种友好的和睦关

① 上议院辩论，第 11 册，第 39 页。

② 下议院辩论，第 40 册，第 1993 页。

③ 默里，第 109 页。

④ 《年鉴》，1912 年，第 225 页。



系。“海军”这个词汇永远不会在爱德华·格雷爵士和利希诺斯基之间消失。<sup>①</sup> 在大使会议之前 4 个月，阿斯奎思先生断定英德之间的和睦友好关系可能会持续下去。<sup>②</sup> 但是当然，德国人民还没有忘记南非战争期间英国海军对“联邦议院”的占领。从那时起国民议会就时刻准备着对建立强大的海军，并定期使之扩大的计划投赞成票。<sup>③</sup>

英国有理由担忧德国的海军优势，但不仅如此，她对德俄结盟也怀着纯粹的恐惧。全世界都相当清楚，如果这样一种结盟牢固地建立，英国尽管有海上霸权，也几乎无法击败德国向东方挺进的计划。英国声称“权力平衡”——英国狡猾的外交口号——是世界和平的基础；而对英国来说世界和平只不过是保持英国的霸权和英国的商业繁荣。英国首先害怕的是俄国的扩张，因而 1895、1898、1899 年与德国结成某种同盟的建议又在 1901 年重复提起。迟至 1901 年秋天，英国还迫切的想要制止法国对摩洛哥的企图。按照德国政治家们——荷尔斯泰因是其中著名的一个——的看法，英国想要德国人为他们火中取栗。那不只是单纯的怀疑，因为英国几乎不可能同时既在非洲打败法国，又在亚洲打败俄国。由于没能保证德国人的帮助，英国越发渴望制止中欧的强国。所以她开始着手与法国缔结一项海军协定，以便建立一个针对德国势力的联合阵线。利用了俄国 1905 年在亚洲失败的机会，英国有礼貌地试探了俄国人的友情。1912 年初，韦尔代尔勋爵访问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几个月以后，M. 萨格诺夫访问了伦敦并与爱德华·格雷爵士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就在巴

① 利希诺斯基，第 21 页。

② 下议院辩论，第 41 册，第 1393 页。

③ 布雷斯福德，第 256 页。



尔干战争爆发之前。波斯和近东面临的困难因而得到了消除。在回俄国的途中，萨格诺夫与普安卡雷，当时的外交部长，举行了会谈。1912年这一巴黎—伦敦—圣彼得堡会谈无疑极大地加强了三国协约的力量。<sup>①</sup>

正如罗纳德谢伯爵即爱德华·格雷爵士所宣称，三国协约是当时英国外交政策的拱石。<sup>②</sup> 这位英国外交大臣值得赞扬的是，他把协约仅仅看作他的外交政策的起点。他要通过与协约国之外的其他强国建立最可能的良好关系来维护世界和平，因为和平对英国来说是最合乎需要的。所以他说，“我一直认为，尽管可能有一些单独的团体，他们不一定就必然属于敌对的外交阵营”。“权力的平衡”肯定是英国召集大使会议的主要动机之一。除了阿尔巴尼亚自治问题外，爱琴海岛屿问题也有待解决。当会议即将结束时，爱德华·格雷爵士对下议院讲了如下的话：“由于我们在地中海的位置和海军的重要性，我们有一种特别的利益，这就是：没有一个强国应该对这些（爱琴海中的）岛屿中的任何一个提出要求或占有它。如果这些岛屿之一成为一个强国的长期财产，它一定会引起严重的问题和巨大的困难。”<sup>③</sup>

在其《对生命的回忆与政治思考》中，埃卡德斯坦讲述了关于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建设的令人惊奇的故事，勋爵在1895年建议奥斯曼帝国应该由英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瓜分。如果这一建议实现，17年后就不会有这样一个伦敦大使会议了。自从格拉德斯通的时代以来，英国的近东政策逐渐用“巴尔干人的巴尔干”代替了“土耳其人的土耳其”。1912年以前很久就开始放弃在 34

① 《泰晤士报》，1913年1月3日，第22页。

② 下议院辩论，第40册，第1934、1994、1995页。

③ 下议院辩论，第56册，第285—286页。



年以前的柏林会议上表达的理论。用阿斯奎思的话说，“事情可能永远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承认和接受既成事实是所有地方的政治家应该干的事……即使是奥斯特利茨战役也没有发生像上个月（1912年10月）巴尔干同盟所作的事情一样如此突然的变化，如此令人吃惊和势不可挡的结束。”<sup>①</sup> 鉴于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结果，当时没有人打算反对巴尔干国家有权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间提出结束战争的条件。列强没有放慢调整他们自己对事件进程的看法。充分认识到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的潜在的冲突，爱德华·格雷爵士不准备采取海军大臣的意见。他宣称英国的政策是“促进所有有关的人民的幸福”。<sup>②</sup> 在大使会议以前约一个月左右，他要求下议院不要宣布英国对巴尔干问题有单独的政策，而应把与其他列强保持接触以促成所有强国之间的一致当做主要宗旨。<sup>③</sup>

除了爱琴海问题外，会议还必须处理自治问题。但是，甚至阿尔巴尼亚的独立也丝毫不能伤害英国在近东的政策。它只意味着对斯拉夫人或日尔曼人在亚得里亚海的统治的一种有效的阻止。到1912年为止，奥匈帝国和意大利都成为地中海上强大的海军力量。如果不让任何爱琴海岛屿变成这两者之一的永久性财产正是大不列颠的利益，那么看到阿尔巴尼亚海岸在三国同盟之间分割肯定也是不可容忍的。

意大利也充分意识到了阿尔巴尼亚港口和海岸的价值。如同蒂托尼伯爵所看到的，对于意大利或奥匈帝国来说，占有它们就意味着在亚得里亚海上无可争议的优势。“这就是意大利永远不

① 《泰晤士报》，1912年11月15日，第903页。

② 下议院辩论，第45册，第449页。

③ 下议院辩论，第43册，第528—529页。



会允许奥地利，奥地利也永远不会允许意大利获得的东西；结果是这两个国家中无论哪一个企图为自己占据这一地区，另一个都应该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去反对。”<sup>①</sup> 早在 1897 年，戈卢霍夫斯基和维斯孔蒂·韦诺斯塔之间就已缔结了禁止接触条约；两国政府决定通过一个自我克制法令约束他们自己远离阿尔巴尼亚，只要奥斯曼帝国能保持对那里的支配就维持现状。1900 和 1905 年这两个大国两次保证在土耳其欧洲领土上的阿尔巴尼亚自治。不知道伊斯梅尔·凯末尔·贝是否对这一协议有所了解，但全世界都清楚，在三国同盟的这两个成员之间关于阿尔巴尼亚港口问题存在着猜疑。1911 年埃伦塔尔对意大利的的黎波里政策表示了极为友好的态度。但在秋天，当意大利开始在阿尔巴尼亚海岸附近进行一次海上演习时，奥匈帝国毫不犹豫地提出了抗议。<sup>②</sup>

第二年，前首相巴龙·悉尼·索尼诺在意大利议会发表的演说和消息灵通的议员托里教授的电讯，揭示了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在亚得里亚海上塞尔维亚的一个港口问题上潜在的对抗。<sup>③</sup> 这两个强国间的和平缔造者主要并不是伦敦大使会议，而是 1912 年 12 月 7 日三国同盟的续延。根据 1902 年的条款，同盟各国有权在 5 年过去后废除同盟；1912 年的续延将使这些同盟国成员消除疑虑，并唤起他们的责任感。贝希托尔德伯爵对意大利的访问和圣朱利亚诺侯爵对柏林的访问，还有赠给意大利外交部长的圣斯蒂芬大十字架勋章和黑鹰勋章，是同盟续延的前导。这无疑十分有助于消除这两强之间苦涩的感情；因而有助于两国对伦敦会议的支持。

① 切克雷兹，第 81—82 页。

② 斯蒂德，第 277 页。

③ 《泰晤士报》，1912 年 12 月 13 日，第 982 页。



意大利王国和奥匈帝国王室在南部斯拉夫问题上的确有共同的兴趣。除了在阿尔巴尼亚沿海的海上势力外，对达尔巴提亚和伊斯特里亚的可贵的意大利人的同情，极大地影响了意大利对于亚得里亚海问题的看法。在那些地方南部斯拉夫民族在数量上占了压倒优势，意大利人是站在他们自己与南部斯拉夫民族的斗争立场上判断所有问题的。此外，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的政策看来是一种经济渗透。《洛桑条约》刚刚缔结，意大利无论如何不愿与一个强国公开冲突。自加富尔以来的意大利外交一直是谨慎狡猾的，与法国、俄国和奥匈帝国较为愚蠢的骑士气概完全相反。目前，意大利仅仅要求在她自己和二元王朝之间有一个缓冲国。正是一个自治的阿尔巴尼亚会默认意大利的扩张；正是通过这种自治，不只是塞尔维亚和希腊，还有奥匈帝国对亚得里亚海的威胁有可能受到制止。这就是为什么伦敦会议开幕的第二天，意大利外交部长发言称赞三国同盟是对欧洲和平和同盟三国安全的一个保证。“意大利和奥地利都同意阿尔巴尼亚问题可以按照一贯奉行的民族独立原则解决，使该国在列强的保护下中立。”<sup>①</sup>

阿尔巴尼亚民族党的主席和议员达科先生在解释法国和俄国的和解态度时说，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合法的权力要求得到英国无条件的支持。<sup>②</sup> 确实，就像三国同盟最初只是与德国的利益相关一样，三国协约一直是对英国的目标有利。在皮特使权力平衡学说重新复活以前，米拉博和整整一代革命家梦想着法国、英国和德国人为了欧洲和世界的和平而在道德上联合起来。甚至迟至1914年，在阿纳托尔·法朗士和让·饶勒斯访问伦敦时，他们两

① 《泰晤士报》，1912年12月20日，第1001页。

② 达科，第130页。



人还极力呼吁英国作这两个大陆国家之间的调解国和共同朋友。<sup>①</sup>现在，既然英国在 1912 和 1913 年希望和平，她的盟友们就更有理由要求阻止战争了。

法国和俄国为和平担忧的另一个更明显的理由是他们事实上毫无准备。1910 年时大部分法国作者都是平庸的，没有人像社会党领袖饶勒斯那样，把法国军队的虚弱及其迫在眉睫的危险看作透彻而痛苦的警告。<sup>②</sup>就在伦敦大使会议开幕前一天，法国试图举行一次 24 小时的总罢工，以抗议一次欧洲战争。<sup>③</sup>1913 年 5 月 5 日，当《人类自由》的第一期出版时，M. 克列孟梭在他的社论中提出，必须作好准备维护“武装的和平”。<sup>④</sup>法国自己知道她完全没有应付德国进攻的准备。她一直希望由俄国军队来阻止德国人；因而她与沙皇保持着良好的友谊。自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的危險之后，法国全神贯注于俄国 1906 年的贷款。然而，这笔 22.5 亿法郎的巨额资金直到 1912 年还没有产生其最大的效果。无知的官僚们使利益被贬低了，他们没有受到启发，并且慷慨到诚实地坚持 1905 年十月宣言的原则。<sup>⑤</sup>

1906 年，威特伯爵告诉沙皇说，万一发生全面的欧洲战争，英国不能在陆地上帮助法国；俄国也没有能力给法国任何重大的军事支持。<sup>⑥</sup>在斯库台落入尼古拉国王的军队手中之后，一位俄国武官对著名的写阿尔巴尼亚问题的英国作家 M.E. 德拉姆小姐说：“1914 年我们（俄国人）将准备好我们的巴尔干战争；但现

① 布雷克福德，第 295 页。

② 饶勒斯，第 135 页。

③ 《年鉴》，1912 年，第 41 页。

④ 《泰晤士报》，1913 年 5 月 9 日，第 372 页。

⑤ 《维特公爵回忆录》，第 310 页。

⑥ 同上书，第 298 页。





在是不可能的。”<sup>①</sup>

俄国的无准备状态应该是她与法国、奥匈帝国、塞尔维亚和德国关系的最后解释。她的和解态度使她欢迎大使会议。在派恩塞雷总统就职典礼之后不久，沙皇就把俄国最高级的勋章圣安德列勋章颁发给了这位法国元首。即使与法国有这样亲密的友好关系，俄国还是不得不警告塞尔维亚不要惹麻烦。M. 萨左诺夫早在1912年11月就通知塞尔维亚驻贝尔格莱德的公使，俄国不会为了塞尔维亚在亚得里亚海上的一个港口作战。当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布塔勒斯公爵就俄国对塞尔维亚的支持向M. 萨左诺夫提出质问时，后者再度坚持了这一说法。这次会谈内容实际上再度通过塞尔维亚驻俄国首都的公使传达给了塞尔维亚政府。<sup>②</sup> 伦敦大使会议开幕的第二天，俄国首相科科夫佐夫在杜马发表了一个标准的热烈讲话，赞扬了爱德华·格雷爵士建议召开大使会议的创始精神。“俄国”，他说，“在盟国和朋友们的支持下，将尽最大的努力使会议成功。”<sup>③</sup>

## 会议的进程

尽管欧洲列强中的每一个，如我们所见，出于或多或少的自私动机，都希望和平，还是需要有一个有足够的创造性的政治才能的强国，提出一个至少能够避免战争危险，达到某种令人满意的程度的解决方法。当巴尔干战争爆发时，当德国不能确信土耳其的失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命运发生怀疑时，协约国和

① 《当代》第302卷，第386页。

② 《泰晤士报》，1912年11月15日，第901、906页。

③ 《泰晤士报》，1912年12月20日，第1001页。



同盟国的任何共同行动都不是一个适当的时机。法国关于发表一个无偏无倚的联合宣言的建议自然被拒绝了。<sup>①</sup> 但是，一个月之内，当门的内哥罗人占领了贝拉奈普克，希腊人占领了普雷韦扎；塞尔维亚人占领了新帕扎尔、库马诺沃、于斯屈布和伊斯蒂布、普里兹伦和莫纳斯提尔时，同盟国既愤怒又惊慌。官方统计显示出，11月份，由于战争恐慌造成的德国储蓄银行的提款甚至超过了一年以前摩洛哥危机时发生的情况。<sup>②</sup> 列强在12月初举行一次会议的建议因而正合乎时宜。据说最初提议以巴黎为会址，但是奥匈帝国为了某种不可知的个人理由宁愿在伦敦开会。<sup>③</sup>

爱德华·格雷爵士的想法是让大使们在伦敦举行一次圆桌会议互相讨论问题；以便列强可以更紧密的接触，当发生意料之外的困难时，可能会减少任何一方游离于其他各方之外的危险。无可怀疑，大使会议第一的和主要的目标是使巴尔干战争局部化。为了防止战争扩散，列强之间任何可能破坏他们自己之间的和平的争议必须消除。当然，列强感兴趣的程度是随着他们的传统政策和他们的地理及经济上的联系而变化的。所有强国在一起很难达到高度的一致。但如果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亚洲部分不被列入战争区域，如果这些问题不在战争进程中提出，那么列强以他们在爱琴海岛屿和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互相理解为条件，有可能会找到他们自己的一致之处。会议的目的就在于此。会议没有像马克·赛克斯所担忧的那样打算讨论塞浦路斯的地位。<sup>④</sup> 它要为爱

① 利希诺斯基，第10页。

② 《泰晤士报》，1913年2月7日，第112页。

③ 《泰晤士报》，1912年12月6日，第962页；下议院辩论，第45册，第451页。

④ 下议院辩论，第44册，第2455页。



琴海岛屿的地位和减轻阿尔巴尼亚炎症可怕的外观寻求一个暂时的解决方式。无疑，会议还有一个目的是，帮助缔结巴尔干同盟与土耳其正在伦敦会议上谈判的和约。早在1912年12月9日，伦敦《泰晤士报》驻圣彼得堡通讯员报道说：“保加利亚期待着直接与有关政府打交道；和平谈判的难点或分歧将随着它们提交到大使们面前而得到陈述。”<sup>①</sup>

大使们在伦敦参加了在英国外交部举行，由英国国务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主持的会议，他们是俄国的本肯多夫公爵，法国的M.保尔·康邦，德国的利希诺斯基亲王，意大利的因佩里亚利·迪·弗朗卡维拉侯爵和奥匈帝国的A.门斯多夫-普莱-迪特里斯坦公爵。康邦和弗朗卡维拉从未被认为是反英的，而门斯多夫、本肯多夫和利希诺斯基都因帮助安排一些事务，使会议如爱德华·格雷爵士所希望的那样获得成功而著称。俄国新闻界由于本肯多夫公爵的德国血统和罗马天主教信仰，他与门斯多夫公爵和利希诺斯基双方的关系，而把他作为德国的朋友去攻击他。但本肯多夫从来没有表现出粗暴的态度，他一直同情和支持英国与法国。<sup>②</sup>

门斯多夫肯定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天主教徒，从来没打算成为任何救济金公文的作者。1912年11月27日，《泰晤士报》驻维也纳通讯员写道：“我认为局势的改善和军备步伐的放慢，原则上都可以归因于德国皇帝在他与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于斯普林会谈时提出的忠告，但部分原因也在于从奥匈帝国驻伦敦大使那里收到的一份报告。”<sup>③</sup> 尽管利希诺斯基对门斯多夫在会议上代

<sup>①</sup> 《泰晤士报》，1912年12月13日，第987页；下议院辩论，第46册，第2265页。

<sup>②</sup> 利希诺斯基，第11页。

<sup>③</sup> 《泰晤士报》，1912年11月29日，第942页。



表三国同盟的领导地位不满，他一直以亲英派而著称。当同盟会议于1913年1月26日结束时，大使会议仍在继续它的议程。利希诺斯基赢得了英国的同情；大不列颠和德意志帝国之间关系的明显改善极大地安抚了由同盟磋商失败引起的恐慌。<sup>①</sup>

大使们的商谈是非正式的，不作任何许诺。这肯定是一种暗示，即列强还不能确定眼前已有了解决所有困难的方法。另一方面，列强已经能够同意开始讨论更具体的问题，这一事实可以用来证明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样一种解决是不可能的。六强之间通常的外交联络方式包含了6个外交部长和30名大使——一个令人讨厌的、行动迟缓的36人团——我们现在有了一个伦敦大使会议代替它。伦敦是列强和巴尔干同盟对欧洲危机发表意见和进行讨论的干净场所。与会者并不真的是全权代表。爱德华·格雷爵士在需要时全权代表英国；但其他国家都要把在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和推荐提交给各自的政府去解决。<sup>②</sup>因而会议记录不能具体化为任何正式的文件；大使们的议案只是他们政府所同意的观点的记录。阿尔巴尼亚自治的协议并没有签字，但边界议定协议是一个书面文件。<sup>③</sup>

按照切克雷斯的观点，加上某种理由充分的推测，“这次会议文件留下了连续争吵的痕迹，这些争吵是通过妥协或讨价还价偶然结束的。大使们会坐上几个小时或几天来分析一些日常琐事；俄国或法国的代表会严厉反对给阿尔巴尼亚一英寸的领土，尽管他知道那片土地属于阿尔巴尼亚。在很多情况下会有人故意阻止形成协议”。<sup>④</sup>大使会议的秘密性也使它自身在某种程

① 《年鉴》，1913年，第40页。

② 下议院辩论，第56册，第2284页。

③ 下议院辩论，第65册，第6页。

④ 切克雷兹，第88页。



度上成为1919年巴黎和会的模型。爱德华·格雷爵士无法使公众舆论变成大使们的观点和决定，除非通过共同的默认才有可能这样作。<sup>①</sup>

直到1912年11月21日，应否举行一次会议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列强的明确决定。<sup>②</sup>12月10日，爱德华·格雷爵士告诉下议院，所有列强都诚恳地赞成下面的建议：驻某一个欧洲国家首都的大使们应该进行非正式的、不作承诺的会谈，以使列强之间交换意见更容易。<sup>③</sup>但在第二天他就报告说，伦敦就是大使会谈的地点。

伦敦大使会议于1912年12月17日正式开幕；爱德华·格雷爵士，在这前一天已被选为在圣詹姆斯宫召开的和会的名誉主席，在英国外交部主持了大使会议。会议开始时，列强通过了一个自我克制条例，以便维护他们的内部团结，他们中谁都不能利用巴尔干战争为自己提出新的领土要求。<sup>④</sup>12月20日是他们为圣诞节而休会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但那时塞尔维亚已撤出了都拉斯，所有列强原则上接受了阿尔巴尼亚自治。

当会议在下一年，1913年复会时，1月3日讨论了同样重要的爱琴海岛屿归属问题。爱德华·格雷爵士一直注意着另一个和会——土耳其和巴尔干和会的议事记录。就在大使1月6日会议前一天的下午，陶菲克·帕夏和M.达内夫两人拜访了外交部。这样就直接了解了交战国的最新观点，第二天，当大使们再度聚会时，对交战国施加压力以保证和平的可能性构成了讨论的主要

① 下议院辩论，第46册，第976页。

② 下议院辩论，第44册，第452页。

③ 下议院辩论，第45册，第224页。

④ 下议院辩论，第55册，第2286页。



内容。<sup>①</sup> 1月15日，列强向土耳其发出他们的共同备忘录的前两天，大使们开始讨论在欧洲保证下的自治的阿尔巴尼亚的边界确定问题。<sup>②</sup>

大使们3月的会议几乎完全致力于解决边界问题。在亚尼纳落入希腊人手中不久，阿尔巴尼亚在伦敦的代表向大使会议递交了一封信，控诉土耳其士兵的欺压、塞尔维亚军队的掠夺和希腊对海岸线的封锁给阿尔巴尼亚人带来的苦难。<sup>③</sup> 到3月10日，解决了亚得里亚海岸线的问题。通过一条国际铁路轻而易举打通了塞尔维亚到亚得里亚海的经济通路。<sup>④</sup> 16天以后，就是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占领阿德里安堡的那一天，阿尔巴尼亚的北部和东北边界确定下来，并由奥匈帝国政府正式承认。斯库台毫无争议的属于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的入海口再度得到保证；普瓦、贾科瓦、普里兹伦和迪布拉割给了塞尔维亚。由于这一边界协议，俄国和奥匈帝国军队撤到了加利西亚边境地区。

在4月，残忍的巴尔干战争继续到16日，那天战争行动在查塔尔加前面停了下来。22日，斯库台向门的内哥罗投降；第二天，在大使会议上，决定向切蒂尼埃发出一个撤退的要求。当时还讨论了同盟国对列强的和平建议的答复；莫列勋爵、亚瑟·尼科尔森爵士和阿斯奎思也出席了这次会议。<sup>⑤</sup>

斯库台是对大使会议力量的一个检验。因为在会议之外，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煽动和奥匈帝国的军备使欧洲外交发生了一个危机。在5月1日星期四的会议上，意大利支持奥匈帝国的要

① 《泰晤士报》，1913年1月10日，第30页。

② 《泰晤士报》，1913年1月24日，第69页。

③ 《泰晤士报》，1913年5月14日，第213页。

④ 下议院辩论，第50册，第33页。

⑤ 《泰晤士报》，1913年4月25日，第329页。



求，即由列强立即采取共同行动迫使尼古拉国王撤出斯库台。英、法和俄国认为，只要有时间和耐心，尼古拉国王可能最终会服从欧洲的意愿，但不能通过武力的强迫。那次会议没有产生明确的结果。<sup>①</sup> 欧洲有幸看到尼古拉国王在 11 时放弃了斯库台。他答复了列强通过英国驻策蒂涅公使迪·札利斯公爵提出的要求。爱德华·格雷爵士在 5 月 5 日的大使会议上宣读了电报。当时的建议是从封锁门的内哥罗港口的军舰上派出一个国际性的分队，占领该市并在阿尔巴尼亚政权建立之前维持治安。大使们还讨论了土耳其和巴尔干同盟之间的和平前景；爱德华·格雷爵士甚至在会议上读了条约的初步草稿。5 月 8 日的会议讨论了阿尔巴尼亚的政体。意大利和奥匈帝国赞成建立一个由一位欧洲亲王治理的公国，当不再需要欧洲的监护时，阿尔巴尼亚就得到完全的独立。俄国更欣赏在土耳其领主权下的自治；她应该在一个规定的年限内，由一位列强任命的“省长”统治。<sup>②</sup> 7 月 28 日到 8 月 1 日连续举行了会议，在那一阶段，大使们同意在 6 个月内推荐一位阿尔巴尼亚亲王；派出一个监督委员会去组建政府。在瑞典人的要求下也创建了一支宪兵队。<sup>③</sup>

显然，结束巴尔干战争的条约初稿在 5 月 5 日宣读时就已经由大使们通过了。由于同盟国一方推迟缔结它，列强必须采取某些说服措施。因而，在 5 月 27 日的大使会议上，明确决定要促进伦敦条约的签字，3 天以后在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劝说下签订了该条约。<sup>④</sup> 在所有列强都认为大使会议获得了成功的情况下，8 月 11 日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上，对阿尔巴尼亚南

① 《泰晤士报》，1913 年 5 月 2 日，第 349—350 页。

② 《泰晤士报》，1913 年 5 月 9 日，第 369 页。

③ 《泰晤士报》，1913 年 8 月 1 日，第 610 页。

④ 《泰晤士报》，1913 年 5 月 30 日，第 429 页。



部边界的确定总的说来取得了一致。会议两天以后，保尔·康邦和利希诺斯基离开伦敦度假，弗朗卡维拉侯爵和爱德华·格雷爵士下一天早上离开。<sup>①</sup>

阿尔巴尼亚自治问题在会议之前的一个月，甚至在1912年11月28日阿尔巴尼亚独立和中立宣言之前，就已经被预料到了。伦敦《泰晤士报》11月15日报道说，列强之间一般来说已同意必须有一个自治的阿尔巴尼亚，总而言之，要包含这个国家中完全由阿尔巴尼亚人居住的大片区域。如我们所知，对阿尔巴尼亚自治的正式承认仅仅是在大使们1912年的最后一次会议之后。在12月20日，那一次会议开了两个小时，还决定了塞尔维亚入海口问题。“阿尔巴尼亚领土上向塞尔维亚开放的港口将是自由和中立的，将有一条同在欧洲监督下的国际铁路为其服务，所有商品过境免税，包括战争用品。此外塞尔维亚还将享受免除海关税的利益。”<sup>②</sup>由于大使们的劝告，列强也接受了阿尔巴尼亚自治的原则。它将受苏丹的领主权支配，但也要受列强的监督。直到下一年4月底斯库台陷落以后，使阿尔巴尼亚从土耳其独立出来的想法才在会议上得到发展。

因此，在土耳其和巴尔干同盟和平谈判期间，巴尔干国家宣称土耳其应该放弃阿尔巴尼亚，但阿尔巴尼亚的未来要按照列强的意愿来决定。<sup>③</sup>土耳其在1912年12月28日提出的反建议是，阿尔巴尼亚将成为一个自治省，有自己的议会，但在5年或更长的期限内应由一位被任命为总督的奥斯曼亲王领导她的政府。<sup>④</sup>1913年5月30日签订的《伦敦条约》没有承认这一建议。而阿

① 《泰晤士报》，1913年8月15日，第649页。

② 《泰晤士报》，1912年12月27日，第1021页。

③ 《泰晤士报》，1913年12月27日，第1021页。

④ 《泰晤士报》，1913年1月3日，第1页。





尔巴尼亚临时政府当时甚至还不知道大使会议上所作的决定。伊斯梅尔·凯末尔·贝说：“希腊舰队切断了电缆，这是我们与外界联系的惟一通道，这使我们完全孤立，而且无法了解我们边界之外发生的所有事情。”<sup>①</sup>

然而，在阿尔巴尼亚之外，欧洲新闻界的评论相当丰富，它们中的一些肯定不代表它们政府的政策。圣彼得堡的《新时代报》提出把阿尔巴尼亚在与俄国友好的同盟国之间进行分割。它夸大了阿尔巴尼亚内部的敌对势力；以便使自治显得更加无法实施。英国的《周六评论》把自治看作愚蠢无聊的事，评论说：“阿尔巴尼亚人可能是很高贵的野蛮人，但本质上他们还是野蛮人，他们实际上在阿卜杜尔·哈米德领导下享有自治，因此这个国家保持了人们预期一个野蛮国应有的样子。一个土著统治者永远不会被所有部族接受；惟一存在的组织是家族组织和部落组织，没有国家或任何近似于它的东西，尽管可能有一种模糊的反对外来者的共同感情。”<sup>②</sup> 这家英国报纸希望由奥匈帝国统治阿尔巴尼亚，把这种作法想象为是最令人满意的最终的解决办法。相反，罗马的一家报纸《现代意大利》认为，阿尔巴尼亚有巨大的一致的民族感情，它完全有能力组成一个严密的强有力的国家。“意大利对于在亚得里亚海、塞尔维亚和马其顿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安全的、实际上的联系肯定有极大兴趣。它的兴趣无疑不小于塞尔维亚对这种联系的兴趣……意大利的公众舆论会谴责阿尔巴尼亚与外国的任何合并，因而支持我们的政府努力避免任何这类偶然性，因为一个自治的阿尔巴尼亚会证明是奥特朗托海峡的一个活警卫，是保护交通的一个可靠的哨兵，为了意大利

① 《评论季刊》第228卷，第148页。

② 《当代》第275卷，第810页。



和巴尔干国家的共同利益，东西方之间的大部分商业将重新经由亚得里亚海。”<sup>①</sup>

阿尔巴尼亚的岛屿领土有着巨大的意义，因为如果阿尔巴尼亚变得太小，它在将来就不可能单独生存。另一方面，如果它大到不正当地蚕食马其顿、塞尔维亚或希腊的合法的期望和目标，一直支持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的列强则无法容忍。伦敦的大使们绝对的明白这点；因而他们全体一致同意阿尔巴尼亚定界是只有列强才有资格处理的一个任务。但毕竟这是一个暂时妥协而不是相互调整的会议，《年鉴》说，正是一次列强的大使会议“负有调和殖民地及其需求的任务”。<sup>②</sup>一个江湖医生主要的工作就是包扎发炎的皮肤而不是尽力彻底地治好它。贴膏药的目的通常是掩盖丑陋的肿块并欺骗病人本人。阿尔巴尼亚定界的目的正是如此。它为了推迟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而准备牺牲真正的相互调整和真正的人间正义。“我完全明白，”爱德华·格雷爵士说，“当所说的这一切来临时，任何一个仅仅是站在地方性的功过立场上，对地方性事务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在很多方面提出严重的批评。应该记住的是，在达成这一协议的过程中，首要的一点是要在列强内部保持一致，如果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能够确保一致，为欧洲和平而作的最根本的努力也就得到了成功”。<sup>③</sup>

不管怎样，在所有列强间即使仅仅要达成一项协议也不容易。奥匈帝国决心要为新的阿尔巴尼亚夺回斯库台，因为这个天主教中心，这个教会学校的大本营所作的事业既对本地的发展有利，又对奥匈帝国的目标有用。在这一问题上，花了两个月时间

① 《文摘》第46卷，第124页。

② 《年鉴》，1912年12月，第274页。

③ 下议院辩论，第56册，第2285页。



才最终取得了俄国人的同意。但俄国人的作为根本不是由于阿尔巴尼亚的缘故；她坚持必须割让足够的领土给两个讲塞尔维亚语的国家：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此外，她要求这些领土中包括普克、普里兹伦、迪布拉和贾科瓦。<sup>①</sup>另一方面，奥匈帝国不打算用达尔马提亚海岸补偿塞尔维亚，意大利也不打算放弃爱琴海的某些岛屿。奥匈帝国欣然同意了普克和普里兹伦；不久以后也同意了迪布拉。

贾科瓦是北部和东北边界线上有待解决的最后一点。自治的塞尔维亚声称此地从14世纪到17世纪末一直有塞尔维亚人居住，对任何这类情况不加考虑的妥协是最不公平的行为。但事实是，到1912年，占压倒多数的常住人口是阿尔巴尼亚人，尽管在这个城市中仍然有一座东正教教堂。迟至1915年，贾科瓦人口的97%以上是阿尔巴尼亚人。<sup>②</sup>这个地理学上的论据理所当然击败了塞尔维亚—俄国人的要求。但奥匈帝国由于在阿尔巴尼亚自治问题上赢得了重大的外交胜利，可能是想到，毕竟巴尔干的政治重建只不过意味着一个过渡政权。她可能认为，多半确实认为，当时战争是不受欢迎的，果若如此，未来的利益对她自己来说就不那么迫切了。因而维也纳受到了德国外交政策的稳健态度的影响。<sup>③</sup>无论如何，对这一阿尔巴尼亚城市意义深远的割让，解决了北部边界漫长的谈判中惟一未解决的问题。

普克、普里兹伦、迪布拉和贾科瓦——都是主要的阿尔巴尼亚镇市；它们现在都归属了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对阿尔巴尼亚土著当然不会有多少容忍和同情。前一年起义反对土耳其的霍蒂和

① 《泰晤士报》，1913年3月28日，第250页。

② 斯坎杜，第9页。

③ 亚戈，第133—134页。



格鲁尼部族及 5 个马利索拉部族，现在被纳入了门的内哥罗境内，这是一种极为违背人道的作法。划定的阿尔巴尼亚的新边界紧靠山脚。阿尔巴尼亚得到的是岩石和峡谷，还有山洪。夏天，丘陵可能会成为很好的牧场；但在冬天，当大地被白雪覆盖时，绵羊肯定会挨饿，无论它们如何耐寒。商业镇市普里兹伦、迪布拉、普克和贾科瓦周围是肥沃的平原，那里岩石被开采变成了房屋和城市，峡谷展宽成为河谷，河谷又成为农田，山洪到那里变成了河流，——阿尔巴尼亚失去了这一切。“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伍兹先生说，“即山区的阿尔巴尼亚人实际上是无法生存的。以前习惯于自由自在地从他们在山区的家出发到邻近的市场上去做买卖的男人和妇女，现在为了到仍然属于阿尔巴尼亚的市场上去要被迫走很远的路，这些路程夏天通常要花四五天时间，冬天则不可能成行；或者要在现在属于塞尔维亚或门的内哥罗的镇市里冒被害或受辱的危险”。<sup>①</sup>除了商业意义和经济意义以外，这些城市还是这个国家重要的文明媒介。当它们按照自然的和人种学的权利都应属于阿尔巴尼亚时，对阿尔巴尼亚人来说，夺走它们是更为不公平的。

在大使会议签订了北部边界的协议之后，阿尔巴尼亚临时政府不再与世隔绝。三四天以后，1913 年 4 月 1 日，伊斯梅尔·凯末尔·贝为了与列强会谈，乘迪尤·德·蒙庞西耶号游艇离开了阿尔巴尼亚。他从布林迪西出发依次到了罗马、维也纳、巴黎和伦敦。直到 6 月他才回到发罗那。<sup>②</sup>在他离开阿尔巴尼亚期间，大使会议和那一年欧洲最大的危机转向了斯库台问题。

斯库台，公元前 10 世纪古伊利里亚王国的首都，只是在克

① 伍兹：《双周评论》第 101 卷，第 462 页。

② 《评论季刊》第 228 卷，第 159—161 页。



里米亚战争之后才受到君士坦丁堡的直接统治；其邻近的山区则一直或多或少是独立的。<sup>①</sup> 斯库台湖附近的肥沃平原是阿尔巴尼亚领土天然的和真正的边界。安南·布赖斯认为，门的内哥罗应该放弃斯库台而从别的什么地方得到补偿，而另一位议员，戴维·梅森，建议门的内哥罗可以仿效奥匈帝国处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的先例；门的内哥罗应该从阿尔巴尼亚手中购买斯库台。<sup>②</sup> 无论如何，斯库台的命运成了列强之间均衡和解与均衡一致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民族自治原则恰巧可以为权力平衡的目的服务时，列强一致宣告斯库台完完全全是一个阿尔巴尼亚市镇。

交战各方心意一致的忽视了1912年12月4日的停战；因而，甚至直到1913年2月初，斯库台的战斗还在继续。与大使会议就阿尔巴尼亚边界问题进行磋商的同时，土耳其在斯库台的指挥官，有部分阿尔巴尼亚血统的侯赛因·勒扎，打算宣布该城属于阿尔巴尼亚。这个计划受到了艾沙特·帕夏·托普塔尼的阻挠；艾沙特并策划了对侯赛因·勒扎的暗杀。<sup>③</sup> 在对阿尔巴尼亚北部边界取得一致意见后，摆在列强前面的任务就是把斯库台从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人手中解救出来。发自策蒂涅的一份官方电报表达了门的内哥罗人对列强的态度：“为了对门的内哥罗公正起见，应该说明，门的内哥罗的指挥官在三个不同的场合给了外国人离开斯库台的机会；但他们宁愿留下来，就像奥匈帝国的领事决定留在他的职位上一样。尽管门的内哥罗现在实现了奥匈帝国关于非交战人员撤出的希望，她还是对列强宣布，她只能把

① 皮科克，第35页。

② 下议院辩论，第52册，第2310、2316、2326页。

③ 《当代》第302卷，第386页。



奥匈帝国的要求看作对中立的破坏。门的内哥罗希望欧洲记住，她一直在与土耳其作战，她不明白列强对阿尔巴尼亚边界的任何决策怎么能改变这一客观事实。”<sup>①</sup> 4月初，当塞尔维亚应列强的要求把她的部队从斯库台城下撤回时，门的内哥罗继续独自包围着斯库台。

俄国也对尼古拉国王发出警告，如果门的内哥罗继续妨碍斯库台问题的解决，他就要承担重大的责任。门的内哥罗人的答复把某些争执归之于“完全忽略了俄国的外交政策”。<sup>②</sup> 门的内哥罗是一个高傲的巴尔干极端民族主义的孩子；它正打算扎扎实实地向列强学习。它必须被迫服从他们；为执行领土问题的决定和使门的内哥罗顺从所采取的措施是一次国际海军的远征。1913年4月2日，阿克兰在下议院宣布英国军舰（战列舰“爱德华国王七世”和巡洋舰“喷射口”）已准备好加入这次海军示威，只要其他强国也作好了准备。<sup>③</sup> 终于，这一计划得到了决断。甚至俄国，既是一个大斯拉夫和东正教强国，又在地中海没有战舰，也在公报中向伦敦解释她的政策说：“考虑到伦敦大使会议宣称在门的内哥罗水域进行一次海军示威是绝对必要的这一事实，俄国——尽管自己不参加……示威——的看法是，这次示威应该是国际性的，法国和英国军舰都应该加入。”<sup>④</sup> 五强国的军舰于4月10日晨8时开始封锁门的内哥罗海岸。两个小时后，9艘军舰向南出发开往杜尔奇尼奥。还有两条留在安蒂瓦里，即“喷射口”和“弗朗茨·斐迪南”号。<sup>⑤</sup>

① 《泰晤士报》，1913年3月28日，第250页。

② 《泰晤士报》，1913年4月18日，第309页。

③ 下议院辩论，第51册，第365页。

④ 下议院辩论，第51册，第817页。

⑤ 《泰晤士报》，1913年4月11日，第293页。



爱德华·格雷爵士声称这一封锁的目的是支持自治的阿尔巴尼亚；制止门的内哥罗的战争征服；解救斯库台的天主教徒和穆斯林。<sup>①</sup>但是，半个月以后，那个阿尔巴尼亚城市落入门的内哥罗人手中，变成了整个会谈的一个笑柄，并成为对于所有参与其事的强国的一种斥责。该市在半夜向门的内哥罗人投降。消息于凌晨两点左右到达策蒂涅，是通过王储发给国王的一封电报传来的。消息立即就被公开了，并受到了枪炮齐鸣和教堂钟声的欢迎。但列强的焦虑加重了。欧洲纠纷的前景曾失去其重要性，现在再度引人注目。在各种舆论动向中，有些人认为局势比以前更坏；因为现在只能通过武力驱逐门的内哥罗人，如果奥匈帝国打算单独这样作的话，就很难指望欧洲和平。另一批人认为，由于这一胜利，门的内哥罗人现在可以比较容易不失面子的达成妥协；因而局势有所改善。然而，最普遍的看法是，这一戏剧性的行动没有改变真实的情势，至少列强仍然坚持斯库台不应该脱离自治的阿尔巴尼亚这一想法。人们期待列强施加足够的压力以实现他们的愿望，而完全不必要借助于武力或鲁莽的行为。<sup>②</sup>

斯库台屈服的原因并不完全为人所知。伦敦《泰晤士报》报道了食品的短缺，特别是面粉。当这个城市被占领时，土耳其人的军火几乎消耗殆尽。<sup>③</sup>后来确定，艾沙特·帕夏是把放弃这个城市作为与尼古拉国王讨价还价的一个条件。根据某种协议，门的内哥罗将得到阿尔巴尼亚德里纳河以北的全部国土，作为回报，尼古拉国王将承认艾沙特为阿尔巴尼亚国家元首。<sup>④</sup>5天以后，艾沙特在阿莱西奥实际上宣布了他自己是阿尔巴尼亚国王。

① 下议院辩论，第51册，第817页。

② 《泰晤士报》，1913年4月25日，第329页。

③ 《泰晤士报》，1913年4月25日，第231页。

④ 达科，第98页。



第二天早上，伊斯梅尔·凯末尔·贝离开巴黎前往伦敦，“为了在大使们面前强烈主张他的观点”。<sup>①</sup>列强现在肯定由于发罗那和阿莱西奥之间存在的不和而为难，并被迫为这一新的情势建立了一个机构。

同时，更为紧迫的事情是把门的内哥罗人赶出斯库台。因为如果要通过战争把这一城市从他们手中解救出来，那肯定是一场欧洲大战，无论列强是团结一致还是互相反对。当然，可能最好的出路是，如果门的内哥罗屈从于列强的共同要求，就不需要战争。为了实现这一最好的调整，不仅必须对这个欧洲的“继父”施加足够的压力，还必须对奥匈帝国施行微妙的外交策略。就在斯库台刚一陷落之后，维也纳所有的报纸都表达了一种观点，即政府应该立即针对尼古拉国王采取积极的步骤，无论有没有其他列强的帮助。<sup>②</sup>4月的最后3天，人们看到“从维也纳（到柏林）关于紧急军事行动的电报如洪水泛滥”。<sup>③</sup>德国要求维也纳不要介入，除非与意大利一起行动。俄国驻奥匈帝国大使“乞求”二元王朝避免战争，同时发誓俄国会为门的内哥罗人的撤退而尽力。<sup>④</sup>

另外，据说意大利政府竭尽全力说服她的盟友采取忍耐政策。但是如果真的发生战争，奥匈帝国不会被允许单独行动。意大利把她的利益视为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同等重要。意大利的公众舆论迅速地转向反对门的内哥罗。艾沙特被描绘为一个“叛国者和普通的罪犯”。当奥匈帝国把她的部队集中到波斯尼亚边境时，意大利向距阿尔巴尼亚最近的意大利港口布林迪西派出了

① 《泰晤士报》，1913年5月2日，第350页。

② 《泰晤士报》，1913年4月25日，第333页。

③ 《泰晤士报》，1913年5月2日，第350页。

④ 达科，第100页。





整整一个军团，再加上4艘巡洋舰和足够多的其他运兵船。如果哈布斯堡的军队打算经由黑塞哥维那进攻斯库台，意大利一定会让她的军队越过海峡占领著名的发罗那。<sup>①</sup>这种在阿尔巴尼亚进行的即使不是联合的也是平行的行动看来在这两个国家间达成了默契。甚至最好战的奥匈帝国政治家们，也准备认可意大利的核心地位，而把她排除在这一地位之外，此前一直是哈布斯堡战略家们的目标。如果当时实现了对阿尔巴尼亚的瓜分，意—奥—匈在巴尔干的边界就会是什库姆毕河。

按照利希诺斯基的看法，这次危机本来有可能导致一场世界大战。<sup>②</sup>但对于门的内哥罗和那一年的世界和平来说，幸运的是，尼古拉国王最终屈服了。就像气候在一周内突然从盛夏变为严冬一样，在哈布斯堡帝国，公众感情状态从狂热的好战转到了极端的热衷于和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戒严令很快就撤消了，“向阿尔巴尼亚进行一次远征的想法已被视为古代历史”。<sup>③</sup>

5月以前，大使们向策蒂涅发出了一份联合公报，要求门的内哥罗撤出斯库台。5月1日得到了反对的回答。在门的内哥罗驻伦敦全权大使M.波波维奇提出正式抗议的同时，俄国驻策蒂涅公使提出了立即从斯库台撤军的要求。俄国人劝告说，假如奥匈帝国进行干预，这个山地小国可能会看到它自己的灭亡。<sup>④</sup>此外，门的内哥罗迫切需要外国的贷款，不服从列强就意味着得不到财政援助。<sup>⑤</sup>尼古拉国王不顾其内阁和人民的期望，决定屈服。门的内哥罗人都应该感谢上帝让斯库台落到他们手里，即使

① 《泰晤士报》，1913年5月2日，第350页；《展望》第104卷，第132页。

② 利希诺斯基，第10—11页。

③ 《泰晤士报》，1913年5月9日，第372页；5月16日，第393页。

④ 达科，第101页。

⑤ 《泰晤士报》，1914年1月2日，第19页。



只是这样一个极短的时间。他们国家的荣誉和军队的尊严甚至由于这一“无可挽回的国家的损失”而得到提高。5月15日早晨，阿斯奎思在下议院，莫利勋爵在上议院宣布了尼古拉国王的决定。9天以后的下午，海军中将伯尼开始对斯库台行使权力；由此结束了对门的内哥罗海岸的封锁。<sup>①</sup>

斯库台问题是1913年欧洲最大的危机，因而代表了大使会议最高的最后的努力。“对于斯库台事件我所能表达的惟一情感”，阿兰德先生说，“是一声欣慰的叹息。上星期日（5月4日）对于一位即使只是像次长那样间接有关的人来说，也并不是一个愉快的日子，而我们目前对于斯库台只感到，如我所说，巨大的欣慰，因为关于这个城市的问题不再是欧洲列强间具有威胁性的分歧……门的内哥罗政府应该为了他们自己所得的利益并不少于欧洲的利益而极大的庆幸。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是在大树由于突然爆炸而起火之前爬下了树，这场爆炸本来可能使全欧洲燃起烈火，而不仅是对他们自身不利。”<sup>②</sup>

斯库台撤军之后，大使会议认为阿尔巴尼亚北部边界问题已完全解决。在大使会议闭幕那天所作的决议确定了南部和东南边界。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所划定的边界线从斯蒂洛斯角以南的一点出发，划到了奥赫里德湖，把科尔察地区留给了阿尔巴尼亚。这只不过是对希腊所要求的国境线和意大利及奥匈帝国所支持的国境线之间的一个妥协。为了使发罗那不落入希腊之手，喜马拉雅地区割让给了希腊。奥匈帝国，尽管在斯库台问题上施加了压力，却没有做出同等积极的努力来使阿尔巴尼亚保有南部的一片辽阔领土，这是由于一个奇妙的理由，即南方的天主教派是东正教，

① 《泰晤士报》，1913年5月16日，第389页。

② 下议院辩论，第52册，第2326页。



而占支配地位的外国势力是意大利人。阿尔巴尼亚南部领土的每一点增加，在某种意义上，都会是对高度排他的奥地利势力的一种补偿。无论如何，希腊的注意力绝大部分时间都被吸引在萨洛尼卡；而土耳其在伊庇鲁斯，特别是在亚尼纳的抵抗则是长期的。所有这些共同解释了希腊和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的冲突为什么不像奥匈帝国和门的内哥罗的冲突那样明显的尖锐。

尽管科尔察、莱斯科维奇、阿吉洛卡斯特朗和德尔维诺等重要城市和著名的港口圣奎兰塔归了阿尔巴尼亚，但阿尔巴尼亚失去了肥沃的希马拉。南部和东南边界的确定并不比北部和东北部更公正或更不公正。在英国议员中，奥布里·赫伯特和瓦尔特·吉尼斯对这一不公正的定界提出了抗议。后者说：“事实上，阿尔巴尼亚的人口远远超出了具有希腊民族感情的人口。单单是阿尔巴尼亚族的人口就有 225 万，加上他们永恒的民族感，足以形成一个强大的、坚实的国家；但如果实施希腊的提案，这 225 万人口中只有 50 万会居住在这个新国家的境内。”<sup>①</sup> 那些议员中部分人的争论会使人想起参议员约翰逊、洛奇和诺克斯 1919 年在所谓的（中国）<sup>②</sup> 山东问题上的言论。雷明顿勋爵说：“即使是一个软弱的阿尔巴尼亚也要比完全没有阿尔巴尼亚好得多。”<sup>③</sup> 伍德罗·威尔逊看来对“国际联盟”有同样的想法。

1919 年巴黎和会收到的成千上万份请愿和抗议电报看来有它们的参照物，模仿了 6 年以前阿尔巴尼亚人发给大使会议的那些电报。美国各地有 3 万阿尔巴尼亚人抗议大使会议对于阿尔巴尼亚北部和东北边界不公正的决议。他们驳斥“通过公民投票规

① 下议院辩论，第 52 册，第 2304 页。

② 括号内为编者所加。

③ 上议院辩论，第 14 册，第 365 页。



定南部边界的可耻的希腊提案，因为这样一种投票表达的将不是阿尔巴尼亚人的自由意愿，而是把希腊人的意志用刺刀强加给阿尔巴尼亚人”。<sup>①</sup> 他们请求大使们重新严肃地通盘考虑阿尔巴尼亚问题，给它一个公正的解决。他们的想法表达的很明确，“如果属于我们已五千多年的土地被剥夺，巴尔干将不会有和平”。朗斯代尔、罗得岛、加里、印第安纳、路易斯顿、缅因州、伍斯特和林恩、麻省，还有布法罗和锡拉丘兹以及纽约的阿尔巴尼亚人打给爱德华·格雷爵士的电报，是1918—1919年从几乎地球上的每一个地方发给伍德罗·威尔逊以影响他实行自己的“十四条”的电报之先驱。或许爱德华·格雷爵士在毫无正义可言的利己考虑方面不会落后于伍德罗·威尔逊。不顾来自布加勒斯特、发罗那、索非亚和美国许多地方的抗议，<sup>②</sup> 亚尼纳根据“征服权”割给了希腊。

1913年大使们肯定很难对付富有外交手腕的希腊人。在征服之后，希腊的军官们在阿尔巴尼亚施行了高压和强制手段，以迫使土著居民签署假宣言。外国报刊的记者常常被邀请出席严密安排好的群众集会。事先由希腊官方准备好这些会议的决议，向完全不懂希腊语的听众宣读。天真的外国记者们证实了这些决议，然后把决议作为土著阿尔巴尼亚人的真实意见发往伦敦。<sup>③</sup> 当时头脑简单的德国大使会上了狡猾的希腊人的当是不足为奇的。在他看来，“大部分阿尔巴尼亚人是希腊人。南部的城市完全如此；大使会议期间从重要城市到伦敦来的代表是为了实现与希腊的合并”。<sup>④</sup>

① 斯坎杜，《伊庇鲁斯的人口》，第53页。

② 同上书，附录。

③ 切克雷兹，第95—96页。

④ 利希诺斯基，第6页。



尽管会议的结果并不公正，但必须说，爱德华·格雷爵士在会议上取得了个人的成功，他与大使们的友情和他克服困难的技巧都应该包括在内。由于和平在当时既是对英国的最高要求，又是英国本身所需，由于英国不喜欢为了阿尔巴尼亚的争端发生战争，爱德华·格雷爵士把他的全副精神集中到会议事务上。他如此忙忙碌碌地把时间花费在大使们身上，以至多次不能在议会亲自回答问题。<sup>①</sup> 他有足够的聪明，以会议主席的身分采取了相当中立的立场。由于他对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中间人”的说法没有引起其他列强的怀疑，它们允许他维持和平，只要和平也合它们的意。此外，爱德华·格雷爵士有全体国民的同情和支持。他可以作为一个由团结一致的人民授权的全权大使在会议上发言。全世界都知道，他不是代表这个国家的一个党派说话；这种权力使他打算做的每件事都受到了重视。博纳·劳先生说：“从来没有一个外交大臣在危机时刻受到更少的国内发生的事情的妨碍……总的来说，我认为他从他的国家所得到的支持几乎要比过去任何一位外交大臣得到的都多。”<sup>②</sup>

## 余 波

大使们的会晤在列强关系发生危机的时刻确实有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些会晤所提供的便利，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达到的一致中，可能有一些根本没有达成一致，或者可能没有及时达成一致。大使们当然会催促签署结束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伦敦和平条约。他们只是暂时解决了阿尔巴尼亚问题，他们也没有帮助

① 下议院辩论，第52册，第2324页。

② 下议院辩论，第56册，第2298页。



维持巴尔干同盟。不仅第二次巴尔干战争随即爆发，而且就在一年以后爆发的不可避免的欧洲战争，也主要是由于塞尔维亚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失调。大使会议对阿尔巴尼亚所做的安排带有主要对亚得里亚海问题感兴趣的列强的私利痕迹。只在很短的时间内，实践的检验就揭示了这些安排的虚伪性和肤浅性。伦敦会议仅仅是个江湖医生；大使们和爱德华·格雷爵士没有彻底治疗阿尔巴尼亚痼疾，反而造成了一种急性败血症，这就是1914年欧洲的命运。

江湖医生提供给阿尔巴尼亚的东西只不过是具有独特的国际委员会形式的无用的膏药。1913年9月，共有4个委员会。分别为北方和南方设立了两个边界委员会。海军委员会由海军中将塞西尔·伯尼爵士主持，管理斯库台及其郊区。9月底，就在希腊和塞尔维亚的边境地区开展一场传道煽动，塞尔维亚人向到他们原有的市场上交换商品的阿尔巴尼亚人开枪射击的时候，为全阿尔巴尼亚设立的国际监督委员会在发罗那召开了第一次会议。<sup>①</sup>它实际上只是一个领事委员会。M. 克拉伊维斯基是法国驻斯库台的前领事；哈里·H. 兰姆是同一地方的前英国副领事，后来是萨洛尼卡的总领事；海军准将A. 莱昂尼是前巴斯蒂亚的意大利总领事；J. 温克尔博士是前的里雅斯特的德国总领事；俄国的M. 佩特雷耶夫是俄国驻伦敦大使馆顾问，但也是驻莫纳斯特的前领事。奥匈帝国迟迟任命的代表，何·亚里士多德·彼得罗维奇，是驻发罗那和亚尼纳的前领事和驻亚历山大的总领事。<sup>②</sup>

英国于12月提出了一条妥协线；以此为基础，经其他列强

① 《年鉴》，1913年，第356页。

② 《泰晤士报》，1913年10月3日，第793页。



同意，边界委员会结束了它们的工作。这样确定的阿尔巴尼亚从北到南只有 180 英里，从西到东 85 英里，一共 11000 平方英里，约 80 万人口。<sup>①</sup> 半年以前，就在门的内哥罗交出斯库台之后，阿兰德曾在议会宣布，阿尔巴尼亚将“完全独立的与所有其他强国共处，像其他强国一样独立的生存，并且能够实际上以我们所希望的与其他巴尔干国家同样的方式享受未来的发展和未来的文明进步”。<sup>②</sup> 现在，阿尔巴尼亚领土相当大的一部分和其人口中的大部分被从树干上如此切割下来，可以说，嫁接到了门的内哥罗、希腊和塞尔维亚上面。这就是欧洲人的手艺，用诱惑刺激侨民促进这个新国家的福利。这只不过是列强在柏林会议上的阴谋行为的一个重复。当然，同样有害的结果很快就会出现。

与柏林会议十分相像，伦敦大使会议采取了江湖医生的手法。它努力获得仅仅一瞬间的和平；它不打算根治溃烂的伤痕。正如爱德华·格雷爵士所说：“欧洲会议为它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即使战争局部化，一般说来，我认为，这次欧洲会议是明智的，它使自己达到了这一目标而又不超出这一目标。”他采用江湖医生手法的理由，如他所提出的，是“更多的努力有可能危及整个会议”。<sup>③</sup> 有一个关于新的阿尔巴尼亚边界的书面协议；但甚至英国对维持阿尔巴尼亚的法律和秩序也不承担任何责任。<sup>④</sup> 列强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研究居民的利益，而只是为这个新国家寻求一个统治者，对这个统治者的选择应该使来自他们自己内部的任何反对降到最低程度。最后，他们同意接受一位有着无可非议的名望，出身于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但一点头脑也没有的亲

① 伍兹：《战争的摇篮》，波士顿，第 156 页。

② 下议院辩论，第 52 册，第 2325 页。

③ 下议院辩论，第 56 册，第 2294 页。

④ 下议院辩论，第 63 册，第 1965 页；第 65 册，第 6 页。



王。让威廉·维德亲王作为阿尔巴尼亚的统治者，这一选择于1913年11月23日正式通知在发罗那的临时政府。<sup>①</sup>这位漂亮的、身材高大的、威严的亲王，对于他未来的治理一点也不担心。他似乎认为一旦他戴上了王冠，他会凭着本能了解阿尔巴尼亚人。1914年3月7日，他几乎是未经宣布就溜进了他的新王国。他就像一个希望避开警察注意的政治流亡者一样悄悄进入这个国家。在塞—奥—匈战争宣战之后，作为另一场阿尔巴尼亚暴动的结果，他被赶出了都拉斯，他作那个国家的名义元首没有超过半年。

实际上，从1913年8月大使会议结束，到第二年欧洲战争爆发，阿尔巴尼亚历史上这灰暗的一章正是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中国际阴谋所犯的罪行。作为对1912年11月阿尔巴尼亚独立和中立宣言的回应，土耳其首席大臣警告说：“如果阿尔巴尼亚想要依靠奥地利或意大利，让她不要忘记……克里米亚的先例，后者的独立成为完全隶属于俄国的序曲。”<sup>②</sup>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国一方面受到被希腊和塞尔维亚瓜分的威胁，另一方面又有被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割的危险。大使会议没有帮助她为她的民族独立建立一个强壮坚实的基础。给予阿尔巴尼亚的选择是羊羔式的选择：她必须决定是应该去找羊毛商人，还是直接到狼那里去！从一开始，意大利的政策就显示出是一柄双锋宝剑：分裂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并使奥匈帝国受挫折。不知为什么她宁愿让斯库台归门的内哥罗，也不愿让它落入奥地利或塞尔维亚之手。事实上很可能意大利是让那个阿尔巴尼亚城市投降的首席设计师。艾沙特·帕夏和尼古拉国王之间的谈判是通过意大利领事

① 《泰晤士报》，1914年1月2日，第19页。

② 《评论季刊》第228卷，第157页。





馆进行的。几个月以后，当艾沙特被荷兰宪兵拘捕时，又是意大利要求释放了他。在罗马他被授以勋章。他是意大利阴谋的一个工具。<sup>①</sup>

艾沙特也是塞尔维亚阴谋的一个工具。塞尔维亚人通过他来自迪布拉的难民许愿，作为驱逐威廉·维德亲王的报酬，将会把迪布拉还给他们。与希腊在法国的支持下进攻科尔察的同时。意大利和塞尔维亚发起了反对维特的暴乱，可怜的阿尔巴尼亚人在列强的虚伪面前茫然不知所措，被各种相反的命令弄糊涂了。单纯的阿尔巴尼亚人不懂得列强通过国际监督委员会表达出来的意图。克拉伊维斯基在斯库台陷落之后，立即告诉 M.E. 德拉姆小姐，法国不会允许阿尔巴尼亚存在。<sup>②</sup> 一位意大利上校参加了所谓的都拉斯革命。当艾沙特进入那个城市时，由于他直接从塞尔维亚来，他受到了意大利的代表海军准将 A. 莱昂尼的当众拥抱。

伦敦大使会议没有帮助维护巴尔干同盟的远大目光。通过对阿尔巴尼亚的贬低、剥夺，使其不完整，他们做了一件每个人都最希望的事——即，巴尔干的均衡和稳定——非常难以做到的事情。没有经济上的解放和自由，大使会议之后的阿尔巴尼亚仍然是欧洲脚下的足球，是国际阴谋的温床。大使会议也没有对萨洛尼卡事务作出安排，对于它的所有权的争议实际上破坏了巴尔干同盟，并且导致了自相残杀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欧洲关于巴尔干的外交决非有效和有利的。1878 年的柏林会议和 1912—1913 年的伦敦会议都只不过是对于在巴尔干建立一个联邦的希望不利的工具。欧洲列强从来不会克制他们自己的利益；除了少数例外，

① 《当代》第 302 卷，第 386 页。

② 《当代》第 302 卷，第 387—388 页。



他们在缔结或帮忙缔结一个以后会引起国家之间无穷无尽怨恨的单方面的和平方面也从来没有失败过。

阿尔巴尼亚问题并没有正当地解决，所以实际上也没有根本地解决。在 1913 年 5 月 5 日门的内哥罗国王放弃斯库台之后，大使会议上的紧张气氛立即得到了缓和。但在海尔·冯·亚戈预言性的评论中，威胁着欧洲的危机只是暂时消失。他告诉当时法国驻柏林大使 M. 朱尔斯·康邦，列强是在一个山地区域旅行。他们刚刚到达一条困难的小径，他们已经看到了他们眼前矗立的其他山丘。<sup>①</sup> 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巴尔干同盟，能够保证巴尔干一方面独立于奥匈帝国，另一方面独立于土耳其的惟一力量，受到了令人绝望的损害。不共戴天的仇恨和渴望复仇的种子已经在巴尔干播下；这使欧洲有了进一步的机会玩弄阴谋诡计和进行干涉。此外，塞尔维亚此时增加了巨大的权力；南部斯拉夫民族主义日益威胁着二元王朝的生存；萨洛尼卡，很久以来就是奥匈帝国政治家的目标，现在成了希腊人的财产。如果巴尔干战争的结局不能改变，泛德意志主义对于一条柏林—拜占廷—巴格达铁路的所有梦想都会淡化为稀薄的空气。从那一刻起，扭转这些状况肯定就成为奥—德政策的主要宗旨。

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之间的战争在 1913 年不只尝试了一次。<sup>②</sup> 就在布加勒斯特条约签订后仅 3 天，哈布斯堡王朝就向意大利试探了与塞尔维亚进行战争的可能性。这一建议被拒绝了，理由是三国同盟没有进行这样一个入侵行动的企图。<sup>③</sup> 如果意大利联合哈布斯堡不许塞尔维亚人共享亚得里亚海，M. 焦利蒂自

① 《法国黄皮书》，第 3 册。

② 《泰晤士报》，1913 年 10 月 24 日，第 851 页。

③ 《塞尔维亚蓝皮书》，第 2 册。



然是不能容忍的，而且更大的忧虑是，奥地利人会取代塞尔维亚人在阿尔巴尼亚的影响。尽管如此，简单地说，在 11 月底，德国皇帝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军方在柏林大获全胜。<sup>①</sup> 威廉二世一直使德国的火药保持干燥，但现在他以德国人特有的保密、守纪律和固执的性格加速了备战。德国一直在期待一个好机会，一个令人满意的战争借口；当第二年 6 月这一机会终于出现时，当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在萨拉热窝遇刺时，德国为了向东方挺进这惟一的原因毫不迟疑的支持二元王朝。当这个糟糕的消息到达阿尔巴尼亚时，都拉斯即将被叛乱分子占领，希腊正在涌入南阿尔巴尼亚，在他们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在阿尔巴尼亚的战斗根本不是阿尔巴尼亚的战斗，它只是列强为占有近东和通往远东的通路的大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

（原载《陈翰笙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史建云 徐秀丽译）

<sup>①</sup> 《法国黄皮书》，第 6 册。



# 日本在中国南端省份的渗入

## 南 进

日本的扩张力量渗入中国南端省份悄悄地进行着，虽无日本势力侵入整个华北和东北明火执仗的声势，但现在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阶段。有关日本国民权益问题和中国当局征收各种捐税问题的争端事件不时爆发，如最近在厦门、汕头及北海发生的事端均非孤立的现象。他如有关邻近的台湾岛及东南亚各国的活动也并非无一定目标的。凡此种种综合观之均暗示日本已在发动旨在以一种或另种形式扩张其势力于日本帝国之南的整个各区域。

所谓“南进”的目标迄今尚不如在华北的动向明确。但过去几年中的事件，尤其是今年年初日本发生内部骚乱以来，颇使人有理由作出结论，即日本的北向和南向扩张正得到几乎相等的重视。满洲国的发展未能如当初策划者鼓吹循此方向扩张所预期的那样顺利。<sup>①</sup> 为了抵消这项失策并为满足日本国内某些人长久以

---

<sup>①</sup> 见《远东研究》，1935年11月20日，第182—186页；1935年12月18日，第198—205页；1936年3月12日，第51—58页。



来感觉日本作为强国的国运要求广泛得多的扩张宏图，已采取多种步骤一方面将华北纳入日本的轨道，另方面向南伸展其经济和政治势力。

在这里我们不需研究所谓“南方”究竟含义为何。许多人认为这个词包括整个马来半岛，荷属印度，菲律宾，新几内亚和梭（所）罗门群岛——这广袤的热带地区生产的麻约占世界产量的94%、橡胶约占85%，除拥有大量的食糖、锡、茶叶和烟草外，还拥有巨大的原油和铁的储备。这种原料资源，加上满洲国生产的小麦、纤维、煤炭、羊毛和华北的棉，将使日本从自给自足和掌握自然资源的观点来看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 对中国的威胁

不论所谓“南进”究含何义，至少日本在目前的主要表现是在中国南端省份进行活动。而就中国本身来说，这类活动将给它的国民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其终极目的不外于征服或瓜分这个国家。来自北方的冲刺之外，再加上在南方获得立足地的企图——以福建省作为渗入点，以邻近的台湾省作为行动基地。

更具体地说，日本渗入——从这个词的广义来说——中国的东南部分的行动表现在以下各方面：（一）将台湾发展为行动基地；（二）在福建利用治外法权获得土地，保护罪恶行为，伸张日本的警察系统，进行高利盘剥；（三）最近计划从日本和台湾向福建和广东移民十万人；（四）图谋获取有特殊战略价值的中国领土；（五）为攫取福建和广西矿产资源控制权的部署；（六）沿东南海岸线增进航运权益的活动越加频繁；（七）扩大有组织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以及（八）对自治运动的利用。前四种表现可列为主要是政治性的活动；后三种是经济性的；而最后一种



则是为巩固前七种渗入作法所获致或可希冀的成果。

## 基地台湾

发展台湾成为在大陆上进行活动的基地之事已载早先一期的《远东研究》(1935年12月4日,第195页)。早在1935年9月据悉台湾十年发展计划的三个目标之一已被直率地宣称为“协助发展日本在华南和南海利益的政策”。从那时起发展极为迅速。最近的报道指出,整个岛屿正在迅速军事化,或至少是将发展的重点放在军事方面。除已有现代化的公路系统外,又在建造双轨铁道,密集的能容纳整个空军中队的飞机场,和在岛的南端的新港。台湾将配备一支25000人的防卫部队和日本第二、第三舰队联合组成的海军力量。目前该岛的经济和军事中心正由北部移向南端。

最后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几周以前小林海军大将被任命为台湾总督,同时此岛的首脑级别已提升到与朝鲜总督和派驻满洲国的大使相等。据官方解释这次升格是为了促进集权并使殖民当局在此岛的经济方面行使更广泛的权力的一个必要措施。但日本国内的报界和许多著名作者的解释都说这一措施的目的是使南向扩张运动与入侵北方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以后这一总督职位必将由一位海军大将来充任自不待言了。

利用治外法权作为间接而极重要的渗入手段,已在中国东北三省作出明确的先例。日本目前正在满洲国放弃一些治外法权。但是1931年以前在中国东北的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曾使用这种特权作各种活动。时至今日,台湾人正以官方或半官方形式被遣往大陆,并在那里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和所谓“保护”。



## 双重国籍

在厦门一地有不下 15500 名中国籍居民由于他们曾在台湾居住过一个时期从而成为日本的国民。按照中国法律，他们仍被认作是中国公民，因而有权在福建租赁和拥有土地。日方辩称这些具有双重国籍的人，即华籍台湾人，继续享有治外法权却又不受中国禁止外国人拥有土地的法律拘束。此外，他们还享受日本领事警察的保护，这类警察经常在厦门和汕头越出租界边线活动，表面的借口是在协助中国警察维持秩序。

最近几个月来，特别引起了人们关注的是，据报道日本人和台湾人在厦门经营的咖啡馆、舞厅和典当日益增多。如果说治外法权问题对双重国籍居民是个难点，那么对于单国籍人——即作为日本国民的台湾人，更为困难。极为明显的证据表明治外法权是为了保护妓院、赌场和淫猥表演等的经营者。

有关这个问题可以引述一个由负责的中国和美国人士组成的委员会所作慎重调查的结果，调查报告发表于著名的专载在华基督教传教工作的《中国纪事报》3 月号。报告说“在台湾人中有许多体面的守法公民，他们经营顺利和中国邻居的关系极为融洽。但是前几年在福州和厦门愈演愈烈的骚乱，则来自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类型的台湾人和日本国民，他们都生活在日本领事馆的保护下，从事烟馆、赌窟和妓院等非法营业。在有些事件中，涉及的是中国人归化入日籍的日本公民，在较多的情况下，店员是中国人；但绝大部分掌权和有势的是台湾人。”



## 罪恶经营的扩展

本年初同一来源的报告说，在福建的两个最大城市福州和厦门中，日本人和台湾人拥有或控制的鸦片烟馆有 642 家。最近本人又从报告的作者处获悉这数字已增加到 782 家。该委员会掌握了全部的事实——包括地址、营业种类、日籍或台湾籍老板或经理的姓名等——不但包括上述 782 家烟馆，而且还有近 100 家的赌场和众多的妓院和当铺。在省会福州，烟馆的数字与厦门相同，只是日籍和台湾籍的妓女要多得多。

引述这些事实不单单是为了进行改革。目的在于指出这巨大规模的有组织和受保护的罪恶活动的存在，它完全无视中国警察的管辖权。这意味着什么是很清楚的。这些不法分子自然喜欢这种可以得到保护，和积极的实质支持以及制造各种“事件”的状况。他们被利用和所起的这类作用在远东肯定不乏先例。

同一组织的调查者还在《中国纪事报》中透露日本警察扩展管辖范围的作法，这和美国闻名的“保护勒索”的某些方面颇有相似之处。若干中国企业，例如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被迫雇用日本警察或台湾管事人。被迫雇用的原因在于只有这些当局才能防止日人或台湾人偷电、偷水或偷窃任何其他财产，不论是为他们自己或为中国犯罪分子偷窃。这种事态不仅表明外国统治权的扩展，而且还招致执法的无能，这方面目前即使没有外来的威胁，也已经软弱无力了。

## 保护下的重利盘剥

还需要提及另一种形式的治外法权特权的滥用，这是因为它





的规模之广也已成为一种渗入的形式。日人和台湾人都在重利盘剥上大发横财，这见于福建省，特别是在福州和厦门。重利盘剥制度在中国的为害已在本刊早先一期上有所叙述（1936年3月25日，第63—68页）。日人和台湾人经营的当铺——在厦门一地约有200家——为害更烈。这些资本的一千银元的当铺均在当地的日领馆登记备案。日领馆庇护下的这些当铺可以自由收购赃物和形形色色的劫掠物。这些物品的原主在费了很大的周折查明其下落后只能在拍卖时买回原物，而当铺则从中取得了暴利。

还可以补充说一下这些日本和台湾质当铺规定的月息约为20%，赎期常以两个月为限，它们能以如此苛刻的条件经营获利——面临着月息仅7%—8%并以较高贷额收进质物的中国当铺的竞争——就极能证明它们收进的质物性质了。凡这类当铺所到之处，犯罪行为就上升。

## 不法借贷行

日本人和台湾人还在经营着一种发达的贷款业务。在厦门一地他们拥有60家以上这种收取日息的所谓借贷行。规定的手续颇耐人寻味。借贷人必须具备三个相互联保的保证人。每次借款均明确规定日息，并在贷款中预扣全部应付利息。借贷人逐天还本。短付一天就要承担规定的罚款，缺付罚款，罚上加罚。规定偿付期届满时，全部贷款必须清偿，否则加算利息。

试举例说明如下，言明贷款十元，息额一元五角，贷款人实得八元五角。借期订为四十天，每天还款二角五分。如贷款人不能在四天内偿付一元，罚款十元。罚款就加在贷款额上，另按新率起息。

当然，就中国法律而言，这种超高利贷是非法的。事实上其



非法性使得大多数从事经营的中国行家不得不倒闭，或仅能苟全。而日本和台湾的借贷行则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可得到日本警察的协助使贷款契约均能履行。

## 殖 民

另一种较上述各类行径更为直接的渗入方法就是断然的殖民措施。这对以城市为居民点来说还不是不可少的，因为治外法权存在的本身就足以吸引有创业精神的国民。现在台湾已集资5000万日元成立一家拓殖会社。这组织在10月10日开业，它宣布的目标包括调查、投资、建设和殖民。这家新会社除在福建和广东建立农业和渔业的新企业外，还计划在五年内从日本和台湾移民10万人至东南海岸。这一行动在某些方面显然配合了近年来可看出的总动向，即鼓励朝鲜人移民满洲国，日本人移民朝鲜。它与北方的渗入也有联系，据报告这开发华南资源的台湾公司要求和日本南满铁路最近为开发华北资源而成立的黄中公司通力合作。

在福建的两个沿海战略区，厦门和平潭，日本已在各种租赁的名义下获得大片土地，目前似乎还在全力以赴谋求完全占有汕头以东位于广东与福建之间枢纽地带的南澳岛。在过去一年中，日本的特务人员积极在资金上协助约7000名破产渔民和农民移住台湾从事矿业和农业劳动。与此对应的是，可以享受治外法权的台湾人则被鼓励移居南澳。这种居民的交换似乎不可能以经济理由作为解释。



## 日本对铁矿的需求

在另一显然不同的领域里，日本的活动也是值得注意的。如所已知，近几年来日本大部分活动的幕后动机为占有原材料的来源（见《远东研究》，1935年2月13日，第17—21页及1936年1月15日，第9—14页）。其中尤以铁矿为最重要，日本、朝鲜和南满铁矿年总产量最多为170万吨；从中国的安徽和湖北，加上马来群岛各国和菲律宾的年进口量至多为190万吨。而日本生铁工业的冶炼能力已接近300万吨，为冶炼300万吨生铁，至少需要540万吨中级矿石。这就意味着有必要经营在某些地区再找到额外的180万吨矿砂。而战时需要很可能提高到350万吨。

这种形势的另一因素在于日本企图保留它国内较少的铁矿资源，据公认如充分开采将在数年内告罄。事实上减少日本国内矿产量而增加劳动力价格较低廉的殖民地区的产量可从最近15年的统计资料得到佐证。1928年在日本可供开采的74座矿井中，有62座处于保留状态。受到影响的钢铁企业得到了补助金和免税进口铁砂的配额。保留矿源和增获矿砂以应日益增长需求的努力可从中国南京出版的《矿业周刊》才发表的数字得到说明。这家周刊仅说湖北大冶铁矿于1935—1936年对日输出了60万吨铁砂。这个数额接近经常出口额的两倍。而且为了在下一年提供70万吨铁砂正在议订新合同。

## 安溪的潜力

所有这些足以说明日本正对福建省安溪矿山的潜力所表现的兴趣。去年春福建省建设厅请求日本驻福州总领事馆推荐日籍工



程师和专家参加对安溪矿的实地总勘察。去冬组织实地勘察就绪后，人员中有 18 名日籍专家和几名日籍助理员，大多数来自南满铁道会社。勘探工作分为四个部分：钻探、矿坑测察、铁道规划和港口研究。后者的任务是寻求或建议铺设铁路，以便将矿砂运到海岸并勘定开港地点以利运输。发展水力供开矿用电的可能性亦经研究。

全部工作尚未告竣，但若干初步勘察结果已经发表。据查明安溪地区的总储藏量至少达 4800 万吨，矿质极佳。湖北和安徽矿的铁含量为 50%，而安溪矿的铁含量为 67%。安溪产品中仅有 3% 的镁含量，而硫含量少于 1%。据估算开矿和将矿石运到海岸约需华币 3000 万元。一些省政府高级官员已表示由于福建生产的炼钢用煤质量低下和数量不足，矿砂准备售与日本工厂，售价约华币 10 元一吨，包括矿税 1 元。

## 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

日本谋求从中国获得尽多的矿石以补国内储量的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从中国的观点来看，矿藏量本不充裕，一旦实施长期和健全的工业化规划时，这些也是急需之资源，岂可弃舍。将来日本如在经济控制之外加上政治控制，事态将更为严重。尤有甚者，福建省政府在整个开发计划中所起的作用也不是没有反对意见的。当局必须采取特殊措施以防止为反对日本介入安溪开发而起骚动和示威游行，并对参加工作的日籍专家予以保护。为此已派出省保安队的整个第五团护送勘测队，并向公众说明开发规划的“真实目的”。

同时日本拟还着眼于在广西获取新的矿源。最近来自远东的报道称住友银公司已经决定投资 1500 万日元于广西的采矿业。



今年初有一名谢大江的台湾人受托与省当局谈判在该省开设一家中日合资公司开采铁、锡和镁矿。该省还和大连和天津设立办事处的黄中公司进行磋商与合作。甚至现已宣布要在台湾设立一个广西矿业公司的分支机构，因为正如福建一样，预计本地出产的原矿将运往台湾冶炼。

## 航 运 竞 争

渗入的迹象也见于日本图谋对东南沿海的航运取得更大的控制。日船的运费率使日本、英国、中国和其他国家航运业间的竞争更形激烈。据悉大阪公司正在考虑大幅度降低货运水脚，使之仅达中国轮船航运公司运费之半。大阪公司已派出代表和华商谈判订立三年或五年为期的货运合同。这家公司已从汉口、芜湖调拨来两艘轮船到厦门和汕头承担货运，其目的在于揽去较多的货运量，年度货物值至少可达1亿元（中国银元）。

应更指出，在航运上特别难以区分普通的商业策略和政治性渗入。在通常情况下日本夺取中国东南部的航运可以仅看作是商业经营。但是如与指向同一目标的其他因素联系起来看，则额外的企图又昭然若揭。这些其他因素有的已在上文概述。另一正在引起极大关注的伎俩为北方的走私活动（见《远东研究》1936年5月25日，第110—111页；1936年6月3日，第115—122页；和本期，第238—239页）。

## 大 规 模 进 行 走 私

华南的走私活动并不局限于某一港口，但汕头是公认的走私中心。在福建和广东两省可以看到两种走私方法。首先是由日本



人、台湾人和一些华人严密组成的大规模的走私公司。走私项目常是食糖、火油、水泥、火柴和海味等高税商品。使用的运输工具是汽艇、帆船和渔船。第二种方法是利用个人经营的正规运输渠道，多为个人经营。通过海员和旅客带进中国口岸大量的布匹和各类杂货。几个星期以前英商《字林西报》的一位通讯员报导：“每当一艘从新加坡满载中国归侨的船到厦门之际，中国警宪和关员执行职务时威风凛凛，颐指气使，不可一世，而当一小小的台湾船到来时，他们却噤若寒蝉，奉命惟谨”。

汕头之所以在走私活动中处于关键位置是由于它是人口极为稠密的汉江流域地区的门户，这地区为走私物品提供了良好的市场。这里的活动基地正是附近的南澳岛，前已提及此岛有可能用作海军基地。人所共知岛上以及大陆附近地区的穷苦农民、渔民多收容日籍或台湾籍的“女婿”入赘，按月收取这些“亲戚”交付的酬金。

## 对物价的打击

遗憾的是大规模走私对中国的金融和工业的危害，其程度如何尚乏统计数字，即就汕头一地而言也无可靠的数据。但可以通过每担 18—22 元（中国元）的非走私食糖价与每担 10—12 元的走私食糖价以及每箱 42 元的上海制火柴价与每箱约 21 元的走私火柴价的比较看出走私之害。五月间广东糖厂的半数已关门大吉，而在目前事实上已全部停业。

走私也波及货物的输出。出口征税的食盐和大米从广东和福建经由广州湾和厦门走私外运。由于大米走私严重福州的米价去夏从华币 8 元上升到 12 元。内地若干地区的食粮价格也同样上升。



## “自治运动”

正如在北方走私以及其他各种的直接和间接渗入方法均伴随着所谓自治运动，目前在南方的几种活动也将采用类似的运动加以巩固。早于1915年日本即在著名的二十一条之一中提出将福建省划入其势力范围。今天看来将通过“自治运动”的新手段来达到这同一结果。近日中国报纸报道臭名昭著的高义已接受日本的财政援助以便在闽南组织所谓自治运动促进会。著名的日本泛亚主义倡导者松井将军途经福建去两广时“受到了高义的盛宴接待”。

据悉在厦门和鼓浪屿有另一秘密结社进行着同样的工作。定名为“福建自治委员会”的这个结社派遣了很多特务去内地鼓动自治。这些特务在漳州和泉州尤为活跃。不久前曾有数名匪首在平和地区办起了“自治军”，当其中一人林振群为中国政府军所逮捕时，日本总领事要求中国当局将他释放。在滨海另一名为新化的地区，又一匪首江天泽正在组织一支“忠义救国军”。所有这些与日本在北方进行的各种活动何其相似！

## 终极目标何在

这里特再重申，很多上述的活动是可以解释为正常的经营活动，在一般情况下并不特别引人注意。但是将这多方面的经济活动联系到其他具有突出政治性的活动，并和华北的类似行动和最近整个的中日关系史合起来看，其政治倾向是昭然若揭的。在正常情况下，日本与中国之间发展较密切的经济联系无疑对两国都有利；但是凭我们所了解的这些阴暗事件，就不可能将眼下发生



的事称之为自愿合作和互利活动了。恰恰相反，日本目前在南方的所作所为正如它在华北的活动一样，将给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论日本决策人士心中如何打算，通过南北并进而使整个中国置于公开或隐蔽的日本统治下，也不论将华南看作是日本势力扩张到整个东南亚的基地，这在决定未来局势发展的重要性上，无疑是不及日本扩张主义内部的强制力量以及必然引起的巨大的反对势力。

（原载美国《远东研究》第5卷第22期（1936年11月4日）

卫宝瑛译 杨小佛校）





## 中日战争的经济背景

自从目前的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一些主要日报的社论一再声称是中国军队挑起了侵略。它们用与日本政界领袖如广田首相、荒木将军和德川亲王之流同样的腔调说话。按照它们的说法，如果中国保卫自己的领土，就是对日本的侵略；如果日本攻击中国，就是日本的自卫。去年11月1日，大阪《每日》和东京《日日》的高石先生在纽约接受了采访，他从日本来会见美国新闻界人士并阐述日本的战争观。这位著名的新闻记者和日本非官方使节再一次坚持说，这不是一场日本人进行的侵略战争，而是由共产主义引起的战争。他的原话是：“全日本都知道我们不是为任何物质而战斗，这是一场精神战争。”

这场所谓的精神战到12月中旬已经杀死了425000中国人和至少35000日本人。与上一次欧洲大战相比，由空袭造成的死亡正在骇人地增长。如同千百万中国城市居民所看到的，日本炸弹落在了人口密集的居民区，远离任何有军事价值的地点，造成了极为恐怖的死亡和破坏。日本飞机并不总是在8000英尺上空飞行，在没有防空火力的地区，它们常常低飞并使用它们的机枪，不仅瞄准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而且更多的是对准村庄里的



和华北。日本体制的掠夺本性是军事冒险或战争的同义语。

日本法西斯主义选择了一个极为合适的时间来实行他们称之为大陆政策的东西。西方国家还没有完全从世界经济萧条中恢复过来，其中最有力量的国家正全神贯注于它们在地中海的利益；而美国国会和国务院看来对某种孤立政策有不同的考虑。英国的外交关系正处在一位对法国和东京政府比对华盛顿政府稍许友好一点儿的首相指导之下。人们禁不住会明白，内维尔·张伯伦，如同英国工党发言人赫伯特·莫里森最近从呆板的阶级意识出发对他作的描述那样，宁可代表伯明翰的利益而不愿代表曼彻斯特的利益。

现在回头谈中国，我们发现 1937 年年中的经济形势多少不同于 1932 年。正如本文作者以前在《远东观察》（第 6 卷，第 229 页）上叙述过的，战争爆发时中国实际上已经从经济萧条中复苏。尽管战争剧烈改变了经济前景，但此前几个月中产生的新的希望和信心还是可以对公众关于当前冲突的态度起一种并非不重要的作用。

尽管存在其他因素，其中主要的无疑是世界经济复苏带来的对中国产品越来越大的需求，中国商业状况的改进大致可以说是从 1935 年 11 月的币制改革开始，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国民政府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1936 年，在稳定和统一货币、铁路建设、工业发展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都取得了进步，同时，刺激西方商品市场发展的新的外国资本的注入，看来势头良好。1937 年上半年已经证实这一发展势头在继续。例如，在上海，电力消费增长了 69%，棉纱生产增长了 27%，面粉生产增长了 13%，水泥增长了 42%，新的建筑工程增长了 47%。中国各铁路盈利增长在 20% 到 40% 之间。出口增加 45%，进口增加 32%，贸易入超略有降低。



物价的上扬反映了这种全面发展，附带说一下，这种情况表现出币制改革带来的一些极为令人感兴趣的结果。的确，就全中国来说，中国物价指数所代表的情况极不完善，但它们确实能够较正确的反映大型工商业中心的情况。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以1926年为基数，从1935年的96上升到1936年的109，1937年1月是122，1937年5月为125。上海1937年5月的指数显示出与上年5月相比增加了约20%，与货币改革之前的1935年10月相比增加了31%。广州、汉口、天津和其他一些北方城市也出现同样的趋势。当然，农民、工人和拿薪金的雇员不得不忍受高物价带来的生活费用上升；但商人、工业家和银行家却受益匪浅。

对于中国商人来说，特别是在上海及其他大商业中心，1936和1937上半年的令人振奋与1931年、1933年和1935年的令人沮丧相似。尽管毫无疑问，发展尚未达到顶峰，但商业条件的好转却标志着近几年中值得注意的进步，并逐渐使中国资产阶级意识到他们已有了一些值得保卫的东西，假如说1932年他们还缺乏自信，1937年他们却愿意为保护他们的未来更多的冒险。中国人民还存在一种普遍的真正的恐惧，害怕日本法西斯会把他们变为半奴隶状态的工厂工人、半奴隶的种棉人、挖煤工、伐木工和打水工。这种从基本经济事实中产生的巨大忧虑导致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实际上，日本陆军的入侵和海军的封锁使中国这一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高级官员和中国著名外交家们失去了他们在日军占领区的不动产。在东北、内蒙和华北大批军官们拥有的土地由于军事干扰而贬值，在有些地方干脆被日本人没收。很多工厂主让他们的工厂停工，还有很多商人失掉了大部分市场，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学生眼看着他们的学校被毁，农民被赶出他们的家



园，或被用绳子拴在一起为侵略军干活。由于日军的封锁，近海水域数百万中国渔民停止了打鱼。战争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穷困、苦难、不幸和饥饿对创立一个共同自卫、共同负责的制度发挥了不可抗拒的影响。总之，这场战争肯定会促进中国的民主制度，就像美国的独立战争诞生了宪法会议一样，就在这一次中日战争爆发前3天刚刚庆祝了宪法会议的150周年纪念日。

日本方面情况正相反。日本不是在进行防御，不是在保卫它真正的民族利益免受外来侵略。在日本，农民悲惨的困境一直没有减轻，事实上比以前更坏；工厂工人的实际工资——当然，在军火工业中工作的除外——仍然在下降；从农村出来作包身工或妓女的女孩子仍然像奴隶一样受剥削；小商人、小店主和手工业工人继续受不断增长的国家企业和金融垄断企业的排挤……伴随所有这一切的是，陆军和海军的军费几乎每年都要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服兵役的年龄从21岁改为18岁，所得税提高，免税限额降低，而政府垄断企业生产的商品价格高涨。日本正试图用战争和掠夺解决它所有的矛盾。正如在意大利和德国那样，日本正在为一个法西斯计划积聚力量。

以农业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为一方，以工业和银行业为另一方，二者之间原已存在矛盾，并由于战争而加重，这一点，所有研究日本当代事务的人都已经非常了解。但为了理解这一次战争的经济背景，我们还需要了解另一种矛盾，即日本资产阶级中出现的矛盾。

日本制定的意图减轻世界经济萧条时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征服政策，不仅使城乡之间和地主与农民之间旧有的矛盾继续存在，而且产生了新的只能使情况恶化的矛盾。1931年在中国东北的冒险活动之后，日本出现了一系列以军费和军工企业为核心的新的工商行业。当然，旧财阀集团中有很多都与这些行业有利害关



系，但强有力的新财阀集团也凭借着向军火工业投资而成长起来。政府预算要直接对这些新财阀集团的产生负责。几乎一半的预算拨给了陆军和海军，其中大部分将用于购买军火和战争装备，32%的陆军预算要花在中国东北。1935年的统计表明，当年陆军和海军花了41000万日元向私营军火和军用品工厂购买物资，而购买大米、面粉和其他食品的钱不超过2150万日元。

由于劫夺东北以及随之而来的日本经济不平衡的扩大，资产阶级分裂成为两个集团。第一个，也即新的一个，包括军工企业的资本家、与他们有关的银行家、少数也在军火工业中有利害关系的大地主和大部分主要业务是为军火工业供应原料的进口商。第二个即老的一个，包括轻工业资本家，主要是那些经营纺织业的人、与他们有必要联系的银行家、大部分地主、还有大部分出口商。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把前者称为重工业集团，后者称为轻工业集团。

1929年到1932年之间，日本的轻重工业以同样的速度发展。然而，自那以后，轻工业的发展速度慢了很多。日本政论家H. 山川曾指出，林内阁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恢复战争工业与生产日用必需品的工业之间的平衡。不必说，林下台和广田上台，主要是由于日本军队的势力从一开始就站在重工业集团一边。在日本当权的法西斯主义认为，如果陆军和海军的预算被削减一半，就会引起严重的工业崩溃。对于他们，以及对于整个重工业集团来说，武器工业是维持日本繁荣的主要因素。

重工业集团和轻工业集团都希望征服中国并实现东亚的和平。但前一集团首先关心的是直接获得原料，而后一集团主要关心的是立刻扩大市场。因而他们对于征服大陆政策的程序方法上有分歧。日本重工业集团的态度表现为一个急进的军事计划，而轻工业集团的态度表现为耐心的、外交上的和较为政治性的方



式。在日本对西伯利亚的干涉失败以及华盛顿会议签订了九国公约之后，在日本先被赶出苏联的远东部分又对英国感到失望之后，主要代表轻工业集团利益的自由主义者在东京政府中保持他们的势力，直到1931年著名的沈阳事变即将发生时。从1932年起，军事家、军火工业家以及他们的银行家们结合成了一个法西斯集团，在政府中的势力日益扩大。

今年3月，日本纺织业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要对中国作政治征服而不是军事征服。日本轻工业领袖们组成了一个代表团，以K·儿玉为首，访问了上海和南京。他们非常明白，从方式方法来说，中日之间任何经济合作都必需通过握手而不是挥拳。他们回国后提出了取消日本人在冀东建立的伪政权并控制普遍的日货走私的建议。然而这两个建议都被政治权力迅速增长的法西斯集团否决了。因而，可以肯定地说，日本重工业集团和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政策是当前的中日战争直接的，无论如何都是最重要的原因。

华北的5个省，作为与东北分开的一个地区，拥有全中国已知铁矿蕴藏量的一半，和全国80%的煤资源。与这样巨大的潜在的财富相比，华北的棉花和羊毛无论能够取得多么大的发展，都只能被看作第二位重要的东西。正如上个月由一个日本在华企业所正式宣布的那样，日本人控制下的平津地区维持和平委员会授权这家企业接收了平汉铁路上以前由中德合办的井陘煤矿。仅这一处煤矿的蕴藏量估计就达22000万吨。

在伦敦《当代评论》上，英国记者哈里森·布朗恰当地描述了战争的爆发：“在中国日本只害怕一件事，不是蒋介石，不是军队，也不是国际联盟。他们知道他们能够收买军阀，欺骗列强，用他们的机器击败中国军队。但日本害怕中国数百万人的革命运动；因为这样一场运动必然首先是抗日的。他们引起了这一



运动，这一运动改变了抵抗他们的力量的平衡……日本军国主义看到了历史在重复自己。1931年他们本来能够从俄国人手中抢走西伯利亚，他们却占领了满洲。现在西伯利亚已无法被夺，远东的红军太强大了。日本人害怕如果东京的工业家们（轻工业集团）按照自己的想法办，并继续‘和平渗透’，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华北。因此他们发动了一个‘事变’，他们打算借此摊牌，并且，他们希望在中国团结起来之前打败中国，使革命完全不可能发生。”

战争爆发以来日本纺织业遭受了重大损失。首先是东京市场上富士、东洋、大日本和钟渊纺织——4家企业都在中国有工厂——的股票价格从7月到9月跌落了20%到50%不等。其次，日本纺织业仅在上海的投资就达23000万日元，尽管日本人有效地避免了财产的完全丧失，但日本人拥有的大型棉纺织厂、货栈、码头和汽船停泊处都被烧得一片漆黑，只剩下金属和砖石外壳——成为日本自己的海军、空军和炮兵部队的牺牲品。中国军队也在撤出他们长时间防守的苏州河时放火烧毁了日本人拥有的工厂，即日本人用作军事要塞的价值2200万日元的东洋棉纺织厂。最近，青岛的日本纺织厂也被中国军队烧毁，但这显然出乎日本人的意料。第三，东京政府正在用管制原棉进口和对布匹及棉纱规定官价的方法限制纺织业。进口管理局正在使大阪市与军火生产无关的各种工业企业挨饿。在今年第三季度，棉纺织业收缩的比率是27%，而政府迫切要求进一步收缩，使这一比率达到33%。

最近，日本的报业大王宣称日本几乎可以无限期的战斗下去。我们完全理解他，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纸浆生意肯定会随着战争无限期的摧毁一切而无限期的繁荣。但就我所知，没有一个日本纺织业者有同样的态度。实际上，当11月底帝国统帅部告诫



日本要准备战争延长时，东京《朝日新闻》代表普通商业界的利益，就提出了直接与中国政府谈判的要求。

日本农民正在走向更为悲惨的境地。稻谷和蚕茧的价格一直受官方限制，但肥料价格却飞涨得比天高，还越来越多的征用或“扣押”村民的马匹。日本工人被禁止罢工，但他们组织了专门的委员会，以便注意他们的雇主不能利用战争口号来进一步减少他们的工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早在俄国革命之前很久，甚至在红军成为俄国的一个要素之前很久就开始了，但这一次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却遇到了一些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期间，甚至在日俄战争期间都没有发生过的情况。东京市政府和一些县的政府建立了专门帮助士兵家庭的救济机构。如《纽约时报》一位驻上海的记者在10月24日的报道所说：“日本农民士兵的心没有放在战斗中。”

尽管如此，为了解决轻重工业集团之间和城乡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战争的意图是解决它们但却只能使其加重——日本法西斯在10月中旬建立了一个超级内阁组织，这就是日本内阁咨询委员会，包括荒水、池田和松岗将军等著名的法西斯主义人物。名义上，这一委员会的10名成员与各部部长有同样的待遇和级别，但实际上他们或多或少更像首相或是一个首相团，不论日后内阁是否改组，他们都会继续掌握实权。即使下一次日本大选偶然地选出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国会，并且可能由此产生一个自由主义内阁，这个超级内阁仍将当权。这10个人可以向天皇提建议，并同时向内阁下命令。这是最近法西斯在日本发展的现象之一，这一发展毫无疑问将使日本成为全世界民主主义最厉害的敌人。

中国农民将赢得最终的胜利，就像600年以前法国人赶走了英国骑士那样肯定。在日本将会发生农民起义，会比瓦特·泰勒





领导的反对英国“劳工法”的起义更猛烈。但是，在我们与法西斯日本的斗争之中，我们不能指望从世界各国政府那里得到太多的帮助，甚至不能指望那些加入了正式的同盟和条约，发誓维护中国完整的政府。蒋介石夫人11月9日发表声明说：“日本对上海的蹂躏是在列强的帮助下进行的，列强不仅无能实践他们的条约义务，而且默许日本采取措施阻挠中国得到足够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和军火，”她还说，“可以把中国比作一个用旧式的来复枪武装起来的守法的公民，正在受到匪徒的机关枪残忍的射击，而警察站在一边隔岸观火，希望自己不会受伤。同是这些警察，不但自己不帮忙，还阻止别的公民帮忙装子弹。”是的，对中国的帮助肯定主要来自各个文明国家中那些决心维护正义的好心的普通人。中国实际上就像托马斯·佩因所说的法国一样：“现在……事态发展远远超出了她自己的国土。”中日战争，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原载《美亚》第1卷第11期 1938年1月

史建云 徐秀丽译）



## 中国持续抗战的前景

美国通过各种渠道所传达的东京的普遍看法是，汉口这一战略城市将于10月初被攻下。如果中国对武汉的保卫能够坚持更长时间，本应给集中全力进攻汉口的日本军事家们造成极大困境。除汉口的命运之外，中国抗战问题一般说来现在也成为当前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要论题。为了明确掌握这一论题，有必要审视中日战争的基本性质。

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是由战争和赔款孕育而成。这条发展路线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刺激，并导致沈阳事变和随之而来的伪满洲国的建立。在日本，这次事变使激进派和稳健派之间的政治分歧具体化了。前者包括军队中的青年军官、重工业，特别是军工企业的首脑，和钟渊纺织会社——一家欲图对中国棉花市场垄断控制的大纺织企业。这个集团对外交行动感到不耐烦，鼓吹军事恐吓，最终导致1937年7月的不宣而战。在两个精锐的陆军师在鲁南的台儿庄惨败之前，他们在日本政府中一直占上风。当他们开始意识到征服大陆的任务远比他们预期的困难得多时，他们逐渐与稳健派——轻工业界、出口商、代表中产阶级的政治家和军队中的守旧分子——妥协，后者希望速战速决以缩短



战争。这种妥协的结果是去年6月底近卫内阁改组，稳健派的宇垣和微进派的坂垣两人都得以入阁。这套班子实际等于一个新内阁，代表着日本自1931年以来最强大也最统一的政治势力。这两个集团都着眼于集中全力进攻汉口以实现速胜。

除日本人之外，还有很多人现在都对中国继续抗战的能力提出了疑问。《朝日新闻》的记者尾崎秀实，从战争开始以来，成了研究中国的日本权威，他最近评论了这一问题。在日本《朝日画报》海外版5月号上，他指出中国没有能力继续进行全民抗战。尾崎在这里提出的大体上与他在日本写的大量文章相同。他的观点可以代表在现届东京政府领导下的日本军方的普遍态度。

中国抗战会失败的内在因素有4个：即中国各政党之间缺乏完全的合作；军队的训练和装备低劣；缺乏长期战争所需的财力，上海汇兑市场最近的暴跌就说明了这一点；各省军阀首脑扩张自己的权力而不服从中央政府。

对于第一点，有必要作历史的观察。在中国，如同在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存在着保卫民族传统和维护自由发展的愿望。这是一种在世界历史中经常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在19世纪初造成了拿破仑的失败。真正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自卫，只针对着侵略——帝国主义的特征。民族主义要求共同防卫，因而要有共同的责任，要有民主。也因此，一个受到外部威胁的民族倾向于更高度的民主，而同时它的行政机构要更有效和更集中。日本明治时期的历史应该由此来说明，这也是当前中国民族统一潮流不可抵挡的解释。显然，中国没有一个阶级能够从日本统治中获得好处，尽管存在着极少的卖国分子。基于这一根本事实，所有政治团体，主要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建立，并在1937年重建了统一战线。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对该国的某一特定阶级有着巨大



的利益。追求少数人的私利代替了共同防卫。这必然引起政治分歧，并且，除非其发展受到抑制，最终将会导致独裁。这种情况在德国及意大利这样的法西斯国家和日本这样的半法西斯国家得到了证明。战争开始时，日本人民是顺从的，并且普遍不感兴趣，但后来的局势造成了日益增加的利益冲突。农民由于马匹和人力被征用，以及肥料价格不断上涨而怨声载道；小工厂的工人们组织了更多的罢工；中小商人和企业主越来越受到外汇管制和生产削减的损害；甚至于渔民，由于船用汽油实行配给而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减少，也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东京去提出他们的要求。

很明显，远东真正的问题是一个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反对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在上一次欧洲战争的后期，与日本在中国实行“让中国人打中国人以不战而胜”的策略的同时，中国民族主义的烈火开始燃烧。孙中山代表了民族主义的先行者，他领导他的党——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共同反对外国侵略者及受其利用的国内政治势力。这一有良好开端的民族统一战线在约10年以前破裂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某一个政治集团的幻觉。这个集团——其成员有国民党党员也有非党员——认为，与帝国主义及其中国工具作适当的妥协，就可以得到进行国内建设的时间和机会，这被看作是最稳妥的最终获得民族独立的道路。当然，在当时，一些精明的非官方的日本外交人员也提出了这种观点，他们装作是中国的的朋友，而实际上希望推动他们自己的目标。尽管有这一切，日本在所谓的沈阳事件之前和之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一系列的蚕食和入侵活动终于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真正意图。

因此，在中国，即使是那些曾经提倡妥协的人现在也已醒悟。这种醒悟加上民族主义就促成了当前统一战线的重建。蒋介石总司令，他被选为孙中山的继任者领导国民党，最近告诉《巴



黎晚报》驻汉口的记者，各政治派别之间对日政策的分歧已经消除。在孙中山倡议的原则指导下，他说，国民政府期望与所有政治派别合作，以与共同的敌人作战。在6月12日与新闻记者的另一次谈话中，蒋总司令说：“日本认为我们的斗争能力会随着每一天的过去而减弱，但实际情况却相反，我们的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全中国人民，包括那些以前对国民党的政策不满的人，今天都加入了武装抵抗日本及其伪组织的行列。”确实，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由于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社党提出了团结一致的保证，而变得更广泛也更强大。有各政党和政治团体的代表与会的国民参政会于7月初开幕，具体证实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一致。

此外，中国民众的情绪也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坚定。1925—1927年间的大革命——反对北方各省军阀的斗争——并没有实际触及中国的东北和西北；而现在全中国都受到了不可抵挡的民族主义精神的激励。日本占领区人民的态度是中国统一的最好的证据。在百姓中组织起来的中国的游击队正日益活跃在被占城市的近郊。目前日本人控制下的铁路，从沈阳到太原，从张家口到南京，从南京到汉口，多次被中国游击队切断和破坏。在战争一周年纪念日的前夜，中国八路军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在山西和河北发起了反攻，在一些地方，他们歼灭了日本驻军。在华北日军战线后面，仅在冀中和冀南，就有不少于30万游击队战士。八路军与其他中国军队合作，在游击队的协助下，收复了河北北部和东部、察哈尔南部以及山西全省的很多县。在这三省交界和河南、山西、河北交界处，已经稳固地建立了配有自卫队的新的地方政府，这些地方政府代表真正的人民利益，并与汉口和重庆的中央政府有明确关系。不久以后，在山东、江苏和浙江的所谓的占领区中，也将产生类似的新的地方政府，组织和武装民众，共同与



外国侵略者以及作为它们经济基础的某种地制改革作斗争。

驻中国的美国圣经会干事卡尔顿·莱赛博士，在进行了一次从秦皇岛到包头，从北平到济南，穿越华北的长途旅行后，于6月回到上海时报告说：“日本军队对这块广阔区域的控制没有超出他们哨兵刺刀的闪光之外。”美国医生沃尔特·H·贾德和加拿大医生罗伯特·麦克卢尔都是上个月从中国回国，都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哈勒特·艾本，《纽约时报》记者，在一次华北旅行后也对此加以证实。尽管在日本人的严密控制下，上海的中国人还是对伪政权表达了极为愤恨的感情，伪政权的官员经常遭到暗杀。事实上，日本人没有找到任何有名望的中国人加入他们扶植的任何一个伪政权。

甚至日文报纸，《上海日本》，也于6月12日写到，中国青年在全城散发传单，号召人民到汉口参加保卫战，上海有很多年轻的中国爱国者响应这一召唤离开了城市。

对于中国军队的训练和战斗力，我决不会低估它们过去的弱点，其中很多至今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但是，由民族主义精神带来的变化无疑是明显的。正是由于日本军事家对中国军事力量保守的和有偏见的估计，使他们无法实现他们的打算。日本战斗部队用了3个月的时间才使中国军队撤离上海，而在北方，日军著名的坂垣师团的一个旅团在平型关附近几乎被八路军全部歼灭。根据叶剑英将军的详细报告，八路军和日军作战的头10个月的结果是，日军伤亡共34000余人，八路军伤亡20000人。这10个月中，八路军共俘虏日军士兵和军官21094人，缴获6487支步枪，219挺机枪，37门炮和1786匹马；还摧毁了19台机车、20列火车、22架飞机和1324辆军用卡车。

然而，直到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消灭了日军两个精锐师之后，日军最高统帅部才开始感到他们大概打错了算盘。当然，到此



时，他们肯定意识到了中国士兵不再是40年前上一次中日战争时他们所见到的雇佣兵，中国军官也不是33年前日俄战争中死气沉沉的沙皇军官。有人可能会认为，中国军队仍然缺乏真正的集体精神，不能很好地协同一致。事实正相反，冯玉祥将军在他5月2日向国民党中央所作的报告结束时概括说：“这次战争中有许多军事行动甚至得到了我们的敌人的尊重，很多情况下，整营、整团甚至整整一个师，为了让其他部队更好地进攻或撤退而牺牲自己，坚守阵地，打到最后一个人。我们的战士正在用他们的热血书写中国的历史。”即使中国军队的协作还不够精确，这种精确性也将从经验中获得，因为实际战斗会使人们懂得团结和协作精神的必要性。在有才干的总司令领导之下，中国军队正在迅速进步。

很多一直注意分析日军从去年7月入侵以来的军事成败的外国军事观察家表达了下面的看法，如《纽约时报》所载：“假定美、英、法、德军队都相当于25岁的成年人，中国军队就其目前的训练和装备看，只相当于一个10岁的孩子，而日本军队相当于一个21岁的青年，但其表现却只等同于14岁的孩子。”仅由于日本军队中普遍的士气低落和中国军队中的士气高涨就可以肯定这一点。现在，中国保卫者和日本侵略者在长江中游激战的同时，八路军和其他中国军队在中国北部和东北发起了反攻。在东北和朝鲜边境有约1万名朝鲜农民最近在中国游击队的友好支持下武装组织起来，显然，中国人的士气鼓舞了朝鲜人。

关于中国的资金问题，上海汇兑市场最近的暴跌不能解释为中国没有能力支持战争。正是外国的治外法权阻止了中国政府实施外汇控制，因而，资金抽逃只能通过冻结银行账户的方法来对付，如同一年前所作的那样。当这一作法还不足以应付局面时，中国政府决定使货币贬值以减轻其冲击。压迫中国汇兑的另一因



素是受日本人唆使的伪政权引进日元造成的对峙。由于上海是世界上惟一个日元“黑市”广泛存在的地方，正是日元使中国元贬值，降低到“受控制的”日元内在价值水平之下。这一内在价值实质上远低于由日本货币控制措施所维持的人造行情。库尔特·布鲁西博士，一位货币专家，最近到过中国，在6月29日的《远东观察》上写到：“不要期待远东的战争会持续长时间而不造成交战国货币的剧烈贬值。”即使如此，中国元的汇率在8月份还是提高了6%。

事实是，自1937年7月以来，中国银行发行的纸币没有很大增加，而已有的任何增加从比例看都远低于日本。4月份中国银行发行纸币总额为169380万元，与1937年6月底的发行总额比，只增加了28660万元。同时期在不同省市实际发行的辅币尚不到中央政府批准发行额的一半。显然，中国没有通货膨胀的危险，按照现时的货币局势，不难维持稳定的汇率。此外，中国在海外的硬通货储备达到11500万美元，目前中国每月固定的军事开支在400万国币左右。中国进行长期战争的财力与日本相比极为有利。人们应该牢记，在本财政年度，东京政府的赤字将高达60亿日元，而日本的工业投资最低额必须有20亿日元，否则日本的工业就会垮掉。然而，按照下一年度的正式预算，日本军队需要在目前的6.54亿日元基础上再增加至少20亿日元。海军甚至在谈论要加强海军力量以抵消英美势力。日本在中国作战需要的资金要靠追加预算来满足，到目前为止，已有48.5亿日元用在了大陆的军事冒险上。

一些人一直焦虑地关注着中国西南部的军事领袖们为了实现个人目的而脱离中央的可能性。他们用不着担心。发生于去年2月的使人误解的所谓的“余汉谋将军和吴铁城将军之间的不和”，或许是日本挑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诡计最后的一次枉费心机





的努力。广州来信讲述了曾经是广东省著名土匪头目，现已退休的李福林将军如何拒绝了日本人提供军火以帮助他在该市组织一次暴动；随后他又是如何佯装接受了日本人的说服，如何由于这个前土匪头领的爱国主义，这全部阴谋被揭露，日本军火也落入中国人手里。《伦敦经济学家》记者是这样描述这次日本人搞的政变尝试的：

“在广州发动一次军事政变的阴谋流产了，它花费了日本人相当大的一笔钱，据说达200万日元。某些著名的中国人让日本人觉得他们同意参加政变，但同时又把这一阴谋通知了广州政府。这样一来，政府有了准备，骚乱迹象一出现，就宣布了戒严，并逮捕了数百名上当的日本间谍。同时，日本破坏者进入广州河的企图也被与底格里斯河要塞类似的方式阻止，这条河被一条水栅截断了。”

这说明时代已经变了，帝国主义阴谋家们在中国肯定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

一个既成事实是，所有西南省份，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和四川，派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师到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参加战斗。甚至亲日的安福系一些重要的有影响力的成员也拒绝加入伪政权。如李思浩、吴广新（译音）、章士钊和曾毓隽这样的著名的安福系政治家，一届又一届旧北京政府的前部长，都来到汉口以保证他们对国民政府的忠诚。他们断然宣布他们从未与日本人或伪政府当局商谈过在北平或南京组织伪政权。不久以前，通过日本新闻界传播开一种谣言，说四川军界领导对中央政府不忠，然而，这一谣言被一个在现场的美国报纸撰稿人、《芝加哥每日新闻》的A.T. 斯蒂尔揭破，他从重庆报道说，尽管这些领导人与汉口政府当局之间存在过某些不和：“今天中央政府的政令得到省当局绝对的和愉快的服从。事实上，由于人民的民族主义情



绪，领导者们不敢有别的作法。”

看起来，在所有可以想到的方面，政治、军事、财政和行政等等，都没有任何怀疑，中国继续生存的前景极为良好。甚至一个著名的日本驻广东军队的代表，一个日本激进派政治家，现任作战部长坂垣，也没有低估形势。6月25日他在东京说，“战争将长期持续”，“日本必须准备至少打10年仗”。战争或许持续10年或许无法预测，但可以肯定只要日本军队还在中国领土上，中国人民就除了继续抵抗之外无可选择。今天，中国人民正一心一意为民族和民主而战斗。他们必将胜利，因为在历史上进步因素总是会赢得最后胜利的。

（原载《美亚》第2卷第8期 1938年10月

史建云 徐秀丽译）



## 古国的新生

战争不止是战争，就像风不止是风一样。风的作用依靠它的速度、方向，而首先依靠的是大气层状况和季节。一场风不一定是暴风，但秋风总是一种带破坏性的力量，它使花瓣和花枝分开，从落叶树上卷走树叶。春天的风完全不同，它轻轻搅动空气，唤醒天地万物。与狂风不同，春风是生命的源泉，无论怎样猛烈持久，它的作用总是温和的，具有使大地复苏的力量。战争不止是战争，它的强烈程度和持续时间也是多变的。战争的特征和性质有着本质的不同。根据人类的一般历史进程看，从毫无个人意识的奴隶社会到充满冲突的自由放任社会，再到一个和平的世界大同的社会，既存在着推动人类进步的战争，也存在着阻碍进步的战争。

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一场进步的战争，战争是痛苦的，但中国人，更确切地说，中国各民族人民反抗外国殖民统治的决心却是坚定不移的。健全的民族主义是真正的国际主义的奠基石，在中国准备好再度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之前，中国人民——全人类的 1/5——必须获得民族独立的权利并维护这一权利。



在过去几年中，一种杰出的理论得到了阐述，这种理论源于国际共同安全的前提，即，和平是不可分的。“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国际关系，以及《慕尼黑条约》之后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提供了充分证据。远东的这场战争，本质上是由中国人民不自觉地进行的一场民族革命战争，它代表着一个新的重要历史时期。这场战争证明它与任何卫国战争的性质同样，是一场积极的战争。过去两年半里中国发生的事件以一种最有说服力的方式表明，民族主义和民主，全国抗战和重建，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二者就像同一辆车上的两个轮子，同时向前滚动。进步存在着同样的不可分性。在为进步而奋斗的最高努力中，一个国家对内和对外的斗争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这里可以简略描绘一下自孔夫子时代到武装反抗企图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的外国势力的时代，2500年来中国社会生活中一些显著和突出的特点。首先，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个人的和私有的土地所有权，社会生活以家族和家庭组织为基础，这种组织以家长式统治和妇女处于从属地位为其外部标识。其次，存在着一种对官场的过分尊敬，并且，由科举考试制度促进了一种对文学成就的过分重视。第三，很多世纪以来，中国除了手工业外没有工业生产，广泛存在的高利贷和无理性的商业贸易只会导致消极态度的蔓延。士兵是纯粹的雇佣军。中庸和顺从被看作是明智和美德。

但是，当前的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它将使中国人民得到独立、自主和自由。它将把人民从国内和国外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在一场自卫战争中，直接参加战争的人们得到了特别的尊重。对战士的态度以及由此而来的战士的地位，正在经历着明显的变化。进行爱国演出的演员、志愿在军队中服役的妇女、在空军和现代交通事业中工作的技术工人，以及其他许多做实际工



作的人们，都获得了社会声望。

战前的学生运动、战争期间有了很大发展的青年运动、工人和战争难民的迁徙，再加上最重要的军队征兵和部队移动，这一切合在一起，加速了家族制度的解体，甚至于使家庭关系变得薄弱。平等的两性关系正在逐渐建立。家长式统治的基础已经动摇。在战区，特别是在进行游击战的地区，很多县政府官员和更多的村级行政人员在岩洞、茅屋、航行的船只、漂流着的木筏以及各种各样的运载工具上办公。这些官员必不可免地与百姓更接近，老百姓现在可以见到他们，并向他们诉说疾苦。人民变得更大胆，更少害怕官场作风，在这些地区，中国官场的神话再也不能迷惑奴役那些未受过教育的农民。事实上，这样一种神话即使在一个最起码的民主政体中也是没有地位的。

在当代，已经多次显示出，民族主义和民主这一对兄弟的出生必定要经受痛苦。民族主义意味着人民要维护他们最优秀的文化，要维护使人民自身得到进步的自由，民主则意味着共同的义务和权利。为了民族独立，必须有一个稳固的共同防卫体系，共同防卫也需要共同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民族主义和民主成为双胞胎，这也就是为什么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和民主水火不相容。但是，要挣脱殖民统治，尤其是在一个大殖民者们正在疯狂争斗要重新瓜分世界的时代，人民必然要经受苦难。中国当前的战争可以说是一场消耗战。

中国农民就其整体来说，即使在战前也是生活在一个最低的生存线上。虫灾和瘟疫、洪水和饥馑、还有充满破坏性的盗匪活动和国内战争，困扰着已经身负沉重负担的辛苦的农民。这场战争给这些人带来的是真正可怕的、骇人听闻的苦难。在敌军驻扎的地区，农民几乎无法恢复耕作，在这类地区附近，他们不能在白天耕作，迫不得已只好在夜间种一些豆类、马铃薯或其他不需



要太多劳动的庄稼。敌军士兵经常三五成群闯入农民的住房，拖走他们的家畜和耕畜，抢走他们的蚊帐，强奸农村妇女。农民藏起了他们的骡子、母牛和水牛，他们在收获之前，甚至在谷子已经上了打谷场时，放弃他们的粮食。

农民被迫逃离他们的村庄，放弃他们的劳动成果，丢下他们的房屋和家具，这些东西通常不能逃脱被敌军烧毁的命运。在很多地方，大规模的屠杀甚至发生在走不动路的老人和小孩身上。尸体被扔到本该是用来维持生命的水井中。粮食和厨房用具成堆地扔进粪坑。河边和饱受蹂躏的原野上，被舍弃的村庄讲述着数百万农民的遭遇，这些农民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小片土地，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土地带来沉重的地租负担，却是他们惟一的维生手段。

日军刚刚从九龙英租界北部边沿地区的村庄撤离，1940年3月4日，香港中国通讯社报道了那个几乎完全没有发生战斗的地区所受的破坏。距新界边界仅1000码有一个名叫黄柏岭（译音）的小村庄，一度被日军占领。估计这里的损失超过了25万元国币，全部房屋的2/3被烧毁，其余1/3全部的财产和粮食被抢走。在被占领之前，村里有将近1000头母牛和水牛，现在只找到4头。一半以上的犁、锄、水车和其他农具也被拿走。

在战区，耕畜的价格，特别是北方的骡子和南方的水牛，在过去3年中提高了2—3倍。在一些地方甚至用人力代替畜力拉犁。由于军事征调和前方的紧急需求，后方的边远地区也受到了严重影响。举酒泉县为例，酒泉以前称为肃州，位于甘肃省西北部的西北角。6年以前，那里有7360匹马和骡子，但各种不幸事件和不断的军需征购使这一数字下降到不足1440匹。在人口更为密集的地区，例如陕西省的中部、河南省的西部、四川省的东部与北部、湖南和广西，还有其他一些沿海省份，军事需求不



仅占用了畜力，而且夺走了农村中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供给。

毫无疑问，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战争阻碍了生产，破坏了大量生产资料，给人民造成直接和间接的巨大损失。间接损失的一种形式是农村市场的紊乱和收缩。事实上，海港的封锁和丧失不会像对一个彻底现代化的、极为灵敏而精密的社会结构所能做到的那样对全部的中国经济造成破坏。但是战争毕竟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由于军事防卫的需要，新建的公路不得被切断，在某些情况下被破坏。农产品市场因而变得更为地方化、更狭隘，甚至陷于停顿。在四川省，过去两年中稻米和油桐籽的大丰收只不过引起了地方市场价格的急剧下降。

陕西北部输出品价格的普遍下降或许是一个典型事例。自从战争以来，当地棉花的价格下降了约 10%，粗羊毛下降了 37%，精毛下降了 72%。然而，农家日用的制造品价格却全部上升了 200—300%。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种价格剪刀差运动会给农民带来怎样的不可避免的影响。当然，由于传统的商业和高利贷的共同作用，这种现象在战前已经存在；但在很多地方，它们是被军事形势加重的。

约一年以前，日本人就提出了“以战养战”的口号。这意味着他们通过反复的大规模的“扫荡”来巩固占领区，以便建立一个坚固的经济和政治基础，维持日本在华部队。稍加注意就可以知道，这一政策的某些方面无疑显示出了即使在暂时的殖民统治下也必然要经受的苦难。

首先是日本人的货币剥削。1939年2月11日日本为北平伪政权建立的银行，以 1.5 亿元的储备金建立。关于这笔巨款，华北的 4 家中国银行认捐 5000 万元，或者说是全部的 1/3。然而，现在这家伪银行的流通货币接近 3 亿元。这些无担保的纸币部分用于维持伪政权，部分用于购买原料，但主要的是用于兑换中国



的法币。去年上半年，仅从河北的中部和南部，日本人就净赚入约 365400 元中国货币。此外，日本人还在河北省建立了一家省银行，并为这家银行发行了总数 1000 万元不兑现的纸币。

尽管在华中，伪银行华新银行只发行了 200 万元左右纸币，日本人伪造的 4 家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货币却超过了 1000 万元。华中的日本军用券，一种没有任何储备，专门用来掠夺人民的纸币，面值超过了 2000 万元。由于日元通货膨胀，约 3500 万元日本货币流入长江三角洲，以榨取廉价原料。除所有这一切以外，日本土兵还强迫中国人接受别处不再接受的破损纸币，以及停止流通的其他国家的纸币，如卢布之类。

其次是残酷的税收剥削。日本在中国东北四省建立的伪政权的岁入，在最初 5 年中，迅速从 9600 万元增长到了 15300 万元。来自鸦片税和盐务税这两个项目的收入从 400 万元增加到了 4400 万元。日本政策的目的在于按比例分配不同的税收，据说海关收入将归日本军方，统税归日本特务组织，盐务税归北平和南京的伪政权。日本人控制下的海关税收，加上上海海关税收的 90% 以上，每年总共在 100 万元到 200 万元之间，都送到日本并存入横滨正金银行。

冀鲁平原和长江三角洲都在逐渐变成大批日本商品的倾销地，其间日本人完全不顾中国人的生活，既榨取原料又控制商品。去年，上海、南京和杭州之间的三角地带所产原棉几乎全部被日本的托拉斯收购。当时上海的市场价格是每担棉花 150 元，有时高达 160 元，而日本人规定的收购价每担不到 60 元。如此廉价掠夺的中国棉花除供给青岛和天津的日资纱厂外，还供给由日本人控制的大上海纺织厂的 160 多万枚纱锭和 16000 多台织机。还有一部分运往日本。





在上述长江三角洲地区，日本丝茧业托拉斯有 800 万日元资本，但其中 1/3 是没收的中国缫丝厂。53 家现代丝厂，共 10948 台缫丝机，全部被日本人占据。此外，日本托拉斯还以专断的固定价格垄断了蚕种的销售和蚕茧的收购。

日本人还通过一种特别许可证和运输执照制度控制了稻米和小麦的收购。另外，他们还通过伪政权征收一种复杂的过境税，以便优惠日本商人并留难中国商人。在很多情形下，日本士兵抢走农民家庭储藏的谷物是为了在市场上卖掉。估计在这一三角洲地区，1939 年共有 300 到 400 万袋谷物被运到日本。

但是，伴随着新的苦难，一种新的精神正在诞生。土地关系方面的一些变化表现出与战前极为不同的趋势。在战争期间，由于国家和地方对制造品的迫切需求，一直受现代工业和银行资本的压迫徘徊不前的中国手工业看来走上了复苏的道路。在战前，尽管中国已存在合作运动，但几乎只限于提供信贷和借款，而现在，正在组织起更多的以生产为基础的合作社。这种新的合作方式通常是手工业与半机械化的联合。中国工合运动始创于 1928 年下半年，在当前，约 1400 个合作社每个月共生产 400 万元的产品。

陕西、四川和甘肃省的羊毛以前完全是输出品，但现在，中国工合组织在一个令人吃惊的短时期内，就安装了简单机器，并培训了数千工人，用原毛生产出了士兵用的毛毯。在我写这些话的时候，已经生产了 50 万条毛毯，重庆传来的消息说，中国工业合作社又得到了一笔订货，要在 1941 年 1 月以前再生产出 150 万条毛毯。从长远观点看，很难设想任何大规模的工业，如纺织业，能够以合作为基础生存下去，并经受住必将来临的不可避免的竞争，但大批量的战时订货和合作社对工人的训练，对于为新的民族工业铺平道路有很大的帮助。此外，工业合作形式仍



有其伟大的历史使命有待完成，这就是，使生产力水平从单纯的手工业提高到使用机器的工场，并组织 and 扩大目前正处于沉寂状态的地方市场。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中访问了中国西部和西北部的一些省份，他对工业合作表现了极大热情。按照他的观点，这一运动得以成功的最大希望在于那些一直由个人家庭生产的农具和消费品的制造。这是一种稳妥的、正确的意见。通过以合作方式组织起来的专业的机器工场，中国原始的农田工具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改良。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但是在未来很长时期内，既不会有中国的重工业也不会有国外进口来满足这一需求。

在内地，廉价的水力资源不仅可以用来供应机器工厂，而且可以用于生产诸如饼干之类的食品。营养丰富的饼干有很大需求，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原因是很多人必须在白天离开他们居住的城市或村庄以躲避空袭，他们不可能把炊事用具随身带到防空洞或山上去。当然，他们会很愿意用饼干代替现在常用的冷饭之类食物。一旦合作社取代了分散的个体的家庭生产，并在更为节约的基础上生产出了质量更好得多的同类产品，这就标志着社会的真正进步。当前的战争已经给这种进步带来了原动力。

战争状况也引起了初步的农业集体经营。到处都可以看到集体的农业劳动代替了家庭耕作。目前中国有三种集体经营形式。一种形式是无地者在新开垦的公共土地上共同耕作。其次是有些地方集体工作是由那些有自己的土地要照料的农民进行——这些农民一起在已开垦的公共土地上工作。第三种形式的集体耕作，是按照行政命令在那些因入伍而不在村里的农民私有的土地上机动进行。

江西泰和县四方（译音）垦殖场的情况充分阐释了前述第一



种方式。那里采取的工作方式在中国是全新的。所有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都被组织起来，每月开一次全体大会，每周开一次代表会。这两种会议负责控制和实施指导经营的各个方面的政策。土地、肥料、农具和其他日常用具由管理委员会赊贷给农民，这里的土地所有权属集体所有，以后也还会如此。在最初的8年中，农田工作要大家一起合作，那以后，耕作者将分为小组，每一组至少管理50亩地。在中国北部和西北的某些地区，战争难民、无土地的农民和其他失业者在政府的协助下组成了垦殖团体，这些团体也是通过集体制度在土地上工作的。

过去两年中，在广西省的桂林和柳州都组织了土地开垦。参加这一工作的每个家庭得到30亩土地供其耕作，并免税6年。但是，每个受益家庭必须耕种3亩公共土地，收益用于为社区的共同利益提供资金。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合作农业。在浙江南部的5个县出现的新制度“保田”，也属于这一范畴。“保”是一个行政名称，包括100或更多个家庭，“田”的意思是土地。它的字面意思是那块土地是同一保的百户人家的共同财产。

战争创造了保田。在各地一份保田在30亩到40亩之间，来自于寺田、儒学的学田，或是一场官司和解后捐献的土地。这块土地属于全保，并由该保所有家庭耕种。通常，为了使它连成片，要把它各个部分与私人土地交换。公共土地在中国不是新东西，但它总是出租给个体佃农家庭去耕种和收租。保田是由当地所有家庭共同耕种的公共土地，因而在中国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无论是在西北的后方地区，还是在从河北到湖南，从江苏到广东的前方的战争区域，农业合作的第三种形式到处出现。在陕北及其邻近地区，一年以前的春天，掀起了一场大生产运动，包括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各类学校的学生和执行警卫任务的部队



在内的 50 余万人，开垦了大片土地，播下了种子，并帮助农业劳动力不足的战士家庭耕种。他们的政策是让所有身体健康的人都以某种方式直接接触农业生产，尽管程度和范围有所不同。这场运动中所用的肥料、工具和耕畜部分由地方财政提供，部分来自私人。

在晋绥、苏皖、粤赣这样的战斗区域，集体进行农业劳动，特别是收割工作，成为极为普遍的作法。江西西部新喻<sup>①</sup>的情形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典型。该县位于湘赣公路边，由罗兆寅（译音）司令指挥的军队驻扎。去年 7 月，在火热的阳光下，新喻组织了一次为士兵家属收割水稻的活动。一清早，妇女们就动员起来为那些当天要下地劳动的人们煮饭，整整一天，93 名驻军战士和 29 名妇女服务团的成员帮 44 户有人在前线作战的家庭干了活儿。他们收割了 135 亩地，并打了 126 担稻谷。另一组 50 名驻军战士帮助贫苦农民工作，4 天时间内他们收割了 395 亩水稻，打了 457 担谷。工兵部队的战士们效率更高，他们在 3 天中收割了 476 亩地，打了 975 担谷。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家属也加入了这一农田工作。集体收获成为政府、战士和农民之间一种非常直接的凝聚力。

战争期间土地开垦一直在进行，政府在这方面的新法规展现出了一种进步政策。民国政府向四川、甘肃、陕西、湖南、福建和广西派出了几组农业专家，调查土地开垦的可行方案，现在还没有详细的报告，但据估计可开垦的良田有数百万亩。因而至少有 50 万人可以就业。有 500 万元资本投入的华西土地垦殖公司已经开始开垦云南东南部的 10 万亩土地。在四川西南端的 4 个县至少有 100 万亩土地可以很快投入耕作，康辰（译音）垦殖协

<sup>①</sup> 今江西新余市。——编者注



会打算在这里进行经营。在陕西、江西、广西、福建和广东这样的省份，还有其他一些资本较少、规模较小的土地垦殖组织。尽管这些组织进展都相当慢，并且它们并不都有成体系的计划，但它们确实为正在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吸引力的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初步的尝试。

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10月15日，政府公布了“非常时期难民垦殖条例”。这一条例的第21条规定，如果开垦的是公共土地，开垦者本人在完成开垦工作后将拥有土地。私有土地要求由土地所有者开垦，但如果在指定的期限内没有这样做，政府的垦殖局将按照条例第18条规定的3种方法之一处理这些土地。

下面就是3种可选择的方法。第一种，强迫土地所有者把土地出租给开垦土地的人，在头3年到5年内免除地租，那以后年租金不得超过全部收获物价值的15%。第二种方法是迫使土地所有者把土地出售给开垦者，要求出售在土地所有者和开垦者之间直接进行，地价要分期付款，至少要10年，付款要在收获之后，地价依当地最低价格确定。最后一种方法是征收土地，以一个最低价格作补偿，地价可以用政府公债给付。这笔地价最终由开垦者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在至少10年时间内付给政府。在法律程序结束之前，土地就可以分配给直接经营的开垦者。

尽管这些法规本身不能阻止地权集中，也不能充分保证土地开垦人的权益，它们还是代表了政府的真正的改革措施。这一现行法律明确为垦荒者在土地上工作提供了直接的可能性，给了他们租佃或拥有土地的权力，使这些无土地的农民能够较容易地重新开始农业生产。

战争期间中国最明显的地权变化发生在进行游击战的地区，那里的地方政权已经由于战争形势的需要和随之而来的全民动员而发生了质的变化。行政上的高效率和严格的经济制度取代了作



风奢侈而又麻木不仁的官僚机构，因而税收在数量和税率两方面都得到了削减，赋税负担的下降促进了地租降低。在很多地方，现在货币地租降到了低于主要作物产值的 1/5；实物地租，不论是分成制还是定额制，都降到了 25%。在南京附近的靖江和丹阳两县，以前一个出租 25 亩土地的地主要收 50 担租谷，现在他只收 35 担，削减了 30%。高利贷也受到了抑制，借现金的人必须归还现金，借实物的人要归还实物，以前那种放出实物，然后收回现金，或者稍微少见的与之完全相反的作法，现在都受到了禁止。

发生这一切变化的原因并不是不明确的。军队不再受地主的控制和指挥，在抵抗一个共同敌人的战争期间，地主不可能与农民隔离。此外，地主很难从他们所在地区之外的任何军事力量那里得到支持和帮助。因而，在战争环境中，特别是在一场共同防卫的战争中，在为民族利益而战中，地主武装变成了全社会的武装力量。新型的农民组织，或者新的农会也涌现出来。这些组织拒绝接纳地主和流氓为其成员，大部分成员是中农和贫农。凡是农会比较强大的地方，地主都不能强迫佃农退佃，减租的问题通常也较容易协商解决。

农会基本的和主要的任务，如同在敌人战线后方的大部分游击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是协助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并围绕彼此孤立的日军占领区实行经济封锁。由于战争环境的需要，劳动人民和地方政治与行政结构必然会日益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人民和政府机构之间存在这种紧密关系的任何地方，都出现了抵抗日军“扫荡”的攻不破的堡垒。这就是为什么在山东省的 108 个县中，只有四五个县，真正的中国政权还没有得到恢复。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山西省的 105 个县中，只有敌人最早占领的天镇、阳高、山阴和大同等县仍然由伪政府统治。



在山西省的东北、西北和东南，以“农民救国同盟会”为名称的农会组织得特别好，现在其成员总数达到了150万。去年夏天，燕京大学一位英国教师穿过河北省和山西省东北部，到达了陕西省中部。他对于他两次穿越日军战线的长途旅行所得的印象，用他自己的话概括说：“人民紧密团结、有教养、有责任感、精神振奋，并且受到了他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好的治理。政府隐藏在广阔的山区，地方行政官员住在小村庄中。这些官员与人民生活在一起。地方官员每月有14元津贴，他们必须从中付饭费。他们为普通百姓的利益专心一致地一连工作几个小时。在税收、教育、管理、村庄组织、经济生活、工业发展等方面以一种大胆而又实际的精神开始了改革。人民作出了响应，因为知道他们决不能向可恨的日本人屈服，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良好的信任关系。”

在山西省和河北省的大部分地区，村长现在由村民们自己选举。不必写选票，不识字但却十分聪明的农民们投票时，或是在纸上候选人名字下面烧洞，或是在候选人名字后面的一个土堆上插上一节草棍，或是直接把他或她的选择告诉在一间秘密房间中的选举工作者。选举工作者在村民全体大会上宣布预定的候选人名单，为了进行选举，每15个选民组成一个小组。这是中国民主的真正开端，民族主义和当前的民族自卫战争促进了它的诞生。

40年以前，明恩溥，一位当时已经在中国呆了30年的美国传教士，发表了他的著名著作《中国乡村生活》。他说：“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很快了解在像‘为了公益’这样的短语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类观念，他从未听说过这类事情，更糟糕的是也从来不想听到它。”但是，自1937年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迅速成长，不久以后，明恩溥的这一论断必将被修正。明恩溥本人



预见到了这一点，当他结束这一章时（第43页）他评论说：“改革必将来临，它必须从内部进行，但是推动力只能来自外部。”就这样，一个新的灵魂终于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诞生了。

（原载《天下月刊》第10卷第4期 1940年4月

史建云 徐秀丽译）





## 如何走上工业化的正轨

差不多 100 年以前，中国极少数的开明人士在主观上早就要求把中国引上工业化的途径，前有李鸿章、左宗棠，后有张之洞、张季直，他们所创立的一些企业，和日本的好些企业是同时的。然而我们的这些企业早已烟消云散地被毁灭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外国货品来路的迟缓，沪津青岛一带的棉纺织工业得到了暂时的繁荣。然而在战后国际新局面中外来的压力便是变本加厉，关税的不自主依然存在，中日的关税协定更窒息了中国新兴的纺织工业。

抗战以来敌人在沦陷区继续不断搜刮粮食和原料，东北四省早已变为敌人军需制造和征取劳役的场所。最近在山西灌北等地通过汉奸的伪组织敌军按时派粮，挨户征收，太原北平各乡被夺去的小麦便有 20 余万担，粮价因此飞涨，工业成本日高，流动资金周转愈加不灵，一切企业是毫无希望的。去年 8 月以后敌伪在上海一市所搜刮的纱布已公布的有 60 余万件，实际上达 100 万件，共值 400 万万元，继之更有其他原料的登记，准备将来被没收的。按东京第 81 届敌议会中议决，这些工业的原料 65% 要供给日本的军需，还有 25% 光景要供给日本在中国所开的工厂。



至于中国南部浙闽粤沿海各地敌人搜刮粮食和走私的地方不一而足。芦苞、沙坪、东兴等据点，都是敌伪套取工矿原料的著名场所。原来敌人以殖民地看待沦陷区而加强殖民地化的一切设施，伪组织的傀儡们更是甘心出卖民族利益而俯首贴耳为其主宰执行政策，殖民地根本就谈不上工业化。

旧时官僚资本和衙署式的工业生产早已塌台了。自今尚未收复的沦陷区更是谈不上工业化，抗战中后方各省的工业又是怎样呢？

在抗战初年，后方各省的工业颇有蓬勃发展的气象，尤以国营的钢铁和煤矿业好像最有希望。好些手工业一时也有复活的倾向，然而直到现在整个讲来还比不上抗战以前的水准。以前连英美及日本的纱厂在内，吾国境内的纱锭已达 500 万光景，而现在后方开工的纱锭还不到 20 万。以前吾国的织机有 25000 台，目前只是 6000 台罢了。这种情形就还比不上拥有 18 万台织机和 960 万纱锭的印度。钢铁的生产在印度有知名的塔塔公司和其他的冶铁工厂，从事钢铁生产的工作人员达 3 万人。资本总额在战前就有 2400 万镑。印度钢铁生产量在英帝国中仅次于英国本土。反观我国钢铁煤各业的进步颇成问题，低微的煤矿产量每年所能增加的不到 1/10，去年生铁产量不过占生产力 44%，钢的产量仅代表生产力 22%，目前因敷设铁道的计划或能挽救钢铁业市场的萎缩。但财政上是否允许此项计划的实现，尚难逆料。据说后方各省的所设重工业，7/10 是集中在重庆及其附近各地。而渝市及附近的机器厂 366 家中倒闭或陷于停顿状态者当在半数以上。衡柳新兴工业地带也有同样现象，即以能勉强维持的各机器厂而言，亦有变卖工作母机者，可见所谓工业化也者，在中国尚未走上正轨，而其前途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平坦。

工业界的呼声虽高，而工业界的困难重重，衡阳、桂林、柳



州、重庆各种厂家相继停业的日有所闻。综观当前工业生产的困难，并非一业或数业所独有，确系一种普遍的现象。各业所遭遇的困难，颇多类似。约而言之，不外乎资金原料价格和市场四方面。据《大公报》桂林版12月5日所载重庆11月27日航讯所论工业界目前的危机也无非如此：（一）“资金之不足为物价不断上涨所形成，盖流动资金须随生产之周转而逐次增加，而民营工厂所得政府之工贷又为数极少，遂致各业资金，咸感不足，不得不仰赖于高利贷款。惟高利贷款仅能救急一时，且使生产费用增加，厂家负担加重。其后果反使资金不足之困难更为严重。故目前应设法先解除此项困难，生产事业方能稳定。增加民营厂家之工贷或以其他方法宽筹产业资金，固属救济之道，然根本上还在物价及币值之稳定，否则徒造成政府之救济膨胀而已。”（二）“原料之缺乏，则由于运输困难，及原料统制所造成，如棉花及酒精原料等是。此种情形若不设法改善，则原料之生产日减，各业之生产势将停顿。”（三）“统制价格常按生产成本而随时改订，致售价反而赶不上成本。政府所购之物资，则更因其预算早经确定，难于经常改订价格，厂家大吃其亏，有时难于继续持生产。”（四）“钢铁业及机器业之维持困难为产品滞销。厂家愿望政府予以救助，收购产品，用为战时之国家交通建设。”以上四种说法，当然是就工业而论工业的困难，故上列种种困难并非工业化基本的桎梏，而不过是反映这种桎梏的存在罢了。

按历史的观点讲，工业化有它一定的程序，决不能违背基本演变的原则。因此可以说工业化决不是一种主观的愿望，而必须具备一定的背景，要达到工业化的目的，不能不创造一个相当顺利的环境。

就工业而论工业的困难，不免过于狭窄，甚至带单纯主观的毛病，固然工业化能给予生产者一种生活和工作的训练，因此而



转变许多社会关系和意识。同时工业化也必须要要有工业化的条件，无适当的社会条件便谈不上工业化。目前中国工业生产最严重的困难，工业本身所遭遇的种种阻碍，工业的所以不能走上正轨，根本是因环境不顺利的缘故。

要走上工业化的正轨，必须要确定工业化的政策，而诚诚恳恳一贯有力地执行之；必须要提倡工业化的教育，培养无数切实负责干练的青年；必须要积极改进工业的原料，尤以农产品为主。

工业化政策决不可一味模仿国外的皮毛，而必须根据国外历史的教训和人家实际的经验，且适应国内各地产业发展的程度而确定。有人以为苏联的国营工业曾经领导民营工业的发展，所以我们也得以建设国营工业为中心，甚至以为不妨漠视民营工业。这个毛病就出于肤浅的模仿。岂知国营工业要有国营工业的客观条件和真正能力，而国营与民营还需要适当的配合。在忘记人家国营工业的所以然，和忘记国营民营应有适当配合的时候，就不免要再蹈衙署经营的覆辙，而竟忽视一切民营工业，以致国营工业的本身站立不住，而民营工业也因此愈加遭殃。结果所谓国营者将变质而为私营，而真正民营者不免有大批倒闭之虞。如此所谓工业化者必然要碰壁，而产业反要走上倒退的途径。

国内讲工业化的人还有一个通病，他们以为专门创立工厂便可达到工业化的目的，而不知工厂工业还需要和各种相关的手工业配合起来，方能向前发展。目前机器工业部分它要靠手工业的木工，而各种工厂中所用的原料大都出于用手工业改制的矿产和农产，这都是很明显的事实。所以某些手工业不能进步，或竟至大批塌台的时候，各种相关的工厂工业，就不免受牵制或感到严重的威胁。整个工业化的政策绝不能忽视历史的继续性，不能忽视工业的社会性，也就不能忽视那些辅助工厂工业的手工业。时



髦的工业家心目中只有机器和工厂，而不明白手工业工具和工场生活也有同时改进的必要。而确定工业政策的人们还一味崇拜工厂和机器的形式，未曾为今日在中国各种工业方式中尚占优势的手工业，打算一下。可以说目前工业化的政策并未十分有系统，且不免有偏重形式的遗憾。

现代工业所需要的技术会计和经理的人才，都要靠一个革新的教育制度，来训练培养和陶育。工业化教育的立场，即是现代文明的根本立场，在乎义务和权利的分明，在乎对一切大小工业有彻底认真的观念，在尊重事实而不贪虚名。这个立场完全和旧时科举功名的教育是相反的。因为旧教育的精神，是过分注重形式，崇拜名位，讲究身份，处处带着宗法思想，而不追究或尊重个人的责任和工作，往往以为形而上的是高尚的，形而下的是低微的。一般在学校的人们求学只凭记忆不重理解，考试则像张天师画符一样背诵一遍。毕业以后只凭资格文凭去混饭吃，平时轻视劳动，好享现成之福，及到不得不动手时还是使唤差役，若遇人批评则大放阿 Q 精神，自以为不惜于贱事，因为事事不求甚解，八股风气愈来愈盛，处处以混而统之说法来回答问题。讲地理则不外乎地大物博诸原因，讲历史只是举英雄豪杰为因素，习博物则熟诵其分类名称而不识日常习见的鱼花鸟矿植等物，习理化则徒强记公式，不能理解日常所见的事物，更不能解决生活中浅显而具体的小小问题。这种反科学的教育精神，即是反工业化，而在目前社会讲来是富于倒退性的。这种教育如果不革新，就没法希望走上真正工业化的坦途，有可用的机器而无可用的人才，近代工业是不会生出来的。有堂皇的厂屋而无善于经理，长于技术会计的人才，工厂组织终究要塌台的。有了科学化的教育与头脑，方才有工业化的环境和工业化的成绩。

西欧和美国工业化的历史指示我们，工业的发达须要拿农业



来配合。一方面食粮和许多的原料是出于农产品，某种农产品的质和量不够的时候，某种工业就因为成本的高昂而不能大踏步地进展。另一方面，工业品的市场大部分要靠从事于农业生产的民众，农业改进，价格便会提高，而一部分的农民虽然曾增加他们的购买力，一般民众的购买力也就是工业化程度高低的牵引。英国的工业是靠海外的农业而兴起的。美国和德国的工业是靠着他们国内的农业而建立起来的。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必然也要靠农业生产的改进。

战时后方各省的农产以四川为丰富，可是在抗战期间四川农事并未增进，这是被一般人所公认的。去年（民国三十二年）6月13日薰时进先生在桂林《大公报》星期论文中对此问题更有一个统计的证明。他依据了遍布全川乡间的几千个农情报告员的报告做出一个历年农产统计表。我们凭着这个有可以得到下列的指数。

#### 四川全省农产量的指数

（以民国二十七年为基数即100）

品 种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玉 米	180	123	147	160
麦	69	56	55	76
稻	108	52	64	68
油菜籽	70	124	75	65
甘 薯	65	59	75	60
棉 花	77	60	22	40
甘 蔗	41	58	34	22

农产如此减产，不但会影响到工业原料问题，且也要威胁民食民生等社会问题。

桂林《大公报》去年6月15日社评中说到陕西棉花产量的



减缩。二十七年的 101 万担，降为三十一年 的 31 万担。而陕西省棉田的面积自二十六年至三十年间已减少了 22% 以上。棉田如此减少当然会影响到中国纺织业的原料问题。纺织业如果不能发展，其他工业是会连带被阻碍的。

从手工业生产占优势的社会转变到机器制造占优势的社会，就是现代工业化的过程。这种历史演变通称为工业化。经济最先进的国家，没有不是已经工业化的。因为不工业化就不能有大量的生产和便宜的享受。在英美是如此，德日也是如此，苏联更是如此。目前只有加拿大、印度和澳大利亚等是半工业化的地方。在伊朗、埃及、西班牙和中国工业化的程度更是幼稚，也可说还没有走上工业化的途径。历史是前进的，中国的社会迟早要工业化的。然而这个程序或短或长，需要一种顺利的环境。除民族独立，政治独立，是我们工业化的大前提以外，农产的改进，教育的革新，尤其是政策的确定，也是中国工业化的三个重要前提。

（原载《中国工业》第 23 期 1944 年 1 月）



## 经济独占与中国内战

中国政府的专营制度近来虽有重大的改变，但与现代国家资本主义仍不能相提并论。在本质上它的商业性超过了工业性，而且集中于军政官僚政客，及地方军阀的手中。他们依赖着国内的政治独裁和外国之支援而生存，压抑中国自由经济的发展。

远在纪元前 10 世纪到 6 世纪之际，中国社会形式与现在大有差别，城市的贵族曾组织维持了一种政府专营制度，其形式是统制若干器具的手工生产。但这种生产品是专供贵族使用的，在乡间居住的平民，一律不准使用。因为生产品是由政府直接分配的，故完全没有营利的现象。

自纪元前 2 世以后，长期的皇朝时代开始，盐铁的产销皆由政府专利。可是这种政府专卖亦本不在营利。其目的在适合国库的需要，因此盐铁的价格并不溢出国库需要之外。

自 16 世纪中叶至现世纪开始时，在对外贸易和现代金融经济不断加深的影晌之下，中国政府专营的制度渐次成为营私牟利的一个来源。这就是官僚控制的发端。当明清两代时，曾有御用纺织厂三家设在南京、苏州及杭州产丝区域，其任务为以丝织品供给政府及宫廷。在明朝时，此类丝厂系由宦官管理，但清朝时





则由宫廷胥役办之。盐的统制和这些工厂的督办都是属于帝国的最肥差缺。

以机器动力构成的中国现代工业亦由政府举办。中国第一艘轮船建造于 1868 年，第一条铁路构筑于 1876 年，第一个棉纱厂建立于 1889 年，广州的兵工厂系于 1887 年设立。汉阳冶铁厂则于 1890 年开工。这些事业全部皆系用国家资本举办并由政府管理。与这些事业关系密切的高级官僚当时都发了大财。关于这点，李鸿章、张謇和盛宣怀都是显著的例子。从这时候起，曾有一革命时期并继续发生内战，但当时情势并没多大变化。

### 专营事业性质的改变

但自 1938 年后，中国政府专营事业的性质有了基本上的变化。它已不是 1870—1910 年情形一样的发展现代工业的实行。也不是主要的为了补助 1927—1937 年间的政府财政，当时的鸦片专卖和政府银行的所谓信用放款的专营趋势，已成为剿共内战的主要经费来源。

《纽约时报》记者赖伯曼于 1946 年 8 月由南京发出的通讯说：“中国政府通过各种公共的机关和公司的关系，已成为该国主要的经济包办人，目前控制着矿业、电业、重工业、丝业、棉业和糖的生产。”这不是说中国有了某种的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指中国战后的经济形式已和西欧和中欧相类，在欧洲，重要的经济部门显然已趋向于国家化。英国、法国和捷克都有国家资本主义，但严格来说，中国却没有资本主义。

“目前出现于亚洲的国家资本主义又趋和欧洲的来比较，有若干不同的理由。”协和神道学院的基督教伦理学教授华尔德曾说过，他并没有指出中国已经有了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依他的



解释：“由于亚洲人民的封建性和殖民地性的情形关系，亚洲的国家资本主义正扮演着一种不同的角色。”

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矛盾的，正如国家资本主义和殖民地情况一样。当资本主义发达至于国家专营的阶段的时候，生产已大部分社会化，虽则产业所有权仍归私人。目前西欧存在的国家资本主义仍在保留私人所有权，由国家集中加以控制，国家则系由一个经济集团来控制。

但在中国，政府的专营大不相同，它只对管理国家事业的官僚们有利，而它只保障私人的所有权，使政府的官员及其家属私人发财。统制完全操于少数有势力的政府官吏之手。这样的政府专营绝不是促进生产的社会化，反之，必然加强所谓国有企业的官僚化，分散及破坏生产的力量。

国家资本主义，在西方系表示资本主义经济的顶点，但中国的政府专营或国有企业，在历史的观点来说，只是一种高级官僚手中的资本累积，仍然是处于一种前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尽管中国政府专营也获有剩余价值，但它并不是由正常的商品流通中得来。反之，纯系以政治上的压力而获得过分的利润。政治的独裁支持着经济垄断。只要对战时及战后的中国国营事业略加研究，便可明了这些事实。

## 统制的事例

政府统制茶叶市场即为中国官僚垄断典型之一。在安徽江西两省产茶区域中，一向实际上茶叶的收购，系由经营批发及出口的茶商茶庄出资办理。但自1936年起国家银行获得发行钞票的特权便积有巨额的存款，当时政府已在产茶区内建立一公路网，南京的高级官僚们便决定创立茶的专卖制度以打击茶庄。是年2



月，政府的设计机关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议茶叶国营。4月份，政府设立皖赣茶叶联营运销委员会。茶庄对此极力表示反对，并以取消过去每年收购茶叶的期票为威胁。但因政治压力太大，茶庄只得接受一个妥协办法，即仍继续办理绿茶的经营，作为主要出口产品的红茶则由政府专办。

全国经济委员会结束后又成立了全国资源委员会，授权该会统制及管理大量之中国矿业及工厂，纺织厂亦包括在内。1943年，棉花实际亦归政府垄断，像米麦一样，棉花亦须征实，交付产品实物完缴地税。此外，并规定一部分棉花产量由政府收购。政府所定之棉花官价甚低，常在全部生产成本之下，尤有甚者，政府统制机关所定价格，也从没有依计划生效。棉花种植者极难预知政府将规定的限价。

官限价格和黑市价格的距离极大。1945年1月，在中国最佳产棉区的陕西省，当官价每担为国币13000元时，黑市价格最低限度为每担17500元。1945年5月的情形更坏。官价为33000元时，黑市价每担已高至10万元，此一限价仅足抵补不计人工及肥料的生产成本。结果陕西与豫北的棉田面积大为减少，许多地方1年内减少了50%。

尤有进者，政府视农户存贮棉花为囤积，这样是会被没收充公的。在此种情形之下，棉产自然愈为减少。1945年农林部农产促进委员会曾计划以巨额款项贷给棉农，因为在1944年中，所谓中国自由区1年内的棉产总量仅得150万担，即1936年总产额9%。政府对这种情形是满不在乎的，它所关切的显然是利润而不是生产。事实上，自1942—1945年中的3年半时间内，重庆政府横越喜马拉雅山的空运输入了大量的美国及印度棉布。一方面，中国的棉产显然有了过剩的现象，另一方面，使鄂湘赣粤陕5省可用的纺锤464000个大部分时间空闲着。政府只顾以



垄断棉布的运销分配图利，完全不顾及棉产和纺织工业。

## 蹂躏私人企业的倾向

过去 10 年以来，政府的垄断是以政府统制的名义推行于中国。“政府统制”则又以节制私人资本的社会主义政策为藉口。虽然根据 1944 年 11 月 6 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第 148 次会议通过的《经济建设纲领》中国工业发展应循之两项原则为：私营企业及国营企业（见纲领第一条）；同时又规定私人资本可以经营国营以外之任何企业（见第二条第二目），但目前中国政府的垄断政策目的系在摧毁所有民营的近代企业。若干有力的官僚集团正在发展，借政府专营的名义恣意图利。他们运用政治的军事的力量，以谋本身商业利益的巩固和发展，他们对商业的兴趣更较对工业者为浓厚，喜欢用专断的方式而讨厌民主的程序。

## 工业的独霸

除了维持政府对外贸易的铁路公路及航空运输和外汇的专营之外，政府自 1944 年起控制了近代的生产事业。是年私人工厂虽有 4764 家（90.47%），而政府工厂仅有 502 家（9.53%），全部政府资本为国币 189183000 元（38.81%），政府工厂工人总数为 105066 人（29.21%）；而全部私人资本仅有 298297000 元（61.19%），私人工厂的工人总数为 254597 人（70.79%）。很明显地，政府各厂规模既大而资金雄厚，自然可以赛胜私人工业。

还有一层，政府办的并不限于重工业。1944 年政府办的 502 家工厂中，有 167 家是小的化学工厂，146 家是棉织工厂，103



家是饮料工厂。是年近代工业上政府和私人资本的分配显出并无一明确的工业政策，其分配表如下：

中国工业资本分配表（1944年度）

项目	官营百分比	项目	民营百分比
冶金	30.99	化学	75.03
化学	25.01	纺织	18.63
机械	15.42	机械	10.24
纺织	13.36	饮料	9.85
电器	12.27	冶金	5.74
印刷及教育用品	0.89	电器	5.15
饮料	0.80	印刷及教育用品	5.14
五金	0.72	其他工业	4.82
其他工业	0.44	五金	3.76
衣服	0.10	衣服	1.64
总计	100.00	总计	100.00

一位孟先生在国民党出版的中国月刊中曾说过：“中国也许是一个世界上少见的国家，在国内统制经济和自由经济，并行不悖互相为利。”他又说：“自1943年开始，通货膨胀发生了，大部分游资不再流向工业，而转向于非法的商业活动，例如囤积及投机买卖。及至战事突然结束，因为多数战时合约取消，情形便较前更坏。一切重工业几全部停顿。各地都弥漫了不景风，使我们大蒙其害。”因为专营的目的在于扩张它自己的势力，政府控制了外汇、运输和银行，很快便腐化了成为政府的囤积、投机和走私。这种事物的现象，孟先生称之为统制经济，实在不能和他所说的自由经济并存的。



## 救济物资的转移

本年8月15日《纽约时报》以“蒋介石的计划”为题的一篇重要社论，曾述及蒋氏“令饬其所属政府人员自行检讨其错误及弱点，现引为遗憾的是发见了过重的中国官僚习气。”最近报上对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华的事情亦有不少记载。在过去办理救济事宜多系中国公共社团，但目前政府已转而自行包办。救济工作的包办便助长了贪污，在好多场合中，救济物资已转入了私人的用途，此种情形连同政府对其他工业商业银行交通的垄断，遂使高级官僚们的宦囊肿胀。

值得强调的是，目前政府对工商业大规模垄断经营是通过发行钞票和接管敌伪产业而完成的。实际上，这就是政府全部财政的关键。1936年8月，南京政府钞票发行总额为14亿元。至1945年8月增至1万亿元。本年度5月则达2.2万亿元。但据财政部长俞鸿钧在国民参政会末次大会报告，1946年底全部发行额将约1395万亿元，即995993倍于1936年度。这就说明了每月最低限度有200亿元，而本年度大概为5万亿元；由敌伪接收来的工厂、矿场、地产、运输工具等财产价值总额约为1万亿元。政府显然希望变卖大部分这类财产以收回一部分钞票。

（注）美国援华捐款半数以上落于中国政府机关手中，1/3弱拨交基督教教会及教育机关，1/5弱拨交公共组织的战时救济团体。据芝加哥《太阳报》驻华记者塞灵格称：“联总”重装备器材最少已有一半由南京政府售于其指导的“行总”，并由其控制的中央银行垫款。其余一半，“行总”署长自己亦承认已售诸“私人”或加入作为官股，多数官股之管理，系由著名政府官员出名参加董事会的。



通货膨胀照例会引起工业上的停滞，但实际上变卖财产和收回一部分钞票的进行很慢。卖给私人公司的产业实远较留于政府手的为少。也许 70% 以上大部仍在政府垄断经营。每一政府中的有势力派系都分享了一份。

## 政府中的派系

首先是以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国民党领袖们组成的集团，即 CC 系。它控制着中国农民银行，拥有信用合作事业的大量股份，并和 17 个投机大粮商有联系，还控制着中国工矿银行，这银行虽属私有，但亦受政治及官僚力量支配；此外尚有由华中华东敌方接收过来的中国丝业公司。这个公司经营丝茧的生产，设有十家缫丝和丝织工厂，共有缫丝房 2384 处。它控制着苏浙皖 3 省的丝工业和 25 家向公司购丝的私营集团。每年可有 100 担的生丝出口。

第二个集团是所谓政学系，它控制下的金城银行虽系私人所有，但受政治和官僚势力指挥，又拥有政府多方间接大量津贴的《大公报》。并占有局部的中国水产公司和台湾糖业公司，后述两公司系最近由日人方面接收过来的。中国水产公司拥有渔船百艘以上，除此之外尚有柴油引擎的船艇约 10 艘。它还控制有 7 个冷藏厂，一个织网厂，一个制罐厂，一个鱼油厂，一个小型船坞和修理厂。台湾糖业公司在台湾主要的资产是由日方接收过来的 42 个糖厂。台湾的行政长官陈仪将军便是政学系著名分子之一。

第三个派系是孔祥熙领导下的旧金融集团，孔氏在抗战 8 年中曾任财政部长 7 年。据说这一集团曾与公债黄金投机，外汇舞弊和走私有关，又传其子孔令侃将出资组织一个办理中美贸易的公司。



第四个是宋子文集团，与CC系和孔氏集团比较，它还具有发展近代企业的强烈倾向。它控制南洋烟草公司，金山贸易公司，立达公司和最近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后一公司目前经营着52个由上海天津青岛及他处城市接收来的日本工厂，共拥有纺锤176万个，约等于中国全部纺锤的 $\frac{2}{5}$ 。它的管理虽然不善，但每月所赚纯利亦有34%，约为美金400万元，此应归功于该公司享有的特权：即原料、运输、燃料及其他优先权等。

## 蒋氏集团

第五个集团是蒋委员长领导的。它控制着交通部，该部最低限度名目上是主办全国的铁路网的。它控制着国营招商局轮船公司，该公司大于国内任何民营轮船公司，行驶的轮船总吨数约有80万净吨，大部分系由日方接收而来。它的一百艘轮船中有内河及沿海小船和美国的自由轮。目前尚有较大的船只拨交该公司经营。同时直接受委员长指挥的还有全国资源委员会，该会在战时已甚发达，控制着116种工业，37处矿场和33个电力厂。在该会管理下的工厂约有60个厂现尚开工。该会目下生产全中国半数以上的铁钢和全部石油及非燃性金属。在化学工业它亦将居于首位。由于中央政府专营的高度发展，过去如阎锡山在山西，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和龙云在云南的省营独占事业便迅速没落。大规模的垄断吞并了小规模垄断，中国战时不正常的情势加速了这种过程的发展。

## 纺织业的垄断

中国的政府专营束缚了自由经济的发展，此点可在纺织工业





上获得充分的证明。在战前的 1936 年，中国 143 家棉织厂，此等现代的纺织厂多数设于长江下游地区，其纺锤总数为 5647000 个，其中 3047000 个系由中国人所有由国人经营，260 万个系外人所有由外人经营；在外的有的纺锤内，约有 190 万个系属诸日人。

中国棉花的生产在 1936 年时实际已能自给自足。各纺织厂棉花原料需要总量为 1100 万担。而是年国棉的生产最少有 1630 万担。自 1931 年以后，中国棉花输入已大为减少。1931 年输入总量为 470 万担，1936 年输入总量则仅为外国上等棉花 80 万担，在 1931—1936 年间，国棉生产总量约增一倍。前途展望极佳，据估计迄 1937 年底，中国纺锤总数可达 680 万个，中外所有平均数目相等。

纵在抗战年间，特别在 1939 年，内地各省的新式纺织厂共有纺锤 170 万个，可以生产足量的棉纱以供机织及手织之用。共可织成棉布 4000 万匹，每匹约 40 码。估计内地各省人口约 2 万万人，每人每年平均可得布 8 码。战时印度每人每年平均消耗亦仅 5 码或 6 码。国人每年每人平均 8 码实颇充足。但重庆的政府专营管制并不鼓励纺织生产及棉花生产，此种情形结果竟做成棉荒，布荒，并倒闭了许多纺织厂。

宏大的政府纺织专营机关“中纺公司”是由过去日本经营的纺织厂构成。其惟一的目的是补助政府的财政和使有关的官僚经理们发财。因此，它目前的管理是无效率的。它从日方接收了约 176 万个纺锤，但至今只有 75 万个，即 42% 开工。每日只生产 20 支纱的 700 包，这还不够全部生产能力的 18%。生产的品质亦很劣。战前每一纺锤每日产纱约 1 磅，目前每纺锤仅产 1 磅的 4/10。本来多纺数锤可以纺 40 支纱的，但政府公司却有意放弃，只用来纺 20 支和 16 支纱，目的在临时竞争市场，此种竞争是对



付只能生产 16 支与 20 支纱的民营厂家，在任何正当的经济观点来看，实在毫无理由。

## 官僚独占的经营

官僚独占了全部公司的经营，52 个厂的厂长是隶属于政府公司的工程部主任。主任的上头有公司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实际上一切大权皆集中总经理之手。52 个厂长对于一切人事、机务、原料、预算和销售的事情，都须听命于总经理。凭一个人来应付 52 个厂和 176 万个纺锤的不同业务，这是不堪设想的。

事实上，任用私人、贪污舞弊和不断的严重稽延已习以为常。在上海的一家厂内，从前日人只用 32 个技术人员和 5 个事务人员，便开动了 800 架织机和 5 万个纺锤。现由中国政府管理，同一工厂雇用 44 个事务人员，而技术人员只有 20 名。这样一来公司的雇用人数总额是增加了，但技术人员的比例反而减少。公司获利很大，它有能力支付比民营厂家较高的工钱和薪金。这样的竞争，结果也窒息了任何自由经济的发展。

甚至政学系的发言人也严厉批评政府的专营事业，也许是由于这个集团分享的成分太少的缘故吧。1946 年 5 月 30 日上海《大公报》的社论抗议南京政府的目前财政经济政策。社论上说：“政府现有一个一贯的政策，即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此一政策的理论根据是：向贫者要求‘节制资本’，以防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却又向富者要求‘发展国家资本’，这个国家资本底真正主人便是富人和官僚。”

中国的全部政府专营事业都带有一种买办性，买办的西文 *Compradore* 本是一个葡萄牙字，适用于充当西方人和东方人贸易上的经纪人的东亚人。因为政府有了政治及军事力量作后台，



便享有一切运输和银行的优先权，以官限的低廉价格采购生产品，再向世界市场售出博取过分的利润，于是生产窒息、工业疲敝。最近上海万强纺织厂的经理宣称：“纵令工人们不支工资、不吃饭、甚至不把劳动成本费用算入，在中国的工厂也要关门。”

中国的政府专营不仅剥削工人，同时也剥削民营厂家和消费者。在军事独裁之下，罢工的自由不要提起。凡不与有权势的军政官僚勾结的私人企业，很易因高税率而崩溃，且须忍受运销上的极度困难。当政府极力囤积投机时候，不仅中小商人破产，消费者亦不免于支付额外的代价。

## 对 立 的 原 则

目前中国有两种明显的经济发展趋势，一种前社会主义的合作经济已在中共解放区内开始实行；而国民党区内最强烈而明显的趋势，便是一种依靠军事独裁控制的前资本主义买办性的政府独占经济。这样，政府经济独占，一党统治和外国军事财政援助便成为目下南京政府的三个原则。这些原则正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相反，同样的不可分割，目前中国的内战根本就是两个集团各自保卫其主义体系的斗争。

（载《民潮》第5期 1947年2月 李宛译）



# “猪仔”出洋

——700 万华工是怎样被拐骗出国的

1932 年冬天，我在广州遇见美国驻沙面领事，他是我 1920 年在大学的同学。我请他介绍我到领事馆去看有关出国华工的档案。在翻阅过程中，我看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商船把我国苦力从香港一批批运到海外情况的记述。英文苦力（Coolie）一词源于印度泰米尔语，指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这名词在汉文里读音和意义相通，故译成“苦力”。但英文档案中所称的苦力，是专指被拐贩到西欧和美国从事奴隶劳动的华工。这种人在我国文献中就叫做“猪仔”。

## 掠夺华工出国从 16 世纪开始

我国明末清初，福建沿海商人曾和农民、手工业者订立“公凭”，自造航船，到婆罗洲垦殖开矿。这类人并不是猪仔，而是到海外去的移民。近年来，从外文书报档案中，我看到一些早期出国华工的记录。如葡萄牙人早在 1519 年就掠夺我国苦力到葡属东印度的果阿去做工；1620 年荷兰人掠夺我国苦力去巴塔维亚垦殖；1772 年约有 1 万名我国苦力在婆罗洲做工；从 1785 年



到1804年的20年间，一批批苦力从澳门运到槟榔屿，每批人数约600—1000左右。1805年我国苦力也有到西印度洋特立尼达群岛的。1810年有几百名苦力到巴西试种茶树。东印度公司在1812—1814年的两年间从我华南运去1700多苦力到班卡岛。同年东印度公司从我广州黄埔运去几百名苦力到圣赫勒拿岛当建筑工人。拿破仑被囚在圣赫勒拿岛上时，曾宴请路过那里的英国海军军官巴塞尔·贺尔舰长。当时拿破仑指着窗外花园中的中国花匠对贺尔说。“你看，这些人很善良。他们有才能、智慧和自尊心，决不会长期像这样受英国人或其他任何西方人奴役。”

19世纪，我国苦力被拐运到国外的比以前更多了。1819年英国占领新加坡后，总督莱佛士为了开拓南洋新殖民地，更多方掠夺我国苦力。根据外文档案统计，1820年到1830年，每年运到新加坡的苦力有6000—8000人。1847年秘鲁有12万我国苦力。同年在古巴的竟多至15万人。1848年有很多我国苦力从厦门和新加坡运往澳大利亚。两年后，又有4000多中国苦力从广州、香港、澳门到了加利福尼亚。1851年巴拿马有1万多苦力在那里建筑铁路，都是从汕头运去的。1856年到1858两年间运到西印度群岛的中国苦力约有1万人。同期还有好些苦力到加拿大西海岸。1859年在海地也有了我国苦力。1864年我国苦力也有到墨西哥的。1867年有几批中国苦力到马达加斯加去修公路。在1876年到1898年间有56000我国苦力去新喀里多尼亚和苏门答腊种植烟草。1883年斐济有我国苦力，1902年西萨摩亚也有我国苦力。

## 出国华工遍布全世界

我国苦力不但被贩卖到南洋、大洋洲、美国以及非洲各地，



也大批被运往北方。1870年有150名被掠去俄国。1880年后，从山东沿海一带，每年被掠夺到海参崴的达数千人。1906年比利时人把我国苦力500多人从香港运到刚果去修筑铁路。据1907年烟台海关记录，那年由烟台运往海参崴的苦力约有6—7万人。20世纪初，南非金矿矿主不愿多用白种工人，因为白种工人有工会组织，经常罢工。但黑人又因不堪虐待，不愿干活。因此矿公司董事会，决定招运我国苦力去南非替代黑人当矿工，并委托英商开平矿务公司和太古轮船公司办理贩运苦力到南非的事务。前美国总统胡佛当时是开平矿务公司工程师，他因经管贩运苦力发了大财，后来被选为总统。从1904到1910年，我国苦力到南非的有7万多人。但在这以前，我国驻南非公使张德彝，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就说非洲各地已经有10多万我国矿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1916年下半年到1917年下半年，英、法、俄三国，分别从我国招去5万、15万和3万苦力。俄国人把我国苦力从东北、天津、山海关运往顿河矿区和欧洲东部战场；英、法从秦皇岛、青岛、上海等地运往法国北部和巴尔干战场；在法国的苦力，主要在后方担任后勤劳务，如搬运、装卸、挖壕及兵工厂劳动。在战场上战死的有2000多人。

如上所述，外文档案和书刊都把华工称为苦力，但我国档案中则称之为猪仔。道光十九年（1839年）7月24日林则徐对总理衙门奏称：“十余年前（即1820年）连值荒年，出洋者数以千计。当其在船之时，皆以木盆盛饭，呼此等搭船者一同就食。其呼声与内地呼猪相似，故人目此船为买猪仔。”清廷外务部嘉庆至同治年代（1800—1870年）档案中，有一个来自澳门的报告，这个报告详细说明了拐卖“猪仔”出洋情况。



## 怵目惊心的“猪仔”贩卖

秘鲁、古巴等洋人来中国招工，与猪仔头订立合同，指定每只船装多少名，限期开船，要求如数收足。因此猪仔头从订立合同后，必须立即千方百计四处找人，拐、骗、掳捉，以求收足人数。

猪仔到了澳门，先由西官讯问是否情愿出洋。实际上讯问时猪仔头已预先找到代答的人，到将下船时，才设法调真猪仔下船。有时遇到西官查验严紧，难以调换，冒名顶替的就只得被迫出洋。

被拐到的猪仔关在密室，不能与任何人见面。到下船时，猪仔多向人哭诉被拐骗的情况，但已后悔不及了。

乡民谋生艰难，最易被骗。猪仔头骗说，出洋做工除供给衣食外，还有工资。而且说外国年历不同，一年只等于中国半年，因此订8年合同实际只等于4年。期满后还有船送回中国。这些人无知，信以为真，被骗到澳门后，就被关起来。有些人到澳门醒悟过来，不愿出洋，就被严刑酷打，只得勉强答应出洋。也有私自逃走的，但因不认识路径，大多被猪仔头党羽捉回。

猪仔出洋，每年数以万计。洋人以每名百元的钱发给猪仔头。猪仔头实际发给猪仔的，不过几块钱。所以猪仔头得的钱最多。往来乡间拐人的差役等对这种情况不敢过问，因为猪仔头异常狡猾毒辣，党羽很多，拐骗猪仔情况虽为街坊所目睹，也不敢与他们理论。

以上是1870年以前澳门的情况。1870年澳门已有300个猪仔馆，即关猪仔的地方。三年后，当葡萄牙国王下令关闭猪仔馆时，澳门的洋人和中国人都如晴天霹雳，惊慌失措。葡萄牙、秘



鲁和西班牙三国人开设的猪仔馆全部关闭停业。管猪仔馆事务的葡国委员及猪仔头等一向靠拐骗猪仔发财，现在忽然断了这项财源，无不垂头丧气。秘鲁有 12 只专运猪仔的船，只好空船返航。葡萄牙国王 1873 年勒令关闭澳门的猪仔馆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大发慈悲，而是由于竞争不过英、法、美等国商船从香港贩运猪仔，不得已才停止的。

### 华工是种植园劳力主要来源

早在 1807 年，中美洲一带因种植园生产过剩，使用终身制的黑奴对资本家不合算。1838 年废除黑奴买卖后，种植园主就得另找劳动力来源。因此英国殖民部 1843 年批准，到东南亚抢运我国猪仔，到美洲西印度洋各地种植园替代黑奴。1889 年 12 月 31 日，一个法国代表团访问东南亚各地后在报告中写道：“香港和新加坡的繁荣兴盛，以及马来联邦、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那些赚钱的种植园，全靠中国人的劳动”；又说：“他们不仅建筑铁路，而且在种植园劳动，开辟稻田，种植蔬菜，合理而巧妙地开采矿藏，并不断设法使各生产领域的产最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曾任新加坡移民局局长的英国人普赛尔称赞中国“苦力”的功绩说：“假使没有中国人，就不会有现代的马来亚。假如没有现代马来亚的橡胶供应，欧洲和美国的汽车工业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

英、美、法等国商船都用赎单名义从香港抢运猪仔。这在名义上与澳门不一样。因为猪仔在澳门，上船前要被迫订立契约，而从香港运出的赎单工，要到国外出卖后才订立契约。所以香港运出的“赎单工”名义上是自愿的移民，但实质还是猪仔。英、美、法等国则借此攻击葡萄牙、西班牙等商船贩运的不是赎单工





而是猪仔，是违反人道主义的。他们故意制造这种舆论，目的无非是要与葡萄牙、秘鲁、古巴争夺劳动力。此外，由于澳门地方狭小，不能充分供给淡水、粮食和修理船只器材，所以澳门开出的商船都要到香港去装运这些必需品。英国人既然统治香港，就有权故意限制对从澳门来的商船的供应，使澳门商船遇到不少困难。这也是迫使葡萄牙国王下令关闭澳门猪仔馆的原因。

可是不到几年，澳门猪仔馆又重新开设起来。名义上不再称招工局，而挂了一块“某某栈房”的招牌，好像是旅馆。不过这种栈房的数目，已经大大减少。据说已减到100家以下。1883年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参赞曾函告我国税务司赫德（英国人），建议两广总督同澳门官方交涉，改订招工章程。但总理衙门对此并不理会。因此澳门拐贩猪仔的勾当，并没有停止。香港、汕头、上海、厦门和海口都先后开过猪仔馆。福州和广州也开过猪仔馆。新加坡20世纪初还有20家猪仔馆。

## 700万华工被拐骗出国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给外务部报告中说：“每年从香港、厦门、汕头、海口等地到达新加坡的华人约十余万人，其中70%是猪仔。”如果按16万人计算，就有112000是猪仔。据我海关统计，从1881年到1898年17年内，从上述各港口运到新加坡附近海峡殖民地的华人有2776000，按70%折算，1943000是猪仔。这样，那17年内，平均每年运到海峡殖民地的猪仔有114000。又据新加坡海峡殖民政府统计，从1911到1920年到达新加坡的华人总数为190万人，按70%计算，其中130万是猪仔。从1921—1930年到达新加坡的华人总数为242万人，按70%折算，就有猪仔170万。



根据这三项统计总数，50年内，就约有500万猪仔到达新加坡，其中大部分被转运到其他地方。估计18—20世纪的200年内，从我国直接运到南北美洲、大洋洲、欧洲和非洲各地的猪仔，还有100多万，所以从我国前后被贩运到世界各地的猪仔总数不少于600—700万。

读了描写猪仔，在贩运途中惨状的记载，更令人发指。澳门和香港是贩运猪仔的集中地。猪仔上船后，就被锁在船的底舱。按英国旅客法案规定，船上每客至少要占15平方英尺空间，但1855年通过中国旅客法案时，认为15平方英尺对于亚洲人种过宽，就改为12平方英尺，也就是宽2英尺、长6英尺，相当于一个小孩用的床那么大。但事实上，英美等国商船为要多赚钱，本来装300名的，硬装了600人。这些猪仔无法睡眠，只能屈膝坐着。在船还没有启航时，腿就发酸了。在这样拥挤不堪的舱里，空气窒息，再加上饮食恶劣，因此疾病流行。船上又很少医药设备，所以死亡的人很多。

从19世纪60年代起，美国发明了一种容量大、速度高的新型快船。据勒白克所著《中国快船》一书所述，美国快船“秃鹰号”曾从事贩卖猪仔多年。有一次装运猪仔500名从香港开往秘鲁，经过马尼拉以东500英里的海面时，船上猪仔受不了虐待，群起反抗，要冲上甲板而未成功，终于点火烧船。但船长始终不许打开升降口的铁格子，反而开枪，打死很多猪仔。可是火已无法扑灭，以致500名猪仔全部被锁在舱底，和“秃鹰号”同归于尽。

## 载运途中惊人的死亡率

从英国和美国的档案看来，就知道猪仔出洋在途中的死亡率



惊人。例如，1854年有一只船装了325名猪仔，开往秘鲁，中途死去47名，死亡率14%。1853年有二只猪仔船开往古巴。700名中死去104名，死亡率为15%。1852年有三只船装了810名猪仔去英属圭亚那，途中死去164名，死亡率为20%。另一猪仔船去巴拿马，425名中死去96名，死亡率合23%。同年一艘去巴拿马的船装猪仔300名，途中死去72名，死亡率为24%。又如1850年有740名猪仔分装两船去秘鲁，途中死亡247名，死亡率合33%。1856年英国商船“仆得蓝公爵号”装猪仔332名从香港开往古巴，中途因疾病和自杀死去了128名，死亡率达39%。而同年“约翰·加尔文号”装了298名猪仔去古巴，途中死去135名，死亡率高达45%。

上面只是随手举出的一些记载，据一份报告说，从1847—1857年十年间，从香港去古巴的猪仔共有23928名，途中死去3342名，平均死亡率达14%。如果加上中途失事，人船全毁的数字，那么死亡率恐怕不会低于25%。难怪当时英、美人也说运输猪仔的船为“浮动地狱”。

从1845年到1874年的30年间，是猪仔贩卖最猖獗的时期。那时把猪仔运到目的地后，一般是立即押送到市场或街头拍卖，当场脱光衣服，赤身露体，任凭买主像挑选牲口一样，进行检查。从中国到中美洲加勒比地区，贩卖一名猪仔的本钱，一般为150元，包括船票70元。当地卖价一般为500元，有的高达1000元。因此猪仔贩子卖出一名猪仔可得350—850元，利润率高达2—5倍。其中以航运商所得利润最多。因为把猪仔从香港、澳门运到美洲海岸，实际航行费每名猪仔只5元，但船票却要70元。每装运一名猪仔，轮船公司可净赚65元，利润竟高至13倍。



## “猪仔”贩卖兴盛的原因

西方商人为什么到我国来贩运猪仔呢？这当然有历史的背景。17世纪美洲大西洋海岸和各岛屿种植园经济作物，需要大量劳动力，单靠奴役当地印第安人是不够的。首先替代印第安人是从欧洲运来的白人。这些人是英国和德国无以为生的穷人、异教徒和罪犯，还有成千上万被拐骗和绑架去的人。他们都被运往美洲各种种植园当白奴。运到北美英国殖民地的白奴达25万人以上，占全部英国移民的半数。因此1670年弗吉尼亚的白奴人数为黑奴的3倍。在18世纪运到宾夕法尼亚一地的移民2/3是白奴。这些白奴在运往各地的途中，同样受到野蛮迫害，白奴船上的死亡率高达50%以上。

随着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市场上对热带经济作物，如糖、烟、棉花等原料的需要，日益增长，大型种植园生产替代了原来的农场，需要廉价劳力就更加迫切。因为白奴和印第安人早已供不应求，不得不从非洲大批贩运黑奴。后来黑奴买卖也禁止后，就不得不到我国来贩运猪仔。

据1944年埃里克·威廉姆斯所著《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一书所述，很多古巴甘蔗种植园同时使用黑奴和黄奴。例如“圣马丁”种植园有黑人452名，猪仔125名，“古巴之花”使用黑人409名，猪仔170名；“圣·苏珊那”用黑人632名，猪仔200名。至于秘鲁鸟粪岛的艰苦劳动则几乎都是从我国运去的猪仔承担。东南亚各地种植园和矿场的开发，大多是在废除黑奴买卖以后才开始。在这些地方从事艰苦劳动的猪仔，是从香港或新加坡转运去的。这些猪仔远远多于从印度运去的所谓“苦力”。所以大批的猪仔，就替代了从非洲运出的黑奴。因此我们可以说，在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很多殖民地上长期遭到残酷剥削的劳动力第一代是白奴，第二代是黑奴，第三代是黄奴，也就是从我国出洋的“猪仔”。

(原载《百科知识》1979年第5辑)



# 作者著作目录

## 一、著作目录

人类的历史，上海 1921 年版

人类的故事，北京 1925 年版

国际新局面，北京 1925 年版

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与王寅生合著）上海 1929 年版

难民的东北流亡，（与张辅良等合著）北京 1930 年版

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上海 1930 年版

亩的差异，（与王寅生合著）上海 1930 年版

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海 1934 年版

华南农村土地问题，上海 1936 年日文版，纽约 1936 年英文版

中国的地主和农民，纽约 1936 年英

文版

工业资本和中国农民，纽约 1946 年英文版，纽约 1946 年日文版

中国农民，孟买 1946 年英文版

中国工业合作史话，纽约 1947 年英文版

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纽约 1949 年英文版

美国垄断资本，北京 1955 年版

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北京 1959 年版

印度莫卧儿王朝，北京 1964 年版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共 10 辑），北京中华书局

南亚经济区域，新德里 1980 年版



## 二、文 章

- 好心的外交政策, (英文 美国波莫纳大学学士论文) 1919 年
- 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发展, (英文 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论文) 1921 年
- 1912—913 的伦敦大使会议, 暨阿尔巴尼亚的独立: 外交研究, (德文 德国柏林大学博士论文) 1924 年
- 临时抱佛脚, 《现代评论》第 53 期, 1925 年 12 月
- 英帝国主义的前途, 《现代评论》第 55 期, 1925 年 12 月
- 一笔亏本账, 《现代评论》第 55 期, 1925 年 12 月
- 英国独吞莫纳尔的煤油吗? 《现代评论》第 56 期, 1926 年 1 月
- 苏联共产党大会, 《现代评论》第 56 期, 1926 年 1 月
- 十一国钳制中国的协约, 《现代评论》第 57 期, 1926 年 1 月
- 国际间资本大团结, 《现代评论》第 58 期, 1926 年 1 月
- 裁兵声中的美国预算案, 《现代评论》第 58 期, 1926 年 1 月
- 苏土盟约, 《现代评论》第 59 期, 1926 年 1 月
- 苏资调节的失败, 《现代评论》第 60 期, 1926 年 1 月
- 军阀的违法杀人, 《现代评论》第 61 期, 1926 年 2 月
- 回民的大联合, 《现代评论》第 62 期, 1926 年 2 月
- 梯罗尔南部的的问题, 《现代评论》第 63 期, 1926 年 2 月
- 俄法会议的前途, 《现代评论》第 65 期, 1926 年 3 月
- 急转直下的法国政局, 《现代评论》第 66 期, 1926 年 3 月
- 德国与国际联盟, 《现代评论》第 67 期, 1926 年 3 月
- 国际裁兵会议的前途, 《现代评论》第 68 期, 1926 年 3 月
- 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 《现代评论》第 68 期, 1926 年 3 月
- 中波问题的通商, 《现代评论》第 69 期, 1926 年 4 月
- 美国资本家的势力, 《现代评论》第 70 期, 1926 年 4 月
- 美国的塔克那阿利卡问题, 《现代评论》第 71 期, 1926 年 4 月
- 美国航空军备的扩充, 《现代评论》第 72 期, 1926 年 4 月
- 俄德协约, 《现代评论》第 73 期,



- 1926年5月
- 波兰的革命，《现代评论》第76期，  
1926年5月
- 属地政策的新发展，《现代评论》第  
77期，1926年5月
- 葡萄牙的革命，《现代评论》第78  
期，1926年6月
- 西班牙的专政，《现代评论》第79  
期，1926年6月
- 美国资本的权威，《现代评论》第82  
期，1926年7月
- 匈牙利的亲英政策，《现代评论》第  
83期，1926年7月
- 美国政府与农民，《现代评论》第84  
期，1926年7月
- 回民联合大进步，《现代评论》第86  
期，1926年7月
- 英国总罢工失败，《现代评论》第87  
期，1926年8月
- 哀哉法兰西，《现代评论》第89期，  
1926年8月
- 菲列滨（律宾）独立问题，《现代评  
论》第91期，1926年9月
- 何以德国能进国际联盟，《现代评  
论》第92期，1926年9月
- 法西斯政治的危险，《现代评论》第  
93期，1926年9月
- 布尔希（什）维克党内的风潮，《现  
代评论》第94期，1926年9月
- 叙利亚革命的挫折，《现代评论》第  
95期，1926年10月
- 美国和巴西的关系，《现代评论》第  
96期，1926年10月
- 德国的旧经济政策，《现代评论》第  
97期，1926年10月
- 伦敦的帝国会议，《现代评论》第98  
期，1926年10月
- 布尔希（什）维克的会议，《现代评  
论》第99期，1926年10月
- 基督教徒的醒悟，《现代评论》第  
100期，1926年11月
- 苏俄的第九周年，《现代评论》第  
100期，1926年11月
- 英国煤矿罢工成败的关头，《现代评  
论》第101期，1926年11月
- 吉海铁路问题，《现代评论》第103  
期，1926年11月
- 欧美银行家的宣言，《现代评论》第  
104期，1926年12月
- 美国的货富问题，《现代评论》第  
105期，1926年12月
- 汉冶萍借款的抗议，《现代评论》第  
106期，1926年12月
- 地中海的战云弥漫，《现代评论》第  
108期，1926年12月
- 阿尔彭（巴）尼亚问题，《现代评  
论》第109期，1927年1月
- 尼加拉瓜的战云，《现代评论》第





- 111期, 1927年1月  
白沙拉比亚(比萨拉比亚)的问题,  
《现代评论》第112期, 1927年1月  
印度反对遣兵来华, 《现代评论》第113期, 1927年2月  
什么是帝国主义, 《现代评论》二周年增刊  
西伯利亚的政治经济, 《北大社会科学季刊》第3卷4号, 1926年2月  
北京人力车夫的苦难生活, 《国际新闻通讯》, 1926年2月  
东北抗日最近情况, 《救国日报》合订本, 1926年7月  
中国农民担负的赋税, 《东方》第26卷19号, 1928年10月  
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农民, 《国际农业研究通讯》1—14期, 1928年  
中国田地问题, 《农业周报》53—55号, 1930年10月  
工业化与无锡的农村副业, 《女青年月刊》第10卷4号, 1931年4月  
中国的农村研究, 《劳动季刊》第1卷1号, 1931年9月  
国际巴黎决议案的批评对调查委员会应取的态度, 《东方》第29卷3号, 1932年2月  
中国经济状况 1932年1—6月简述,  
《太平洋事务》第5卷第9期, 1932年9月  
揭开幕布的中国政治闹剧, 《中国论坛》, 1932年  
崩溃中的关中的小农经济, 《申报月刊》第1卷6号, 1932年12月  
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 《中国经济》1卷4—5期, 1933年  
中国经济的分解, 《太平洋事务》第6卷4、5期, 1933年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序, 载《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中华平民促进会, 1933年  
破产中的汉中的贫农, 《东方》第30卷1号, 1933年1月  
广东耕地所有与耕地使用, 《中山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2期, 1934年  
中国“模范省”的乐土(英文), 《太平洋事务季刊》1936年3月  
山西阎锡山“土地公有”的真相(英文), 《太平洋事务季刊》, 1936年9月  
日本在中国南端省份的渗入(英文), 《太平洋事务季刊》第22期, 1936年11月  
冀察政务委员会使走私合法化(英文), 《太平洋事务季刊》第22期, 1936年11月



- 论南京政府的内蒙政策（英文），  
《太平洋事务季刊》第 22 期，  
1936 年 11 月
- 丰收给中国农村带来新威胁（英文），  
《远东观察》第 5 卷第 23  
期，1936 年 11 月
- 挽救中国航运的新一轮努力（英文），  
《远东观察》第 5 卷第 23  
期，1936 年 11 月
- 中国军费带来巨大财政赤字（英文），  
《远东观察》第 5 卷第 24  
期，1936 年 12 月
- 绥远和察哈尔的经济态度（英文），  
《远东观察》第 5 卷第 25 期，  
1936 年 12 月
- 新崛起的纺织中心天津（英文），  
《远东观察》第 6 卷第 1 期，1937  
年 1 月
- 征服与人口（英文），《太平洋事务  
季刊》，1937 年 2 月
- 合作社是治中国病的万灵药吗？（英  
文），《远东观察》第 6 卷第 7 期，  
1937 年 3 月
- 日本工业界纠纷日多（英文），《远  
东观察》第 6 卷第 9 期，1937 年  
4 月
- 中国铁路战略，新的方式（英文），  
《远东观察》第 6 卷第 15 期，  
1937 年 7 月
- 侵略政策和人口问题，《中国农村》  
第 3 卷第 7 期，1937 年 7 月
- 日本即将丧失中国贸易（英文与  
J.R 合著），《远东观察》第 6 卷  
第 19 期，1937 年 9 月
- 七七回顾——一位中国官员揭示的  
战前中国政策（英文），《美亚》  
第 1 卷第 10 期，1937 年 12 月
- 中日战争的经济背景（英文），《美  
亚》第 1 卷第 11 期，1938 年 1 月
- 中日持续战争的前景（英文），《美  
亚》第 2 卷第 8 期，1938 年 10 月
- 古国的新生（英文），《天下月刊》  
第 10 卷第 4 期，1940 年 4 月
- 合作运动与农村机构，《工合通讯》  
第 1 卷第 6 期，1940 年 11 月
- 农村与抗战，《中国农村》战时特刊  
第 6 卷第 10 期，1940 年 9 月
- 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村》  
第 7 卷第 3 期，1941 年 1 月
- 抗战建国与劳工问题，《中国农村》  
第 7 卷第 5 期，1941 年 4 月
- 目前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村》第 7  
卷第 6 期，1941 年 5 月
- 中国经济和政治总形势，《远东通  
讯》，1941 年 11 月
- 高利贷资本与手工业，《中国工业》  
第 6 期，1942 年 6 月
- 《战争与农村》序，《战争与农村》，



- 1942年6月  
工合和建设,《中国工业》第9期,  
1942年  
美国制钢业的进步,《中国工业》第  
18期,1943年  
目前工合的困难问题,《中国工业》  
第21期,1943年11月  
广西工业的前途,《中国工业》第22  
期,1943年12月  
如何走上工业化的正轨,《中国工  
业》第23期,1944年1月  
民族工业和国内市场,《中国工业》  
第28期,1945年7月  
中国五大独立集团,《文萃》第11  
期,1946年11月  
中国官僚资本与内战,《远东观察》,  
1946年10月  
中国的土地改革,《远东观察》第17  
卷第4期,1948年2月  
美国垄断资本,《人民日报》1951年  
2月  
美国财阀与美国侵略政策,《世界知  
识》,1951年第15期  
美国经济何以必然动摇,《学习》  
1951年第4期  
从经济看美国政治,《人民周报》  
1951年第5期  
工业的兴起,《中国建设》1952年第  
1期
- 五十年来的印度史学界,《新建设》  
1952年3月号  
土地改革根除了封建主义,《中国建  
设》1952年第3期  
帝国主义的备战经济与当前的国际  
贸易,《新建设》1952年6月号  
土改以后,实行互助组,《中国建  
设》1952年第3期  
工业化开始,《中国建设》1953年第  
1期  
美国国民经济军事化与农业危机,  
《新华月报》1953年第4期  
新疆的新土地,《中国建设》1953年  
第3期  
云南傣族,《中国建设》1953年第5  
期  
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中国建设》  
1954年第1期  
走向农业集体化,《中国建设》1954  
年第3期  
西藏——农奴自由,《中国建设》  
1954年第5期  
人民治理国家,《中国建设》1954年  
第6期  
从亚洲国家会议看亚洲经济,《世界  
知识》1955年第9期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含义,《中国建  
设》1955年第10期  
新成立的100万个农业合作社,《中



国建设》1956年第2期  
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8日  
支持鲍威尔，支持正义，《人民日报》1956年11月30日  
新农村一瞥，《中国建设》1957年第1期  
在高度工业化的捷克斯洛伐克，《光明日报》1957年3月9日  
富强的捷克斯洛伐克，《文汇报》1957年3月10日  
关于美国宪法，《中国青年》1957年7月号  
中国的一个省——福建，《中国建设》1957年第8期  
从印度展览会谈中印贸易，《人民日报》，1957年9月19日  
1857年印度大起义时期英国人的态度，《历史教学》，1957年第12期  
经济建设中的福建，《印华经济》第5卷第15期，1957年  
中国财政是如何独立自主的？《中国建设》，1957年第10期  
美国农业及其危机，《经济研究》1958年第8期  
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中国建设》1958年第10期  
印度国大党的土地政策，《国际问题研究》1959年第2期

一个省的新貌，《中国建设》1959年第10期  
比翼双飞的人民公社，《中国建设》1950年第6期  
从粮食短缺到剩余，《中国建设》1960年第7期  
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公元第5至17世纪，《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  
印度农村阶段，《经济研究》1961年第11期  
印度的土地改革，《新建设》1962年7月号  
瓷器——现代化制作，《中国建设》1963年第8期  
访问两个公社，《中国建设》1964年第3期  
印度粮荒为何如此严重，《世界知识》1966年第4期  
关于编写世界通史的问题，《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5期  
对研究世界史的几点意见，《世界历史》1978年第1期  
“猪仔”出洋——700万华工是怎样被拐骗出国的，《百科知识》1979年第5期  
追念蔡子民先生，《人民日报》1980年3月4日  
谈谈世界经济的研究工作，《社联通



讯》1980年第7期  
研究世界经济的几点建议，《世界经济  
经济导报》1980年7月15日  
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载《回忆李  
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社会调查研究八题，《社会——社会  
学丛刊》1981年第1期  
斯诺二三事，《光明日报》1982年2  
月15日  
谈谈孙夫人的高贵品格，载《宋庆  
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  
版  
我与商务是同龄，香港《文汇报》  
1982年2月14日  
科学与用外文的回忆与体会，《英语  
世界》1982年第4期  
不能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中国  
日报》1982年1月1日增刊

要学习马克思的研究方法，《马克思  
主义来源研究丛刊》第三辑，商  
务印书馆1983年3月  
青少年们的好消息，《光明日报》  
1983年8月17日  
追忆吾友杨杏佛，《文汇报》1983年  
9月10日  
论世界经济中的矛盾，《世界经济导  
报》1983年12月26日  
发展工业合作社要面向广大乡镇，  
《世界经济导报》1984年5月28  
日  
职业教育是当务之急，《群言》1986  
年第3期  
从道尔顿制教育法所想起的，《群  
言》1986年第6期  
缅怀我的慈母和良师的教导，《群  
言》1986年第9期



## 作者年表

**1897年2月** 生于江苏省无锡县东门。取名枢，小名翰生。笔名陈翰笙、Geoffrey Chu chen、Raymond D. Brooke、C.H.-S、C·H·S、chs。

**1903年** 进东林小学读书。

**1909年** 考入长沙明德中学。

**1912年** 进长沙雅礼学校读高中。

**1915年** 赴美留学。考入马萨诸塞州赫门工读学校。

**1916—1920年** 在美国波莫纳大学学习，被选为Phi Beta Kappa 联谊会（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性荣誉组织）会员，获历史学学士学位。

**1920年8月—1921年6月**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1921年冬** 在美国西雅图与顾淑型结婚，改名为翰笙。

**1922—1924年** 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学习，获柏林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1924年4月** 应蔡元培先生邀请回国，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

**1925年** 经李大钊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 加入第三共产国际。

**1929—1934年** 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主持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调查研究工作。

发起对无锡、河北、岭南地区的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查。

组织对营口、大连、长春和齐齐哈尔等地区的东北难民问题的调查。



指导中国河南、山东和安徽烟草产区人民生活状况的调查。

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任理事长，后又创办其月刊《中国农村》。

1931年 在蔡元培先生的协助下，营救被捕的邓演达出狱。

1933年 同宋庆龄合作，营救被捕的牛兰夫妇出狱。

1934年 任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调查团主任。年末，以中山文化教育馆和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身份赴日本东洋文库作研究工作。

1935年 赴莫斯科，任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约研究员。

在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的主持下，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6—1939年 赴美国纽约，任太平洋关系学会国际部副研究员，协助欧文·拉铁摩尔办《太平洋事务》季刊，并任该刊副主编。同时，还协助饶漱石办《华侨日报》。

1939—1941年 赴香港协助宋庆龄创办“工合”运动，任香港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秘书长，并为保卫中国同盟工作。

在香港创办英文半月刊《远东通讯》，任主编。以此刊物，成为第一个向全世界揭露“皖南事变”真

相的中国人。

1940年 在云南西双版纳进行傣族农村土地所有制的调查。

1942—1944年 香港沦陷，到达广西桂林，任广西桂林师范学院西文系主任。后因重庆政府缉捕，经昆明到达印度。

1944—1946年 在印度德里大学和英国远东情报局工作。离开远东情报局后，到印度史学会工作，对印度经济区域划分问题进行广泛考察。

1946—1950年 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约翰霍普金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美国大学和纽约亚洲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和特约教授。

应邀到华盛顿州、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等地演讲，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和在中国实行“黑暗统治”。

1949年 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4年和1957年又任第二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1年 应周恩来总理邀请，绕道欧洲从美国回到北京。

2月 任外交部顾问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3月 受周恩来和宋庆龄委托，



筹办英文版《中国建设》，任编委会副主任（该刊自次年创刊直至1966年）。

9—12月 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代表，访问印度和缅甸。

1952年7月，赴德国柏林参加第三次世界和平理事会。后又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捷克斯洛伐克与保加利亚。

1953年 当选为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委员。任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

1954年5月，当选为对外文化关系协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直至“文化大革命”）。

8月 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和1964年又当选为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4月，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

6月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6月8日 出席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和平大会。

12月 与宋庆龄代表国家访问印度、缅甸和巴基斯坦。

1956年2月，任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副秘书长。

4月 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

被选为中国人大代表团代表，随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六国。

1958年 任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8月 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参观团，赴天津、塘沽参观。

9月 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参观团，赴安徽参观。

1962年 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历史研究室主任。

1967年 被指为刘少奇的追随者，接受审查。

1969—1971年 赴湖南茶陵“五·七”干校劳动。

1973年 文革后第一次公开露面。

1977年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

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兼职教授。

1979年 任中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任商务印书馆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主任。

1980年 任世界经济学会顾问。

1981年 任中国经济学团体联





合会顾问。

任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

**1982年**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

**1984年** 当选为中国太平洋学会副会长。

**1985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庆祝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陈翰笙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大会。

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

会副主任兼外国历史编委会主任。

**1989—1999年** 任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院长。

**1996年10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庆祝陈翰笙同志百岁华诞暨学术活动75周年”会议。

**1999年** 任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顾问。



ISBN 7-5004-3396-4



9 787500 433965 >